

炎黄春秋



东方歌舞团演出的藏族歌舞

周恩来与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
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傅钟历经曲折讲团结
只惟实不惟上 平息“鱼塘风波”
李立三夫人李莎的传奇人生
楚图南与几位书法家的交往
为反对“突出政治”
被迫害致死的肖向荣

1997 10

总第67期

《中国革命老区》专著首发式在京举行



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书名的《中国革命老区》一书，“八一”前夕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刘华清、张震、王光英、铁木尔·达瓦买提等领导和李德生等在京的老同志、国家部委、解放军总部及部分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出席了首发式。

《中国革命老区》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革命老区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集工具书、教科书和参考书为一体的大型专著，是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图书。陈云、刘华清、薄一波、萧克等26位革命老前辈为专著题了词。这部专著是由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组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协助，全国200余名老干部和专家、学者参与，历时4年，共同编纂的。全书近200万字，300余幅地图与照片。

专著编纂者们表示，在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谨以此书献给这一事业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献给海内外关心这一事业的同胞和朋友们。

(陈干群 供稿 张海萍 摄影)

飲水思源不忘老區
陳雲

堅定信念
開拓前進
劉華清

發揚革命傳統
振奮民族精神
薄一波
一九九六年五月廿日

為《中國老區》題
以老區的光輝
歷史作動祖國
的建設事業。
一九九三年二月
蕭克

1997/10 (总第 67 期)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
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订阅价: 4.00 元 零售价: 5.00 元

春秋笔

- ②周恩来与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 南 山
⑥“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李 锐

英杰谱

- ①9宋时轮在北平军调部 宋任远
②1因反对“突出政治”
被迫害致死的肖向荣 张广华
②5柳亚子的丰富生活经历 钱听涛

殒星篇

- ②8傅钟历尽曲折讲团结 张文苑

人海浪

- ③4李立三夫人李莎的传奇人生 李思慎
④2我和金门泅渡归来的周振德一段机缘 郭 锋
④7无名氏哺育世界名人
——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忆母亲教子 黄智敏
⑤0“只通物性，不通人性”的二哥韩修德 韩纯德

求实篇

- ⑤2八十重上黄山
——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胡绩伟
⑤7只唯实不唯上 平息“匡廪风波” 季 音

文荟园

- ⑥0先有风骨俊 始能翰墨香——记父亲楚图南
和几位书法家的交往 楚泽涵 楚泽湘 楚泽洋

遗闻录

- ⑥4张东荪几次原汁原味的演讲 黎 南
⑥8秦基伟一页欲哭无泪的历史 楚春秋
⑦0楚明法师传奇 陈浩望

耻辱柱

- ⑦2“四人帮”有匹好“马” 朱通华

九州景

- ⑦5走进神奇的滴水洞 陈淀国

赤子心

- ⑦6田家青醉心明清家具 肖 史

周恩来与 东方歌舞团的来了情

● 南 山

60年代,一个400人的艺术团,随政府代表团访缅,获得极大成功,引发了周恩来外交工作的新构想

1960年12月30日,北京首都机场,晴空万里,寒风习习。周恩来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赴缅参加缅甸国庆13周年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派出的最大的一个友好代表团。

周恩来一向视文化艺术交流为外交先行,所以这次出访,特意带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其成员主要来自总政歌舞团、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训练班、云南省歌舞团、中国京剧院及新疆、广东等省、区的文艺单位,共四百多人,对外文委副主任张致祥任团长。这个团,是随周恩来访缅的八个专业性代表团中最大的一个。

早一个多月前,周恩来就开始筹划随访的艺术代表团,并指示:除了要表演我国传统的民族歌舞和戏曲外,还要表演一些包括缅甸在内的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歌舞。

其中东方歌舞的演出重任落到了中央歌舞团东方舞蹈班的身上。

东方舞蹈班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搞起来的。1956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苏加诺。席间,北京舞蹈学校的演员表演了一个印度舞,引起了苏加诺的很大兴趣。苏加诺对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派一些印尼舞蹈专家到中国来传授印尼舞蹈艺术。周恩来当场表示欢迎。

东方舞蹈班成立后,学习了阿富汗、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日本等亚洲国家及一些非洲国家的舞蹈。

12月11日,周恩来特意召集东方舞蹈班的演员谈话。

“哪个东方国家的舞蹈难学?印度舞和缅甸舞哪一个难?”周恩来关切地问。

“印度舞难。”演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我看也是。印度舞比其他国家的舞蹈更有民族特点。它要求头、手、脚都要配合好,音乐节奏不容易掌握,掌握好必须下些功夫,你们要好好学习。本来请好了一个印度专家,但没能来,以后还是要想办法请

个专家。”

“东方舞有多少体系?”周恩来自问自答,掰着指头一个一个算了起来:“非洲先放一下,从伊朗以东算起,印度、巴基斯坦算一个体系,缅甸是一个体系,柬埔寨、泰国是一个体系,阿富汗、尼泊尔是一个体系,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体系,朝鲜、日本、蒙古各是一个体系……”

东方舞蹈班的演员们没料到周恩来对东方舞了解得如此全面深入,他们的眼中全都充溢着钦佩的神情。

当周恩来了解到东方舞蹈班仅十人时说:“这太少了,我看起码也得40个人。”

周恩来继续说:“咱们来订个计划吧,到1967年,起码应该发展到100人。到时东方舞蹈你们都应该掌握,而且范围应该扩大,亚非拉都要学。以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增加十几个人。”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对东方舞蹈班的全体人员是一次莫大的鼓舞。

东方舞蹈班在随周恩来访问缅甸前,专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紧张集训与排练。为了跳好缅甸舞,还请了缅甸专家杜钦纽女士作指导。



周恩来与东方歌舞团的演职员在一起
谢宴会。

1961年1月5日，缅甸首都仰光。新建的能容纳3000人的露天剧场座无虚席。随同周恩来访问缅甸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在此举行首场演出。缅甸的吴努总理、奈温将军陪同周恩来、陈毅等中国贵宾也在剧场观看演出。

中国的民族歌舞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表演缅甸歌舞时，演出进入了高潮。

台上张均和赵世中表演缅甸古典双人舞；台下观众如醉如痴。当他们跳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吴努总理激动地站了起来，高举双手，带头鼓掌。周恩来、陈毅等也站起来鼓掌，场内其他观众也都喇喇地站了起来。顿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整个剧场，大幕过了好长时间才闭上。吴努总理兴奋地对周恩来说：“演得太像了，能不能请演员们再为我们演一次，给我们的总统欣赏欣赏？”

第二天，缅甸总统吴温貌和夫人在总统府花园举行招待会，与身穿缅甸民族服装的周恩来等中国贵宾共叙友情。赵世中和张均为吴温貌总统表演的缅甸古典双人舞，博得了总统和夫人的一再赞扬。

1961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盛大的告别答

宴会上，大使馆的花园中，晚风和煦，乐曲悠扬。绿油油的草坪上，彩灯闪烁。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与应邀前来参加宴会的缅甸领导人吴温貌、吴努、奈温等及各国驻缅甸的大使和外交官频频举杯，依依惜别。

席间，中国艺术代表团一口气演出了14个亚洲国家的歌舞节目。台上台下，气氛异常热烈。许多国家把中国艺术家表演的节目看成是中国对他们国家的尊重和友好的表示。因此，每当演到哪个国家的歌舞时，哪个国家的大使就举着酒杯走到周恩来和陈毅面前表示祝贺和感谢。一些国家的大使当晚就打电报回国，把中国艺术代表团演出他们国家的歌舞当成是一种政治信息向国内首脑报告。

文艺演出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外交效果。周恩来也很兴奋。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和陈毅急忙来到后台，看望演员们。

周恩来与演员们围坐在一起，激动地说：“今天我看了这场演出非常高兴，不简单啊！今天的演出影响很大啊！那些大使们看了都高兴极了。你们演得很像呦！我们不要低估了这场演出，它的政治影响是非常

大的，通过我们表演东方各个国家的歌舞艺术，促进了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友谊，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过去，别的国家是看不起东方国家的，尤其是东方歌舞艺术，可是，现在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把东方歌舞艺术向这些国家的大使介绍过来，这个影响多大啊！”

大概是由于激动的缘故，周恩来说话时的动作和表情十分丰富。陈毅在一旁笑咪咪地频频点头。周恩来接着说：“今天的演出。东方班的这些小孩太累了，他们人太少了。出来一个节目是这几个人，再出来一个节目还是这几个人。这个事业一定要大大的发展，东方班要补充人。东方舞蹈不但东方班要学，我们各个歌舞团都要学，都要会跳。我们和这些国家搞友好，不只是嘴上说说就成了，也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学习他们歌舞艺术，也是搞友好的一种方法。”

第二天，在离开缅甸回国的专机上，周恩来、陈毅等似乎还沉浸在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演出场面中。周恩来对张致祥说：“这次回北京后，你和文化部好好研究一下，把昨天参加演出的那批娃娃保留下来，再

补充一些人,考虑成立一个东方歌舞团。”

陈毅连连点头,浓重的四川口音响彻了整个机舱:“要得,要得。”

周恩来还说:“不要小看这类文艺演出。他们是没有头衔的大使,可以起到我们的大使不能起到的作用。我们做不到的事,他们往往可以做到。”

成立东方歌舞团的事,就这样在飞机上决定了。

周恩来对赛福鼎说:“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花蕾到北京工作。”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亲自担起了东方歌舞团的人事调度工作

成立东方歌舞团,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调集演员。为此,周恩来亲自出马,从各省市自治区选调。

周恩来对那天晚上在中国驻缅甸使馆的告别宴会上一人表演了三个独舞的阿依吐拉印象很深刻。但是,阿依吐拉是从新疆歌舞团临时借调到访缅艺术团代表团的。于是,周恩来找到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赛福鼎·艾则孜,幽默地说:“我们想从新疆摘一朵花蕾到北京工作,你看怎么样?”

赛福鼎笑着说:“你说的话是指阿依吐拉吧?总理点名要,我举双手赞成,那有阻拦之理。这是新疆人民的骄傲。”

几天后,周恩来把阿依吐拉等几名新疆歌舞团的演员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作客。

周恩来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亲自给他们倒茶。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

“你们离开家很久了,想吃家乡饭了吧。今天特意给你们包的羊肉饺子,你们多吃一点,不要拘束。”周

恩来一边招呼,一边往大家的盘子里夹饺子。

周恩来问阿依吐拉:“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啊?”

“愿意。”阿依吐拉点了点头。不过,还以为周恩来只是随便问问,她此时还不知道要成立东方歌舞团。成立东方歌舞团在当时还是个秘密,仅限于几个有关负责人知道。

第二天一早,阿依吐拉还没起床,接待人员就把她叫醒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你们立即准备一下,搭乘今天的飞机回家看看,期限是五天。五天后回北京有新的任务。”

就这样,阿依吐拉此后就调到了东方歌舞团,成了东方歌舞团第一批演员之一。

东方歌舞团第一批演员张均、资华筠、徐杰及傣族著名舞蹈家刀美兰、白族歌唱家赵履珠,还有蒙古族舞蹈家莫德格玛、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等也都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调到东方歌舞团的。

在周恩来的细致周到的直接关怀下,东方歌舞团于1962年1月13日正式成立。那天,周恩来有事不能前去参加成立典礼,便特意委托陈毅前往。

在非洲舞被斥为“扭屁股的摇摆舞”的“左”的氛围里,周恩来正言:东方歌舞团不跳亚非拉舞算什么东方歌舞团?

周恩来为东方歌舞团确立的方针是: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的、优秀的、健康的、革命的歌舞蹈节目,同时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民族民间的优秀的、健康的、进步的歌舞蹈节目,以促进我国人民和亚非拉人民及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

然而,周恩来确定的这一方针,

在贯彻执行中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这主要是当时有人认为演外国的歌舞革命化程度不够,要求演我国革命现代化的节目。一些演员对演出外国歌舞也有顾虑,担心别人说自己不够“革命”。

1965年8月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后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到山东厅参加东方歌舞团的汇报演出晚会。会后,李富春对张均说:“你们最近刚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回来?听说你们在柬埔寨的演出很好。”

张均说:“不是太好。现在我们对他们那些仙女、王子的东西都不爱跳了,也不爱练了。有人说他们的这些节目离我们的革命化太远了。”

“那可不行。我们搞国际统一战线嘛!《赤道战鼓》给非洲外宾鼓舞很大。刚果的朋友们说,在中国的舞台上看到了刚果的情况,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正说着,周恩来走过来了。听到他们的谈话后,笑了,说:“噢,革命的也要跳,外国的也要跳嘛!”

演员李贞丽愁眉苦脸地告诉总理:“这次我们想尽了办法革命化,演了印尼的《女战士》,可有人还是觉得不怎么样。”

“《女战士》在印尼自己的国家是革命化了嘛。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要求人家。要是对所有国家都用我们的一个标准,那就犯主观主义了。”少顷,周恩来又说:“节目可分为两类嘛!一类是我们革命化的节目,另一类是介绍人家的,选人家一些好的歌舞,但不能用同一个要求。”

“为革命化的问题,我们仍很苦恼……”张均在旁边欲言又止。

周恩来说:“革命不能输出,人家的舞蹈是什么样就跳什么样。人家的国家是民主革命,我们不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群众提意见是对的,但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介绍。”

在那个动不动就可能扣上资产

阶级“毒草”帽子的年代里，东方歌舞团当初学习亚非一些国家的民族传统舞蹈时就心存顾虑。对此，周恩来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舞蹈风格，可以向中国观众介绍，只要演员表演时的精神面貌是健康的，就没有关系。

陈老总也风趣地说：“我才不相信，我们那么大一个中国，扭两下肚皮就把国家扭垮了。”

然而，尽管有周恩来和陈毅的支持，但东方歌舞团的一些演员对跳外国舞，尤其是那些热情奔放的非洲民族舞，心中还有顾虑。

一次，周恩来从罗瑞卿那里了解这一情况后，再次对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说：“你们是东方歌舞团嘛，不把亚非拉舞跳好，还叫什么东方歌舞团？柬埔寨这个国家的舞蹈有它自己的特点，宫廷式的，你们把他们的舞蹈动作程式改了，就对人家不尊重了，人家就会有意见。文化这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不能强加于人，要不就要犯主观主义。”

东方歌舞团的一位演员说：“我们去北非学了很多舞蹈，他们的舞蹈都是扭胯扭得比较厉害的，观众看了接收不了。”

周恩来说：“非洲的舞蹈都是动胯的，这是他们的民族特点，你们都要改了，就没特点了，不叫非洲舞了，但你们可以动得含蓄些。”

“你们去越南什么时候走？”周恩来问东方歌舞团团长田雨。

“延迟到今年一月中旬走。”

“带了些什么节目？”

“以中国舞为基础，越南的节目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那就好嘛。”周恩来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周恩来说过多次：“东方歌舞团要扩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十年浩

劫，江青下令拆散东方歌舞团。周恩来魂归大地情未了

东方歌舞团成立时，人员仅30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也不到100人，还包括其他工作人员，能上台的演员人数就更少。但东方歌舞团担负的外事演出任务特别重，常常是一个演员在一场演出中走马灯似地接连上场。这样，既累了演员们，又影响演出质量。对此，周恩来多次说过：东方歌舞团要扩大，要下决心调人。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14国。3月中旬，周恩来和陈毅回到北京。

3月24日晚，陈毅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答谢中国领导人刚访问过的这些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也出席了。席间，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们表演了14个亚非国家及阿尔巴尼亚的歌舞。

由于演员人数少，表演的节目又多，演员们累得够呛，有的人一人上五六个节目。

3月26日，东方歌舞团接到通知，有关领导和演员晚上到中南海紫光阁，总理要接见。

听完东方歌舞团的领导汇报后，周恩来说：“看来，东方歌舞团还没有完全建成，”周恩来面露沉思，“人太少了，到现在才不到100人，能表演的才50多人，独唱才一人，大家又歌又舞。前天表演15个国家的节目，听说一人就上了五六个节目，外宾连演员的面孔都认识了。你们劳苦功高，但也太累了。”

周恩来脸部表情严肃，气氛变得有点凝重，继续说：“东方歌舞团要扩大，文化部、外办要开会研究一下，至少要扩大到300人。还要设立政治处。几十个国家，这么点人，怎么够？”

“你们学习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一些国家的舞蹈，他们也要你们教我们国家的民族舞蹈，这样，你们300人都不够。要下决心调人，从歌舞团、部队调。

“搞艺术的没有感性知识不行，”周恩来摇了摇手，“你们去外国学习了两个多月，时间太短了，应该长一些，至少要半年或是一年，不仅要学舞蹈，还要学语言，还要做政治工作。”

这次谈话后，东方歌舞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一个把东方歌舞团扩大至300人的编制草案报告。其中包括团部29人、艺术研究室30人，舞蹈队111人，乐队65人，歌唱队29人，舞台工作队22人，学员班14人。

报告还提出：外调演员拟从部队、地方歌舞团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舞蹈学校抽调，请文化部艺术局尽早考虑外调演员的户口问题。外调演员最好在今年年底陆续调齐，以便准备明年参加亚非会议的演出节目。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周恩来自己恐怕也想不到，他提出的扩大东方歌舞团的计划竟是好梦难圆。

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艺战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来自政治上“左”的干扰越来越厉害了。等到东方歌舞团从非洲访问演出回来，立即就面临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下放到农村“蹲点”。

1965年1月27日，还是在紫光阁，周恩来找东方歌舞团的田雨等有关负责人谈话。

“我去年出国回来就在这里讲了要把你们团扩大，要搞政治，要谈政治，后来，因为你们要出国，就把这件事暂时放下了。你们出国回来后，又搞大歌舞，又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一直没有把扩大的事情谈定。”周恩来的神色显得有点疲惫，语调异常地沉缓。

“你们团现在有多少人？”周恩来问田雨。

“连学员算在一起，一共130人。”

周恩来转动着手中的一支铅笔，沉思了一会，说：“扩大的问题以后再考虑，你们的报告还放在我这里。”

田雨等人从周恩来的神色中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心绪，心头隐隐约约地涌起些许不祥的预感。

周恩来的这番话，既有自己的许诺没能兑现的歉意，又隐含许多难言的苦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非但周恩来关于东方歌舞团扩大的指示难以落实，而且东方歌舞团的生存条件也越来越恶化了，“东方音乐是靡靡之音”、“非洲舞都是扭屁股的摇摆舞”等“左”的大棒接连打来。

江青在一次大范围的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一些所谓的文艺节目，美其名曰“民族音乐”、“民歌”，其实是很下流的。那叫什么舞呢？在资本主义世界就叫摇摆舞。穿着解放军的衣服在那里扭来扭去的，气得我根本不能睡觉。

据说，江青还下令要彻底解散东方歌舞团。

后来，东方歌舞团与其他一些文艺团体合并，演员下放到河北进行劳动锻炼。

在一片内乱之中苦撑着华夏危局的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东方歌舞团的演员了。他心里惦记着。

1970年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機會，原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李亚媛被借调到一个为外宾演出的晚会担任报幕员。那天，周恩来正好陪外宾观看演出。他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深情地对李亚媛说：“你们忘记没忘记非洲舞？没有忘记就好。东方歌舞团这个名字很光荣，你们要保持这个光荣称号。”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既有对东方歌舞团过去成绩的肯定，也有对

东方歌舞团被拆散的愤懑，和重建东方歌舞团的决心、嘱托和希望。

1971年9月，蒙古温都尔汗荒野的那团烈火，宣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彻底覆亡。周恩来抓住林彪集团灭亡的契机，在各个领域大力纠“左”，以扶正中华民族这艘巨轮的航向。

1972年，周恩来通过外交部，以招待外宾演出的名义指示将东方歌舞团的演员调回北京参加演出。

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终于见到了他们日夜思念的总理。然而，总理的样子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而是面容瘦削，步履沉重，眉宇间透出深深的忧虑。当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围到周恩来的身边时，千言万语涌塞心头，瞬间又化作滚滚的泪水。

此时此景，周恩来的心情也不好受。他关切地询问大家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当场指示在场的“四人帮”在文化组的一个亲信：就调回下放的文艺团体写一个报告。

然而，尽管林彪集团已彻底灭亡，但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要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依然乌云浓重，周恩来的指示，迟迟得不到落实。

1976年1月8日，神州颤抖，天地同泣。周恩来带着对东方歌舞团的未了情，带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深深牵挂，永别尘寰。

妖魔逞威终有时。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一年之后，东方歌舞团恢复原建制。

周恩来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周恩来对东方歌舞团非同寻常的关心只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周恩来对艺术事业的关怀和对艺术家们的深情，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包容的如此丰富的人文精神，则成了凝结在一代又一代东方歌舞团和所有艺术家们心头的永恒。

（责任编辑 一 尘）

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

● 李 锐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第4卷,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但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同样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演出生动威武的戏剧,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决定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理论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之时,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出现的巨大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的资本主义已经有极大的不同。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区别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发生。可是事实上,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直接分配社会劳动,取消商品、货币,

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不可避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其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长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促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模式中,还可以附带提到北欧、西欧一些福利国家,如瑞典、丹麦、荷兰等等,就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来说是资本主义的,但已有了较多的公有制。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

军事工业。30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战后全球普遍发展和加速现代化过程中,仍继续坚持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计划经济体制、封闭的对外关系,使得经济长期停滞,科技相对落后,加以改革的失败,终于导致东欧剧变和前苏联的解体。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为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才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

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选》第5卷第296页)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50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的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个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1955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在指导思想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年12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

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2月中旬,毛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到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从1955年到19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

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勒紧裤带”。早在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又在当年那种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畸轻畸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

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同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1958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小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1957年的24.9%,陡然超过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比上半年增长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

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多少关系。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论点”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如西谚所说:伟大与可笑相差一步。在成都会议上,毛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怖,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奇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显示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想象的束缚。“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政治斗争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不过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

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间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的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当然也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我们这些人个别随谈时，毛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主义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我们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气势而论，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份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质的变更；不是放下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58年7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目。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当年王任重是很被毛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为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大兴讨伐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

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顿悟：在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王任重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目。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于：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

“大跃进”时期，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唯一一件是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要将它们释放出来，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大跃进”中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前面谈到，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或者说，也是一种对生产组织、制度的“超越”。毛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毛为什么要说得这样严重呢？核心在于他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搞一个大突破，超过前人的设想，超过前人的速度。而要实现这个抱负，就必须打破常规，运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搞群众运动的经验，人多力量大，只要焕发出六亿人民的干劲，天下哪有办不成的事情。应该说明的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根本是两回事情。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

风，来源于理论依赖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认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群众运动则是一种激励人们的手段，它具有规模大、力量强、激烈性和无序化等特征，同稳妥、科学、秩序化、条理性等等格格不入。在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往往能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或工作目的，如土地改革，参军支前，以至春耕秋收等等，革命形势成熟时，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即打翻旧的统治制度。这是为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是以“革命的冲天干劲”的面貌出现的，针对的正是计划与平衡、规章和制度，以及一切经济生活必须遵从的程序和秩序，它们的外在关系和内在联系。这些“正规化”的东西，应当说从理性到感性，毛都是很熟悉的，他没有过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他早就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因为计划与平衡就来自国务院，毛认为国务院、尤其是计划工作是搞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束缚了人的手脚，影响群众的热情，即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多次谈到规章制度问题，认为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要同群众见面，不适用的应当改革。实质上，这同批判反冒进的“保守”、“右倾”是一个意思。《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社论《打破旧的平衡，建设新的平衡》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简直惶恐得很，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因此社论提出：“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要求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篇社论将平衡视作庸俗，等于贬低了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于是为一轰而起的乱来开了方便之门，通了畅行之道。毛对国务院工作的不满，还在于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几十个部委，平均使用力量，没有抓住纲。于是提出“以钢为纲”等口号，三个元帅、两个先锋的说法。造成全民办钢，各行各业为钢铁让路的局面。破除条条框框，大搞群众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1958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在视察了安徽几个钢铁厂以后，曾感慨地谈到：“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这些话同其后几千万人搞小土炉，所谓群众性大炼钢铁有直接关系。王鹤寿10月29日给中央

的报告中就说：“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毛即予批示：“此件很好。这是我要鹤寿写的。”可见钢铁战线上“一场真的革命”，也是毛亲自发动起来的。此事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超越”苏联的经验。“大跃进”中批判“马钢宪法”，搞两参一改三结合，实际是否定苏联搞工业的方法。认为“马钢宪法”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还加以“不准革命”的罪名，实际的着眼点还在于实行工业上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也就附带破除了“马钢宪法”。至于“小土群”遍地开花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尤其是大量破坏森林，多年也难以恢复。但当时搞这些乱来的东西，却被说成是“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的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跟群众的需要相距甚远。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怂动起来，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人们必须制定各种规章及责任制度，这是现代化生产所必然的要求，任何人为的“超越”都将自讨苦吃。“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乱来的作法，为我们民族留下了长久而惨痛的教训。

实现经济建设的高速度，是毛梦寐以求的。高速度绝非坏事，但要看怎样来实行。前文说过，我们所取的建设模式本身即是一种“加速”型模式，极易诱发急于求成，但就“大跃进”发动的过程看，导致急于求成，又有特定的国际因素和主观作用的交互影响。毛很早就对苏联的建设速度表示怀疑，多次讲到我们自己能否快一点的问题，并认为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快一些。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前后，即有这样的想法，但提法上是借鉴苏联经验，少走一些弯路。1957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情绪高昂，一再讲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按，此处所讲“技术革命”是广义的，指政治以外的经济建设，而不是狭义的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但后者也包括

在其中）。而就在此时，国际局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动。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趋向缓和。5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世界局势不再像二次大战结束时那样两个阵营间剑拔弩张。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判断世界形势正趋向缓和。苏联方面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这种形势对“大跃进”运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和平竞赛”的口号，本身即含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挑战的意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又提出在今后15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已经有些自不量力了。但毛泽东的气魄更大，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并提出中国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年底，刘少奇将这个口号正式公开出来，全国一片欢欣鼓舞。后来，“赶超”时间一再缩短，1958年5月，毛曾决心再过一年在钢产量上“首先超过英国”，预计到1962年时，“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在赶超英美的同时，自然也就超过苏联了。多年以来，对苏联憋了一口气，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就说过：“我们是不是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到1958年，就这样谈到：“我们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也不对外公布。”因此毛要为“发明‘跃进’这伟大口号的人授一号博士头衔”。前文已经提到，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获得了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已经是超高速发展了。沙俄时期，尽管经济落后，但已奠定了较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基础。30年代斯大林大力发展工业，使苏联经济迅速强大起来。相形之下，旧中国的经济基础要薄弱得多，据西方的统计，我国5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苏联1928年时的1/5稍强，工业设备、技术也落于苏联约三四十年，人口则为苏联四倍左右（马寅初至1959年仍坚持说：“我们要快，人多就是个大负担”）。这些差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单凭主观愿望就能一蹴而就之事。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行“赶超”战略，其状况必然是打破平衡，疾进疾退，伤了整个经济的元气。《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平衡思想、辩证关系，时隔两年到1958年已经丢得无影无踪了。美国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麦克法

夸尔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感到大惑不解,他判断说:“或许,毛从未完全接受他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经济思想,那些思想看上去不像他自己的”。《论十大关系》中的思想当然应该说是源自于毛,是他当时听取各经济部门汇报后深入思考的产物。但随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本人既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鼓舞,又为求强求快的思想所催促,迷信群众运动等经验,在一系列自制的假象面前,主观主义日益膨胀起来。加之1956年底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我们实际上已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立场上后退,放弃了八大对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批评与警惕,从而助长了党内个人意见至上的传统,随即扩大了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柯庆施、康生等人在中央会议上,正式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正是造成“大跃进”错误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回顾起来,当全党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作战略性转移,需要特别小心警惕之时,毛泽东却日渐骄傲、自负起来。他越来越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展一人专断的局面。这也同回顾历史正面经验有关,促使他只迷信自己的一套,赞赏“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此话列宁说过,斗争王明路线时毛也说过)这样的话,表示过“只要正确,就不要推,不如我独裁”的想法。因此批判“反冒进”同反右派斗争相联系,早已越过了经济发展方针的分歧本身;实质上是毛个人否定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严重事件。而对“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的否定,则基本上改变了当年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状态下,毛个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到快得不能再快的地步,也不会再受到任何制约了。终于形成上上下下察颜观色的局面。如钢产指标一再加码,粮食产量一升再升;在几年之内,不仅超过英国不算回事,就是超过美国也理所当然。回顾起来,这是多么荒谬可笑的事情!郑州会议开始提出所有制方面乱来的问题之后,毛仍不愿降低钢产量的指标。1959年庐山会议一个“反击”,“大跃进”又起高潮。直到1960年9月,局面明显严重了,才被迫同意调整,而此时国家的经济已沉痾难起了。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1961年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实际只有4000亿

斤(公布7500亿斤),1959年降到3400亿斤,1960年又降到2870亿斤,1961年2800亿斤,降到1951年水平。因此发生人口年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这种猛增猛降、大起大落自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结果,欲速而不达,“大跃进”事实上变成了“大跃进”。

“大跃进”年代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是当年毛泽东所试图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超越”。这个“超越”在思想和理论根源上,要比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和超高速发展深远得多。它的目的,是要进行一次社会性的大改造,或者说在改造社会主义方面进行一次前无古人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毛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认识,都全面表露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窥其堂奥。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超越”性的实践,并不如一般所说,仅指人民公社化运动——那只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已;这个“超越”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摹写或设想,包括了城市、农村、思想、理论、道德、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每一个人自身。因此,它是极其广大和复杂的党国体制和思想体系,是新旧观念交织在一起,又从主观出发而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个改造运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震动。遗憾的是,当时许多“观潮派”、“算帐派”和“攻击者”、“诋毁者”的话,却被历史证明是逆耳忠言,是真知灼见。

“大跃进”时期,毛围绕人民公社而构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或称设计的共产主义的远景,主要以旧的思想材料为源泉,例如关于“大公社”的思想,毛的设想大多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而来。1958年2、3月间,他在同陈伯达的谈话里,就说过公社政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4月在广州同刘少奇谈公社问题,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人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转述了毛对人民公社的具体构想,即乡村中的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各级学校、科研机构、各种服务行业、公共食堂,应有尽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实现,并将被超过,但仍能看到“新村主义”的明显遗痕。1958年7月,陈伯达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正式公布了毛对建立这种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的构想,即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也没有超出上述旧思想材料。毛的这些想

法一经透露,全国上下一片响应之声,徐水、七里营、范县等便率先“急闯”,生产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甚至消灭家庭都成了一时议题。城市也开始大办公社,家庭妇女和老少幼儿统统组织起来,尝试新的集体生产、集体生活。似乎整个中国社会一下就到了“大同”之境。

现在人们一般都承认,毛泽东上述关于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空想论”。这种判断当然是对的。但毛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大(政社合一,乡社合一)和“公”(扩大公有制范围,实行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共负盈亏,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为什么他要从旧的思想素材中汲取养料,塑造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面貌呢?直到去世时,他毫无反悔之意,还惟恐后人否定了他的这些作为。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基本思想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本身可能并非是错误的,如追求人的平等、社会的公正等等。其谬误性在于“空想”是从单纯的想象出发,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可以不依赖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而发展的社会形态。再深入一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公正、平等和对公有制的追求,正是对贫穷、分散、分化、偏私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空想的美好,正是对社会丑恶的折射。无论西方的空想论者如欧文、傅立叶、圣西门,还是东方的康有为等等,无不从此出发去阐述自己的理想和设计。对他们说来,公有制或共有制度是解决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的最佳选择。换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把解决生产力问题放在改造社会的首位,而是寄希望于在分配原则上实现较高的社会公平,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与贫穷的关键。事实上,这是一种“社会拉平”主义,即平均主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易于接受公有制的原因,恐怕亦在于此。科学社会主义要始终同平均主义作斗争的根源,也出于这个原因。

毛泽东在深层意识上,是否受这种产生于落后经济条件下的空想影响,实值得后人研究。早年,由于家庭身世的原因,他对旧中国特别严重的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已有了深刻的感触和一定的思考。1918年以前,他在自学和作为学生寄身于湖南第一师范五六年中,曾读了大量的经世济民的书籍。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

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乃至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这些思想材料无疑给他的思想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族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可见旧思想材料中的乌托邦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很强的共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即投身于长期的革命斗争,激烈的武装斗争,人类历史罕见的艰苦环境,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下,长期受压制受委屈的处境,使他经受了极大的锻炼,也积蓄了很高的才智,他终于创造了一整套在落后国家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和经验,这几乎使他享有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武装斗争之父”的声誉。但是,武装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实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又是一回事。对于建造新的社会,他的思想认识是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毛在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方面,最不熟悉、未彻底接受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第一性”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他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希望“向地球开战,甚至是以冒进的形式,牺牲平衡方式,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但那更多地是从“求强”,从“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愿望出发。至于如何科学地发展生产力,求得人民的富足,在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的基础上再考虑向新的社会阶段过渡,则是非第一位的构想。相反,他甚至顾虑人富了,要变质,“变修”,因此要“趁穷过渡”等等。他留恋的、肯定的是战争年代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可以使人的精神境界纯洁高昂,使人的精神得到某种升华。

“趁穷过渡”具有典型的“空想”特征,也表现了毛宁愿以一种更高的公有制,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来解决社会差别的意识。显然,在经济条件十分低下的状态中,设计和追求社会组织的“大”和“公”,是典型的“空想主义”和乌托邦——因为它们离开了时间、空间和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早在合作化初期,毛就主张迈开快步伐,其主要的担

扰,就是如搞不及时,会出现两级分化。1953年关于山西合作化的争论,1955年对“小脚女人”的批判,无不反映了他的这种求“公”意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之后,于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真正提上了日程。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毛当然不是未予理解,但他更有兴趣的,是对社会的改造,是社会关系和所有制的改造,是求得真正的公正、共有与平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所以后来那样钟情于搞“学大寨”运动。可以说,这是他晚年的愿望所在。一当群众中出现生产上的联合愿望,他立即捕捉到这一“深刻”的社会动向,提出了“人民公社”和一整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而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在生产力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时,人为地提高所有制的程度,或人为地拉平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别,以为如此一来,社会的共有和公正就实现了。说到底,这仅仅是一种小农的“共产主义”。

果然,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一切落后的东西都破网而出,最典型的就是破坏性极大又屡禁难止的“共产风”,“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县共社的产,社共队的产,队共农民的产,打的都是共产主义的旗号。于是较为富裕的农民杀猪卖牲口,有的生产队干脆组织起来进行“瞒产”,站岗放哨,像战争中对待敌人一样。由于那些类似“新村”的作法,如生活集体化、公社食堂等等,不久即引起农民的反,只是在政治压力下强行维持一时而已,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验,可以说在几个月中就遭到失败。

1958年11月以后,他开始了解到农村中急于过渡,已引起了一片混乱,于是提出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划线的问题。1959年初,又不得不确立基本队有制(大队)的原则,以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对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践寄予深情和厚望。例如1958年11月6日对《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范县在两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是什么呢?还是那一套所谓“把全县九百九十三三个自然村在三年内合并为二十五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的吹牛皮,所谓“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这套小农式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确实始终极感

兴趣。1958年12月7日、10日,他又在印发《张鲁传》的批语中写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可见其感情与意识中同传统中国的空想主义有很深的沟通。他希望在中国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而又始终解脱不开经济、文化都处于很低水平的农民空想运动这个情结,当然是无法实现“超越”的。有人说,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点燃了一个幻想,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五七指标》(《五七指示》是人民公社的继续发展),来达到那个“圣境”,结果屡遭挫折。我则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既有十分高远的想象,又有丰厚的历史素养,独独缺少对人类(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普遍规律的了解,其中有为马克思所总结过的,也有马克思以后一百多年尤其是二次大战后新发展的,他都不熟悉,或者茫无所知;同时又违背革命年代自己的经验,急于求成,不是脚踏中国实际,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终于造成了晚年的悲剧。

当然,仅仅从旧的思想材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对毛的影响,去分析他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这还是很不够的。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他读过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但有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曾对他的空想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形成了某种“发展”了的状态,今天很多人把这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在这方面,“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法权”应译“权利”),即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58年11月,毛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有如下一段批语:“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这番话表明,毛并非不了解共产主义要有极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作基础的道理。但问题是,毛感觉到文章要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产品上面,即寻找一条具体和“创新”的道路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恰恰是斯大林未能解答的。毛泽东认为,全党大办工农业,几个并举和群众运动,是高速发

展生产的最有效办法。而在上层建筑特别是观念形态领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则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途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这个思想。

从“大跃进”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垂暮之年,毛泽东几乎从未放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其执著简直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地。1975年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观念推向最后的高潮。毛的这种执著确实值得加以分析。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提出共产主义要划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理论上的科学预见性。但他又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权利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事实的不平等。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权利问题就被说死了,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权利已被剥夺了,但在交换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权利还存在着,由此造成的事实的不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国家则成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在理论上就成了难翻之案。马克思、列宁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已建成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东欧的党内,并没有引起后来像中国那样高度的理论重视,却在毛的思想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以致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这是有深刻思想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空想式的社会主义观念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发生了“共鸣”。

前文说过“空想”的错误性不在于“空想”本身,而在于它脱离了时间和条件,把目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当作一种真实。毛泽东受小农经济影响而产生的空想论,刚好可以马克思、列宁的“资产阶级权利论”为“武装”。毛的这种空想,既企求在低物质水平上实现社会平均与公正的特征的思想,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依据,因此,他试图在现阶段就消灭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例如级别、地位、薪水,乃至商品、货币等等,甚至认为这些差别是万恶之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看来,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践,于是提出恢复供给制;通过所谓教育革命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干部下放,来缩小城乡差别,等等作法风行于世。似乎这样一认真推行,马上就可以达到理想之境了。毛泽东在倡导破除法权时,又常常带着对以往的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依恋,认为:“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8小时的工作制,上下

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进城后,后退了。”于是填补这些“鸿沟”,要超越。这些想法同他脱离实际的空想论,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但这种貌似“超越”的做法和追求,并不能使社会前进,而是向低经济水平的社会形态靠拢,其平均主义的目标模式,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高速发展生产力,实行商品生产,更同今天实践的市场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能再世的话,他们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所呈现的复杂变化,相信也会重新考虑“资产阶级权利”问题的。至少我们原来估计的资本主义已处于其最后阶段,通过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国家,进入一个完全公有制,没有商品,只用“劳动券”的社会构想,已是不现实的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再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途径,首先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再进一步追求均富,而不是立即消除一切不平等,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穷过渡”的方式,这种观点已逐渐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证实、所认同。至于何时才能实现《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描述,那还是极其遥远的事情,甚至应该不做现实的考虑。在这样的意义上,除必须指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固有的空想主义一面外,还应承认他所接受的理论的历史局限,他毕竟也只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领袖。他发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所遭到的失败,应该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我在《龙胆紫集》中有这样的句子:看事容易做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倾囊赌棍然。这是指毛晚年许多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作法,并希望大家能引以为鉴。不要用“付学费”一语,对错误曲折辩护。“大跃进”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我们子孙后代都应不断从中吸取教训。除需要在加强党内民主、政治民主方面去反思以外,更应研究我们怎样违背了客观规律和为什么会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正如我开篇所说,历史为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是有限度的,任何试图跨出这个舞台,作“超越历史”的努力,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遭败绩。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判断是完全正确

的：“总路线，大跃进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遗憾的是，党没有有效地制止毛泽东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以致他将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端。“大跃进”作为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超越”，已经由历史来证明是办了蠢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对导致这种错误的主观意志论和不负责的政治随意性，加以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党或者某个人（掌权的人）还会不会再干类似的蠢事，我们这个民族还会不会再次陷入类似的“狂热”（请不要忘记1978年经济上的新冒进）？这个问题似很难作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尤其因为事实上还有“理论家”或“权威人士”在写洋洋大文，想根本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国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想根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他们留恋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也要一分为二等等。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关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两大错误：“大跃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虽然党已经做了彻底否定的正式《决议》，但是想翻案的确还大有人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之加以彻底的总结，经过这样的总结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才能从彻底批判错误中建立起来。

国内版

邮发代号：2-10

中华儿女

0元，全年订价2元，可以破季订阅。
文字生动可读，照片独具魅力，零售价
国际流行大5开本，88页，彩封胶印，

中华儿女

中国人物传记的权威刊物！

《中华儿女》杂志贴近党的基本路线而不生硬僵化；贴近历史的真实，而不违反纪律；贴近群众，而不媚俗；贴近生活，而不迎合低级趣味；贴近人性，而不丧失党性原则

《中华儿女》国内版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国县以上五大机关领导，中央、国家机关正局以上干部人手一册；《中华儿女》海外版走上香港书摊，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发行。

百分之百纪实文学作品
百分之百独家文章

中华儿女

国际流行大5开本，88页，全彩色精美印刷，中文繁体字，内容与国内版完全不同，
零售价2元，全年订价20元，可以破季订阅。

海外版

邮发代号：82-63

欢迎订阅 98年度《中华儿女》

《中华儿女》由团中央主管，全国青联主办，集名家手笔，“独家首发”，深层次高品味揭示当代伟人、名人和各界百姓的人生际遇、情感波澜、成功奥秘。

地址：北京右安门外东三条1号中华儿女杂志社发行部。

邮编：100054

电话：(010)63555187-405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作家文摘

《作家文摘》以关注热点、荟萃精品为宗旨，依靠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展示文艺界最新创作成就，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熔文学性、新闻性、趣味性为一炉的九十年代文化快餐。

《作家文摘》每周出版一期，4开16版，辟有众多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栏目，视野开阔，选编精当，真实生动，品位高雅。

《作家文摘》自1993年元旦创刊以来，已跃为首都零售量最大的周报，愿在新的一年里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关怀与厚爱！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222 邮发代号 1-190

零售：每份1元 订阅优惠：每份0.80元

月价：3.40元 季价：10.20元

半年价：20.40元 全年价：40.80元

18

宋时轮在北平军调部

斗智斗勇

● 宋任远

1946年1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政府的郑介民和美国的饶伯森。其主要任务是：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反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

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组织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

叶剑英在北京饭店2楼112房间接见了宋时轮。叶剑英告诉他，领导决定任命他为军调部我方执行处处长，与李聚奎副处长共同负责执行处的工作；为了工作方便，同时授予他少将军衔。叶剑英说：“你来自前线，口才也好，又熟悉一个战区的情况，对解决山东问题有帮助。”宋时轮当即表示：有您“参座”的直接领导，有同志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根据三方商定，各方代表均于1946年的1月26日到

位，而在此限期内，我方的代表尚未到齐。于是，美、蒋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问题攻击，说我故意拖延时间，是别有用心。宋时轮分析了主要原因在于我方选调代表要求高，花费时间多。而国民党方面大多是利用了在北平的现成的特务机构，所需人员随要随到。在一次三方执行处会议上，宋时轮抓住机会反击说：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都是各地区、各部队的领导干部，如委员叶剑英是我军的参谋长，顾问饶漱石是我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罗瑞卿是我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临汾小组我方代表陈赓是北伐军和八路军的名将……这说明我方对进行军事调处、争取实现和平是诚心诚意、认真负责的。这样选调人员，自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国民党方面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则绝大多数都是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的特务。如委员郑介民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和军令部二厅厅长，顾问郭子明是军统局中共研究科科长，其他代表邹陆夫、黄长新、黄维勤、胡屏翰、肖凤歧、董承烈、潘志民、黄新界、涂叙玉、温一等等等，也都是来自军统。在这样现成的机构里选调人员，当

然可以作到随要随到。但选调这样一些人到军调部来工作，对军事调处持何态度，有何企图，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美方有何理由就人员到位时间问题来指责我们呢？更何况我方已在积极克服通信困难，迅速调齐来军调部工作的全部人员。

这一反击，说得美、蒋方面哑口无言。“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以郑介民为首的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给中共的反击提供了口实，是非常愚蠢的。

国民党政府代表还经常制造一些假情报，诬蔑我军违反停战协议，还把他们的部队挑起的事端，转嫁到我军身上。为了辨明真假是非，有理有利地进行斗争，要求执行处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有关的情报。这是宋时轮到职后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宋时轮十分重视搜集整理情报的工作。他立即向领导建议，在执行处内设立情报科，任命安东为科长，迅速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由于执行处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及时掌握了有军事冲突地区的斗争情况，和国民党部署在内战前线部队的动向

及其企图，在会谈中，我方代表发言有理有据，斗争十分有力，先后揭穿了国民党方面捏造的假情报共109件。

由于国民党“内战灭共”的方针早已确定，在谈判期间出现了边谈边打的局面。宋时轮研究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多种方案。他向领导建议：应力争向我军力量薄弱的重要地区、敌军有重兵集结和有可能向我发动进攻的地区，尽早派出执行小组，以预防争端的发生。经过半年的努力，促使军调部根据我方的要求，先后向赤峰、太原、沁县、广州、汉口、新乡、承德、大同、沈阳等地区派出了29个执行小组。这对保证停战令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贯彻实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上半年，东北地区硝烟滚滚，炮火连天，东北形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国时局的发展。国民党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声称东北只

有接收主权的问题，而无军事调处可言。为了彻底戳穿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谎言，在三方执行处长会议讨论东北问题时，宋时轮多次义正词严地揭露他们的阴险目的，并清楚地阐明了我党的原则立场。所有军事冲突必须一律停止，东北应该执行停战令，派执行小组前往监督停战。国民党政府可以调动军队去原苏军驻地接收主权，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进攻我军和解放区；而且，接收东北的主权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都有的权利，国民党政府也不能独霸。

由于我方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于6月初宣布了在东北实行休战的决定，使东北地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仍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中原地区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导火索。我方为了减少扩大内战的危险，坚持要求将我军部队迅速撤出中原：

国民党为了保留这个扩大内战的导火索，坚持不让中原我军撤离，企图伺机借以挑起事端。宋时轮指出：停战令公布后，中原我军应迅速撤往其他地区。国民党政府却坚持不让中原我军转移，相反还以重兵相包围。这是破坏停战协议、继续扩大内战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停止这一罪恶活动，美方代表也应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制止事态扩大。由于这些发言有理有据、触及了国民党方面的要害，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方的要求。5月，在三方签订《汉口协议》后，宋时轮又迅速对《协议》的实行问题，在军调部内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交涉，保证我中原军区于5月中旬安全地转移了两千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和部分地方干部。

1946年5月15日下午6时45分，宋时轮外出办完公事后乘车返回北京饭店。途经八面槽南口闹市区，车行较缓，突然遭到埋伏于此的国民党特务开枪射击。子弹从宋时轮面前飞过，汽车中弹后出现颠簸。在此瞬间，宋时轮迅速指挥司机，开足马力冲出险区。

宋时轮遇刺后，他对大家说：“国民党历来如此，明的斗不过，就在暗中耍流氓，他们这样做，是企图促使我们停止谈判。因此，我们应该照常坚持斗争，绝不能让他们破坏和谈的阴谋得逞。”全面内战爆发后，和平调处已不可能。宋时轮奉命离开军调部重返山东前线，继续率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责任编辑 仲文）



1978年，宋时轮在示范土工作业

因反对“突出政治” 被迫害致死的肖向荣

● 张广华

1964年，全军大比武一浪高过一浪，一场竞技热潮铺天盖地卷向全国各行各业。林彪为了“纠偏”，于12月29日发出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责“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冲击了政治”，今后“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训练，冲击其他……”等等。

这一指示不仅在军队得到贯彻落实，而且地方各部门也必须认真执行。仅半年时间，部队的战斗技能训练停滞了，全国各行各业的生产能手、技术尖子也不敢提了，本来由此可带动的一场社会主义的科技革命，就此偃旗息鼓。

政治，这时仿佛成了飘忽不定的幽灵，让人难以琢磨。从1951年就出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肖向荣中将，在1965年7月2日的办公厅干部大会上做了“关于如何突出政治问题”的报告。他说：“突出政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也不能只是学学毛著、抓抓思想教育，应该把它与军事训练、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政治挂帅要与业务结合，要挂在业务上，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完成。研究突出政治，必须认真研究为解决业务工作上如何突出政治的问题，决不能被突出政治搞空了，那样不就成了空头政治吗？”

肖向荣这个报告触发了紧跟副统帅的一位领导人的嗅觉。7月9

日到22日，他主持召开了一个“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会后，搞了个《纪要》。《纪要》通篇讲的是突出“阶级斗争”、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工作”。肖向荣当即表示：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不能不讲啊！否则部队建设、机关业务工作怎么能搞好呢？

在8月上旬到中甸讨论如何贯彻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精神的军委办公厅党委扩大会议上，肖向荣要求与会同志要认真讨论政治工作如何保证业务任务的完成问题。为此，他再次重述了自己的观点：“政治工作是保证业务任务完成的，机关工作要着重解决好政治工作如何与业务结合，保证各方面业务工作的完成。机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在时间上出现矛盾时，应从全局出发，由党委和首长决定调整。

“机关里不能要求业务工作服从政治工作，不能把业务工作放在一边去搞政治活动。机关突出政治，要首先表现在业务工作上，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

“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党委的事情。处长应主要抓业务工作……”

为说服与会同志，肖向荣还联系个人实际说：“我这大半生在党的领导下大体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宣传工作，二是秘书工作。从1926年参加革命，1932年到军队，做政治工作的时间不算短了，难道我不知

道政治工作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工作必须结合实际，与实际任务相结合，搞空头政治是十分有害的啊！”

这段时间我在军委办公厅做秘书工作，我了解肖向荣曾在抗日战争初期主编过《八路军军政杂志》，同时，还编写了不少战士课本。他任东北民主联军宣传部长时，向中央军委写出了《辽东三纵队学习土地改革政策经验（诉苦）介绍之二》，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于是在全军形成了著名的新式整军运动。他的这个发言，在这个会上确实说服了不少人。肖向荣的这些话很快反映到林彪那里去了。叶群传话说：“林副主席要我告诉总参谋部，肖向荣的问题是严重的，要彻底揭发批判，肃清影响。”

1965年11月19日，有总参各单位领导与办公厅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在三座门会议厅开始进行。会上还特地印发了《近两年来肖向荣同志的错误言论》和《肖向荣同志8月9日到14日在办公厅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两份材料。大会的发言者集中在“肖向荣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等问题上进行批判，有人还给他扣上了“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的帽子。揭批肖向荣的大会开了几天，一位领导干部通知肖向荣：“罗瑞卿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你要



1959年，肖向荣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接见全军文艺汇演代表

与罗划清界限，揭发罗的问题。”

12月12日，肖向荣被人带到了上海。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此时已开了五天。14日下午，肖抵达上海后，有两位领导人四次与他谈话。“你到了向党交心的时候了，到了应该觉悟的时候了，机不可失啊！”

肖向荣知道，这是以人划线、以风划线。他冷静地回答两位领导：“我没有发现罗瑞卿同志有什么反党性质的问题，党委的活动，我们都是参加者，罗总长交办的事情，我了解，你们也都了解，都有文件可查！”他觉得犹未尽，进一步表明：“罗瑞卿长期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如果有什么反党活动，毛主席、党中央还不清楚吗？”他拒绝到会揭发。

谈话人无可奈何说：“你的问题还是回北京去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正在解决，在向外未公布之前，

绝对不能向他人去讲。”15日即把他送回北京。

批判肖向荣的大会在三座门继续进行。直到12月21日才告结束。我原以为对肖向荣批判后，按原某领导的意见让他去沈阳军区任副政治委员，可是有人指责他依然坚持“错误”，“抗拒党的挽救”，于是军委对他组织专案审查，要他继续交待“罪行”，从此行动自由也被剥夺了。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第三天，一份《关于肖向荣错误问题的报告》经林彪批准，以《军委文件》(66)17号下发全军。直到9月，肖向荣才见到这个歪曲事实的文件。他十分气愤，向组织提出：“关于指我是罗瑞卿反党一案的主要成员，根本不是事实”，并对文件中诬指他的内容逐条予以批驳。

1966年11月，总参在豁口总政排演场连续召开批斗肖向荣等人的大会。在批判肖向荣的发言中，除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等等以外，又增加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漏网分子”、“里通外国特务”等等罪名。

1966年12月24日，肖向荣被拉到工人体育馆。那天开的是批斗罗瑞卿的大会，郝治萍、肖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等均为陪斗。

1967年初，肖向荣被“监护审查”，离开他在景山西街的住所。

揪斗的高潮是1967年7月和8月。当时，“中央文革”号召要“痛打落水狗”，许许多多人民的功臣被拉上批斗台。在此期间，肖向荣三两天就被拉出去批斗一次。尤其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军队各大单位的“造反派”连续批斗彭德怀，肖向荣与谭政、张爱萍、廖汉生、王尚荣、李志民等高级将领，差不多每次都要出场陪斗。每个被揪斗的人，都被两个彪形大汉反提着胳膊，按低头部，即所谓的“喷气式”。这些批斗会，既狂热，又残酷，许多被揪斗者由于伤痛难忍、愤怒气恼，时常在揪斗中昏迷过去，境况之惨烈，我们这些与会者都目不忍睹。有一天，肖向荣被批斗后回到家，对夫人余慎说，造反派一上来就抓我头发。你把头发给我剪了。夫人马上给他推了个平头。随着无休无止的批斗，肖向荣身体越来越瘦了，余慎在每次批斗前，都杀一只鸡给肖向荣吃，以支持他的身体耗损。

1969年6月11日，关了两年肖向荣解除了“监护”，回到家中时，夫人余慎和孩子已早被弄到外地。他的妹妹大哭不已，肖向荣耐心地给妹妹做了思想工作，他自己却彻夜难眠。此后，戴着“三反分子”的帽子，与驻地公务员一起，天天参加打扫厕所。

10月21日，肖向荣被送到河南明港的总参“五七”学校，进行劳

动改造。他参加挖水渠、挖粪池、插秧、割稻、推车等劳动。差不多每天吃过晚饭，擦过冷水澡之后，他必做两件事情：一是利用劳动之余写诗作词。他是一位有名的军旅诗人，过去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写了不少诗词，到五七干校后，又有数十首新作。其内容多是反映劳动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情操的。二是给孩子讲解诗词，教育孩子。当时当兵的两个小女儿也在五七干校。当孩子由其他连队来看望他时，就常常高兴地为孩子讲解一些古诗词。

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关怀下，肖向荣于1972年夏天回到北京治病。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参谋长。

1975年3月，在张爱萍被军委任命为国防科委主任的同时，肖向荣被任命为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新的工作岗位，肖向荣是满意的。因为这是张爱萍特地邀他一起一同工作的。他们在长征前就相识，两人在总参又一起工作多年，均是总参党委成员，“文革”中，都有不幸的相同境遇，使他们进一步相互信任。1975年7月，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全面整顿军队纪律、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国防科工委常委会决定，由肖向荣负责拟定一个国防科委贯彻执行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工作纲要或工作计划。

肖向荣是军内闻名的笔杆子。过去在军委办公厅工作时，军委每年的《工作纲要》，都是由他拟定，经军委讨论通过后下发执行的。现在要他拟出这样一个工作纲要，对他来说是易如反掌的。

肖向荣起草的《工作纲要》很快在党委讨论通过。这个《纲要》下发后，对整顿国防科委的机关、部队，恢复和发展国防科研工作，发挥了

重要作用。

国防科委机关和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支持整顿的工作，有些坚持搞派性而不改悔的造反派头头，被调离了工作岗位，也有一些被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改造。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原来比较混乱的、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状况的单位，面貌很快有了新的改变，群众的心情开始振奋。

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爱萍抓整顿极为不满，攻击他是“复辟狂”，声言“要与他斗争到底”。肖向荣听到这类狂言，十分气愤，从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斥责说：“张爱萍同志是毛主席、党中央派到国防科委工作的，你们要同他斗争到底，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在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反映“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偏袒刘冰，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与此同时，毛泽东看了七机部造反派头头舒龙山11月1日写的诬告张爱萍的信后，在第二天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

是九一六左派。”由此开始，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形势骤然转折。11月8日，中共中央四位领导人把张爱萍叫到中南海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对张爱萍要帮。”并要他回去后尽快向单位进行传达。

1975年11月19日、20日，在中央指令下，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连续开了25个小时的会议，对张爱萍的“重大原则性错误”进行了“帮”，在国防科研战线上开始了“批邓联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两个单位8名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肖向荣理直气壮、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张爱萍同志9个月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他的主流是好的。”他的话音刚落，马上有人进行了批驳，并对肖向荣进行了批判。

11月底，肖向荣患了重感冒，咳嗽不止，高烧不退，转为肺气肿。经过几天治疗情况有所缓解，可是心脏病又相继发作，只得住进301医院。

12月6日，以国防科委党委常



肖向荣全家（1964年）

委和七机部党组联席会议形式，继续批判张爱萍，12月13日，王洪文到联席会上讲话，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名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当天下午，一些造反派又冲进医院，要肖向荣对“打倒邓小平”明确表态。肖向荣说：“我是共产党员，党中央没有要打倒他的文件，毛主席也没有这样说法，我个人不能表态。”造反派连续几次到医院围攻肖向荣，搞得他无法安心休息与治疗，他不得不在2月20日下午出院。301医院开的出院单上写道：“1、建议全休一个月；2、防过劳，门诊继续治疗；3、定期复查心电图，心绞痛发作频繁严密观察，防意外发生。”

那位批判会的主持者，不顾医院提出的要求，仍决定肖向荣立即参加批判会。到3月3日，肖向荣已成了扩大会议批判会的重点。七机部和国防科委的帮派头头成了会议的操纵者，在连续多天的围攻下，肖向荣实在觉得身体支持不下去了，但会议支持者仍不让他休息。

3月17日，肖向荣回到广安门总参招待所他那临时的家时，连上楼都很吃力了。他夫人余慎见状难过地说：“人都病成这个样子，还要让他参加会议挨批斗，这些人实在

没有人性。”

当天晚上，肖向荣一手拿着氧气瓶导管吸氧，一手写检查提纲。写完检查提纲已到了午夜。他觉得心中仍有些憋闷，连续服了两次硝酸甘油，方逐步缓解下来。

第二天上午，他吃点早饭就匆匆赶到会场。秘书劝他不要去了。他说：我比张爱萍同志年轻，我应该去顶住。可是当他来到会场却空无一人。他正在疑惑不解时，有个会议工作人员告诉他，上午王洪文要听取扩大会议情况汇报，大会改到明天再开。肖向荣又艰难地回到家中，刚躺在床上，顿觉全身乏力，翻身都很困难了。余慎劝他去医院看看，他说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吃点药会缓解的，随之服了两片硝酸甘油。

301医院的王士雯医生在3月19日上午来到肖向荣家中，经过初步检查，认为病情严重，必须立即住院。就在这时会场打来电话，要肖向荣马上去开会做检查。可是他已不能参加会议了。到了医院，很快确诊为心肌梗塞，随之就开始进行抢救。

在抢救过程中，余慎赶快给在东北工作的两个女儿发电报，让她们尽快回京看看病重的父亲。301医院则连续两次向国防科委报告肖向荣的严重病情。22日夜里，扩大会议派人到医院，说“你的问题以后

再说”，呆了几分钟就走了。肖向荣默然未语，实际这时他连说话也很困难了。

肖向荣病危时，他的老战友莫文骅等不少同志都前来看望。他以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在国防科委的工作做得是对的，全力把国防尖端武器搞上去是正确的嘛！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他的战友、亲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听了无不落泪。

3月23日中午，肖向荣病情进一步恶化。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人民解放军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奋斗了半个世纪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心脏，在下午2时40分停止了跳动。

肖向荣的追悼会于1976年4月2日下午在八宝山礼堂举行。笔者那天到达八宝山时，看到了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据说原来计划是300人，实际与会者1800多人，大多是自行赶来的。徐立清致悼词时，礼堂内外还传来阵阵悲泣声，实在令人心碎。

在追悼大会上，肖向荣的秘书潘长禹告诉我，肖向荣在国防科工委被批斗一共二十八场。

（张广华：原军委秘书，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仲文）

《追求》1998， 帮你发达，为你减压

《追求》杂志是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文化综合类月刊。

1998年《追求》杂志将继续保留原有名牌栏目，如本刊特稿、社会广角、昨天一页、时代潮、名人追踪、观察思考、学生时代、追求之歌、自己的故事、环球掠影等等，保持披露独家新闻、揭示历史内幕、追踪社会热点、讴歌拼搏精神的风格和特色。

1998年，本刊的出新项目是扩大心理咨询的分量，为处在社会转型期面临多种压力的各界人士（中考、高

考学生、求职人员、中老年心理变态、人际关系及婚恋家庭关系困惑人员等）进行心理减压。体贴小姐值班室、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心理治疗专家门诊、各种心理测量表、心理治疗成功实例、为你介绍心理医生、倾诉你的心理苦恼等栏目将隆重推出，还将开展各种活动。权威性、实用性、趣味性将是栏目的宗旨，以期帮你形成健全的人格、完美的心理品质，笑迎人生的各种挑战，永远成为赢家。

本刊1998年不涨价，仍为每期3.00元，全年价36.00元。每月2日出版，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代号2—158。本刊电话：(010) 64034329，地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邮编100708，如在本刊办理全年邮购，优惠价为30元，丢失管补，免收邮费，联系人：王小姐。

柳亚子的丰富生活经历

● 钱听涛

今年5月28日，是柳亚子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胡乔木在1983年6月21日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25周年时，称道柳先生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杰出的革命诗人”。他作为诗人，是南社盟主，“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茅盾在1979年11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语）。这方面记述的文章甚多，特别是他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唱和，更加脍炙人口，我不拟再加赘述。但是，柳亚子的革命业绩却记述不多，我认为这方面也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这里只是追述他的四件往事。

一、在本世纪初，无情地揭露清廷的腐朽统治，热情地讴歌革命

柳亚子本来也曾信仰康梁的维新保皇学说，1902年上半年还在家乡吴江考中了秀才。但是这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清廷在1901年订立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对清廷再也不抱希望，而慢慢倾向孙中山领导的当时势力还很弱小的革命运动了。当时吴江人金松岑（天放）、陈巢南已加入了蔡元培等在上海设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并于1903年初在家乡吴江同里把书院改为学堂，在学堂门口挂起“中国教育会同里支部”的牌子。柳亚子由金松岑介绍，也加入了这些组织，并在自己家乡吴江黎里也组织了“黎里支部”，办了《新黎里》杂志，鼓吹新派学说，遭到地方守旧势力激烈反对。这时，金天放已到上海中国教育会担任会计，柳亚子和两个持相同观点的同乡就到上海，由金天放介绍到爱国学社附读。在这里结识了老师章太炎，以及不久前从日本留学被驱逐回国住在爱国学社的《革命军》作者邹容。章、邹是力主排满革命、反对保皇的，柳亚子进一步接受了这些思想。正在这时，作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舆论宣传的《苏报》，因为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激烈的言词遭到清廷与租界当局合谋镇压。

1903年6月30日，爆发了有名的《苏报》案，章太炎被捕，邹容去捕房自首，蔡元培逃到青岛躲避。这些革命组织几乎解体或停止活动，东南一带革命势力受到很大摧残。柳亚子不久前已回乡暂避。

革命虽被镇压，思想是无法禁锢的。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这时因信仰卢梭天赋人权学说，反对君王专制，在一年前就改名人权，字亚卢（“亚洲的卢梭”）。后来因“卢”字笔画多，又改为亚子）。在家乡继续写作诗文，在革命刊物《国民日报》（《苏报》后身）及《江苏》上发表，并暗中与章太炎、邹容通信。1904年暑假中，柳亚子还到上海探视了正在西牢服刑的章太炎。1905年4月，邹容不堪黑狱折磨，仅20多岁即病死牢中，柳亚子悲痛万分。夏天，他到沪郊华泾邹容被草草埋葬的墓地去哭悼，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904年春，柳亚子加入金松岑在家乡办的同里自治学社，在此学习新学。这时蔡元培等又悄悄回到上海，恢复了中国教育会活动，重振了爱国女学，而且接受了从留日学生中传来的更激进的排满反清思想：认为革命必须进行暴动和暗杀。一个留日学生何海樵到上海，发展蔡元培加入了暗杀团。正巧，早年留日学习理化的浙江镇海人钟宪鬯（观光），在上海办了一个科学仪器供应机构“上海科学仪器馆”，又称“上海实学通艺馆”，下面附设一个理科传习所教授理化。钟宪鬯早已加入中国教育会，蔡元培就发展钟加入暗杀团，利用他的机构置办药料，教授化学，还教授催眠术。1905年暑假，柳亚子也到上海在理科传习所，向陶成章学习催眠术，并向钟宪鬯学习实用化学，“思制爆裂弹以实行暗杀”。但学习中途停止。他又想赴日本学陆军，因患伤寒病未成行。这时蔡元培把这个暗杀团发展为光复会，柳亚子也加入了光复会。1905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已成立了同盟会，蔡元培又成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这时，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高旭（天梅）及另一同盟会员陈巢南（去病）在上海办了一个健行公学，邀请柳亚子去教国文，柳亚子也就加入了同盟会。柳亚子把他与高、陈寓所（赁

居于上海八仙桥鼎吉里4号)署名为“夏寓”,实际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秘密机关。柳亚子从此成为同盟会、光复会两个革命团体的会员,坚定地走上了排满抗清、建立民国的革命道路。

柳亚子无畏的革命精神还可以从下面两首诗中得到证实。1904年他在同里学社学习时,这年10月是慈禧70岁寿诞,他竟写了《记事诗二首》:

毳服毡冠拜冕疏,谓他人母不知羞。

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誓国仇。

胡姬也学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

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同。

众所周知,慈禧当时权倾盖世,统治全国。一个江苏吴江十七八岁的少年居然写出这种大胆的革命诗句,直指这位最高统治者,这是何等气概!后来他在健行公学任教时,两江总督端方曾要逮捕他,这是可想而知的了。只是由于柳亚子的机敏,才未陷入罗网。

二、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与蒋介石的斗争

孙中山晚年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柳亚子在吴江积极响应,以老同盟会会员身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1924年6月,成立吴江县党部,柳亚子任常委。1925年8月,成立江苏省党部于上海,柳亚子任常委兼宣传部长。这一时期,他与共产党员侯绍裘、宛希俨、沈雁冰、杨贤江、王一知、杨之华、萧楚女、恽代英、李立三来往甚多。孙中山逝世后,他坚持三大政策,与西山会议派进行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员,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在会上坚决反对,何香凝气得拍案顿足,柳亚子对何香凝激烈的发言点头赞同,鼓掌助威。会后,他与江苏省党部的朱季恂、侯绍裘面见蒋介石,指着鼻子质问蒋:“你究竟是总理的信徒还是叛徒”,蒋介石还要狡辩,弄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事后,柳亚子找到恽代英,向恽说蒋介石将成为陈炯明第二,还不如趁早把他干掉。恽代英不好答复。柳亚子素来重感情,说罢流下热泪,恽代英十分感动。就是这一次,他在广州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饮茶粤海”,多年不忘。

1926年7月,蒋介石开始北伐,自以为羽翼渐丰。从1927年3月在江西指使党羽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开始,反动面目就日益暴露,终于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发动“四一二政变”。江苏省党部的共产党员侯绍裘、张应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在

南京,其他死难者还有省党部工人部长刘重民,青年部长宛希俨、商民部长黄竞西。真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柳亚子于1925年5月从广州返沪后,因为感到党内意见分歧,一气之下就回到吴江,不再出来。但蒋介石并未忘却柳亚子。1927年5月8日,反动派指令苏州地区派出军警,乘船直驶吴江黎里镇,于夜晚包围了柳亚子寓所。

柳家原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周元理所建的周赐福堂,共五进深院,门墙高大坚固。军警猛打猛撞也攻不开。家人听见外面人声鼎沸,知道有变。亚子夫人郑佩宜急中生智,即将柳亚子日常衣着用品收入箱柜,似乎柳亚子不在家中,然后把柳亚子藏入一个大壁橱,橱背是一扇暗门,机关开动,就通入一条夹弄,这是一条宽二尺五、长二丈四的复壁,柳亚子就藏身其中,橱内原来衣服杂物仍旧放妥,然后柳夫人带了幼女睡在床上,装作梦中惊醒的样子。这时反动军警已越墙而入,抓住男女佣工,大家均答:主人出门多天未归。当进入卧室见到柳夫人母女在床,12岁的女儿柳无垢说:“爹爹到上海去了,没有回来”。又抓到正在他家的亚子的妹妹及其孩子,孩子以稚嫩的口气回答:“娘舅到外国去了”。这时军警才信以为真。但为了交差,还是抓去了正住他家的妹丈凌吉六,押到苏州审问几次,毫无所获,只得放回。这一段惊心动魄的事迹,是柳亚子姨甥徐孝穆后来回忆写出,才得大白于世。

柳亚子匿复壁中,曾作绝命词一首: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称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坚子竟成名。

他出复壁后,化装潜赴上海。5月15日,他与夫人及长女无非用“唐隐芝”化名逃到日本。一直到1928年清明节,国内政治气氛已有变化,他才回到上海。

三、在皖南事变中怒斥国民党反动派

1940年12月13日,柳亚子乘亚洲皇后轮离开孤岛上海赴香港。柳的长女无非已在香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这时返沪拟携子赴港,正好照料父母,一同到了香港。

12月17日到港,廖梦醒去迎接,不久见到何香凝一家。这时正是国共关系紧张,蒋介石要向新四军开刀。何香凝约请宋庆龄、彭泽民、柳亚子四人开会,决定由柳亚子起草一个宣言,给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委员,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联共抗日,词既恳切,又极严正。1941年1月14日拟定。其间皖南事变已于6日发生,13日茂林血案,叶挺被扣,他们在港均不知道。国民党方面知道这一宣言后,就通过柳亚子当时邻居杜

月笙，还有黄定慧（黄慕兰，曾是中共党员）来劝说他们不要发表，并说发表将对叶挺不利。最后柳亚子拍案而别，不予理会。但因为国民党阻挠，这个宣言在香港及大后方各报未能发表，只是在社会上流传。直到同年2月9日，才由延安《新中华报》刊载。这时柳亚子等仍写信给重庆要人，竭力营救叶挺。

到4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柳亚子是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怕他不去重庆出席，就托中央秘书长叶恭绰（他是柳的南社老友）发函催促，又派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拉上杜月笙去面促。那知柳亚子当面答复：“我宁可象史量才那样被他（蒋）暗杀，也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同时，他亲笔拟了一份复电，交蒋介石在港代表俞鸿钧发出。电文中有：“此次新四军不幸事变，中枢负责人士，借整顿军纪之名，行排除异己之实。长城自坏，悲道济之先亡；三字埋冤，知岳侯之无罪。舆论沸腾，士民切齿，而当事者犹未闻有悔祸之心，何也？……谓当开诚布公于天下，以共见严惩祸首，厚抚遗黎，然后公开大政，团结友党，涤宦海之颓波，驱祸夷于穷岛，庶几还我河山，成功有日。弟虽无状，要当扞衣扶杖，乐睹太平耳。否则，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薇，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涕泣陈词，刀锯待命，总理在天之灵，实昭鉴之。”这份掷地有声的电文充分表明柳亚子的铮铮铁骨。特别是“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一语直刺蒋介石。据说电文到渝，叶恭绰因病未办公，由狄君武（亦南社旧友）代理，遂由程沧波拆呈蒋介石，蒋大怒，即令八中全会主席团及中央组织部提一提案，诬称柳亚子“污蔑中央……接其亲笔代电，任意诋毁，殊属有违党纪，为特提请予以开除党籍之处分以肃党纪。”柳亚子知道后认为“开除不打紧，就是断绝我的经济来源，我也自有其他办法”。他的革命立场更坚定了。

四、天亮前后

抗战刚胜利，1945年10月19日柳亚子就与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李济深、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等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12月30日他飞返上海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他在追悼“一二一”烈士于再的会上讲话，他与沈钧儒、马叙伦等联名发表《对目前学生运动的主张》。

1946年冬，国民党已撕破假面具，召开了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大规模内战也已经爆发，民主人士处境日益险恶。1947年春，李济深到了香港，与何香凝等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秋，他们联名写了一封密信（这是一块垫肩形的白色丝绸），给三民主

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由朱蕴山从香港带到上海、南京，面交这四人传阅，要他们即赴香港，共商国是。正在这时，与柳亚子住在一起的同乡毛啸岑（当时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金融工作）得悉国民党特务要对柳亚子、王绍鏊（民主促进会领导人，中共老党员，也是吴江人）等下毒手，更加促使柳下决心立即赴港，但无法得到机票。幸而他的长婿陈麟瑞因公要经港赴印度开会，陈用了假名多购了一张赴港机票，柳亚子才得逃出虎口，这是1947年10月18日。他在飞机中口占七绝四首，中有两句：“又是弃家亡命日，扶余岛畔蛰龙翔”。因为与他相依为命几十年的郑佩宜夫人这次也未能偕行，到了11月16日才乘轮船到港相聚。到港后，柳亚子与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等紧张地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名上书在上海的宋庆龄请求她来领导。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李济深任主席，柳亚子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这时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也云集港岛。

中共中央于4月30日发布五一节口号，正式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各民主党派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响应。6月4日，柳亚子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共中央上述号召。以后，中共中央即派钱新之前往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的潘汉年、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分批组织民主人士秘密北上进入解放区。这一行动也要冒不少风险。第一批是沈钧儒、谭平山等从海上经大连到达哈尔滨。以后又有符定一、周建人、胡愈之等先后到达河北平山。柳亚子是1949年2月28日，与陈叔通、叶圣陶、张志让、郑振铎、曹禺等27人，乘华中轮离开香港的。当时香港有国民党特务活动，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弋。乔冠华告诉柳亚子：片纸只字不能随身带。他把书籍衣物都留下，以后由夏衍的《华商报》社装箱，用香港交通银行柳的外甥徐文烈的名义，才托运到北平。华中轮在海上航行5天，于3月5日总算抵达解放区山东烟台，以后由沿途党政领导护送，乘坐汽车、火车，经济南、德州、天津，于3月18日总算安抵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了先期到平的沈钧儒、郭沫若等热烈欢迎，北平市长叶剑英也于次日前来迎迓。一个星期后，刚开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于3月25日到达北平，民主人士有代表30人前往参加西郊机场阅兵及欢迎仪式，柳亚子为其中之一。诗人禁不住热情讴歌：“……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仁看茶火军容盛，正是东征西怨时。”

柳亚子由于坚持革命立场，一生历经危难。他终于在人民的首都安然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九年岁月，于1958年6月21日逝世。

（责任编辑 王 恂）

傅钟历尽曲折讲团结

● 张文苑



1938年，傅钟在太行山
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出任四川省委书记

1935年11月12日拂晓，翻过夹金山南下的四方面军，占领了川西重镇芦山城。曾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但已被张国焘剥夺了军内职务的傅钟，受命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芦山城历史悠久，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所设。城虽小却显得十分热闹，它成了川西苏区和南下红军的中心。傅钟住在任家坝红军总部，每天到城里办公。

傅钟和朱德、刘伯承住在一起。每到晚上，他们都要交流工作情况。都是老熟人，相处融洽。傅钟开始深为自己在松岗会议上，说了对总司令不恭和认识错误的话，深感内疚。

朱老总劝傅钟，凡事认识清了就好，心里不要搁疙瘩。又说，你现在不担负军队职务了，省委书记这个位置担子更重，在这里集中了这么多干部，你要做好团结工作呵！傅钟和刘伯承是在莫斯科认识的，后来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又共同完成了许多艰难繁重的任务。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告诉傅钟：“你翻译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央苏区1931年出版了，对中央红军的政治建设，起了借鉴、指导作用。”对于傅钟在松岗会议上的错话，刘伯承坦率地把意见说给了傅钟：不能抠条条，莫要书生气么！傅钟到达芦山后，思想有了明显变化，团结并维护原一方面军的大批干部和四方面军的地方工作干部，把四川省委以及省苏维埃的工作，搞得生机勃勃。

四川省委、省苏维埃以及到新苏区各县、区工作的干部，广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组织起工会、农会和妇女、儿童等群众团体，按中央苏区的《土地法》平分土地，成立了村、乡、区、县苏维埃，并在群众斗争中建立党的组织。

在扩大红军时，参加这个模范团的青年，芦山县有520人，天全县400余人，雅安170人，宝兴90余人，太平90余人，共1275人。

1936年1月中旬，在芦山县大

板桥村举行“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肩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近千名一、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济济一堂，情同手足。

2月底3月初，南下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队伍听从党中央的召唤，迎着凛冽的北风北上。

在四川省委书记岗位上紧张工作的傅钟，翻过雪山，到达道孚、炉霍后，身染副伤寒，病倒了。

和任弼时彻夜长谈

6月22日，朱总司令由炉霍出发到普玉隆迎接萧克、王震率领的二军团，30日到绒坝岔迎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六军团后，傅钟率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也到了甘孜，代表四方面军，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二、六军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和甘泗淇，都是他当年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有的还是同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战友。此时相见，格外亲切。

傅钟比任弼时年长4岁，他们相识于1926年11月。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少共总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傅钟时任中山大学学生总支部副书记。这时，傅钟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法文翻译，他们在莫斯科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汪一
大会上(右一为傅一,右二为朱德)。
一九三九年,傅钟(左一)在晋东南群众「反」

进入草地第二天晚上,任弼时首先找傅钟谈话。他清楚傅钟的为人:诚实、忠厚、团结干部好。在朱德、刘伯承那里,他也知道了傅钟对张国焘的态度和受冷遇的处境。谈话开始,任弼时便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出的那种小册子,总司令告诉我的了,是张国焘要向我们宣传党中央的“错误”,我们把它销毁了。傅钟叹息自己在四方面军无能为力。

任弼时问傅钟:“去年,中央带一、三军团北上,你们为什么不跟上?”

傅钟说:“我在前线,是陈昌浩紧急通知我回到指挥部才知道的。他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我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宽慰我不用担心,说咱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

任弼时问傅钟:“北上有没有决议?”

傅钟回答:“有。”

任弼时严正地说:“有,为什么不执行?”

傅钟说:“四方面军干部长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我只听过朱老总、刘伯承讲过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的精神。张国焘却把中央会议的精神和他的曲解搅成了浑水,直到毛儿盖召开的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张国焘不仅不传达中央对他的批评,反而煽动大家审查党中央的路线。”

对于张国焘为什么死命反对北上?任弼时说,“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只有坚持北上,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开辟抗日前进阵地,和全国同胞生死战斗在一起,才有光明前途。张国焘却另有自己的打算,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让他把四方面军搞垮,你要团结广大干部,把队伍带去会合党中央。任弼时告诉傅钟:“明天开始,你到总司令部机要科看电报。告诉他们,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权批准。

傅钟看过一、四方面军分开前的电报,原来好多重要事情,他根本不知道,若不是任弼时捅破张国焘的封锁,他还蒙在鼓里。特别是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北上到俄界后又等了三天,七次致电张国焘放弃“南下”,跟进北上;直到9月18日,彭德怀、聂荣臻等还电告张国焘:占领甘南大草滩一线,当地物资丰富,回汉民众热烈拥护红军,欢迎你们立即北进。傅钟深感党中央对争取张国焘北上,做到了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当任弼时再次和他谈话时,斩钉截铁地说:“清楚了吧?不是中央丢下你们‘不辞而别’,是你们不跟中央走。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次谈话时,傅钟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松岗会议记录》交给任弼时看,并检讨自己在会上说了错话。任弼时说,自己有错,总结教

训。但责任全在张国焘。

任弼时看过《松岗会议记录》,又交给了傅钟,稳重地说:“必须考虑到,我们都是拿枪的,都带有队伍!意见有分歧是不好搞内部斗争的。我们在长征,离目的地还很远,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走上了重要的岗位

1936年7月21日,四方面军长征至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接到中央来电,批准设立中共中央西北局。

中央西北局由以下委员组成: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李卓然、曾传六、张琴秋、王维舟、董振堂、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共20人。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西北局设组织部,傅钟任部长。

当时,中央下达的一些党务工作文电,在张国焘、朱德、任弼时三人的名字后面,还要签上傅钟的名字,四人同署。傅钟是个谦逊的人,提出不要签他的名字,任弼时说:“不,必须同署,为的是便于你在四方面军开展工作。”从此,凡属党务、党纪、高级干部的学习、工作的调动安排,都由傅钟负责管理,下达此类文电,都有“傅”的签字。

自此，傅钟站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岗位上。

7月末8月初，左纵队、中纵队、右纵队，经过1500里的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先后到达包座一线集结、休整。

第一次西北局会议，在救济寺开的。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宣布过中央西北局的组成，便指名组织部长傅钟发言。傅钟说：“组织工作怎么做呢？还是列宁说得好：‘没有组织就不可能有统一。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组织。’我们就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吧。”总司令开门见山，说：“对头，西北局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进行工作。我们党讲民主，做中央委员的，要是好党员，当书记的要是好党员，好委员。不能是委员服从书记，是书记一样要服从多数委员形成的决议，这才有集中的统一的领导。”大家包括张国焘，都赞成他的发言。傅钟当然清楚，朱德的讲话是针对张国焘说的。徐向前发言说：“过去，我们对干部的批评，多以个人的办法，没有建立起组织的关系，所以有的人养成了骄傲。以后，应改变个人的领导方式，多用组织力量推动工作。”任弼时也就解决四方面军干部思想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作了发言。他明确指出，当前的中心还是搞好内部团结继续北进，早日和党中央、一方面军会合，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陈昌浩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当会议讨论北进计划时，他主动提出率领先锋部队，夺取岷州一线地区。

张国焘对于北进计划，实际上并不做部署。甚至提出要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

朱德感到张国焘的突变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详细分析当时的情况，断定红军往西走是违背抗日大潮流，不是出路，是绝路。

傅钟和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委员一样，赞成朱总司令的意见，张国焘陷于孤立。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立即北上进行岷洮西固战役的决议。要求全军先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

8月5日，徐向前、陈昌浩即率领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从救济寺出发，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取岷县，向武威佯动。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由王树声、詹才芳率领，8月7日攻取临潭旧城，向临洮方向活动。二方面军组成第三纵队，因尚在行军路上，待到达包座后，12日出动，到哈达铺，策应一、二纵队，向天水方向进击。

8月9日，傅钟率中央西北局随红军总司令部离开救济寺，向俄界进发。这时，先锋部队已夺下天险腊子口，正向甘南大地挺进。

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我军已占领甘南的大部分地区。中共西北局和红军总部进驻哈达铺。

8月25日，陈伯钧、王震率领的二方面军先头部队——六军团的十七师和模范师到达哈达铺。

9月6日，继三十二军之后，二军团全部到达哈达铺、礼县一线。至此，西起洮河两岸，东至礼县，北至通渭，红四方面军又拥有8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甘肃省工委书记

在西北局会议上，傅钟被增补为甘肃省工委委员、常委，分工为书记。

在讨论扩大新区和工作向前发展时，傅钟综合近期党中央指示精神，在会上阐述中心目标为面向东部署，使红军汇合全国工农商学兵的抗日高潮。张国焘听着不顺耳，截断傅钟的话说，省工委要加强对县工委的领导，要向西向北发展新区，把甘南苏区搞大。向东发展什么？于是经过讨论，决定：

由一方面军的原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书记，组成西路军工

作委员会，开展回、番民族工作。由长期实际负责川陕省委工作的吴永康为书记，组成北路工作委员会，建立漳县、渭源、陇西、临洮、武山、通渭等地的工作。

张国焘突然精神振作起来，说：我军的力量在甘南已达到十几个县，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甘南根据地一定能巩固、扩大。他勉励大家要加快步伐工作，并一个个指名道姓，要求按时写好会议决定的文件：

“税收条例，你，德峰同志写，明天中午12点交卷。

“秋收斗争，你，郭潜写，明天下午6点交卷。

“傅钟，你写西北局关于省委工作的决议，明天12点交卷；省委工作计划也由你来写，后天交卷；你，再给总政治部直属队讲话，介绍省委的工作方针，西北局加强省委的决定，由他们告诉各军，配合好。

“后天8点，油印文件都发下去。

“永康，北路工委12日出发……”

这次西北局会议后，傅钟夜以继日地工作，按时交卷后，还给总政直属队讲了话。接着是分配大批干部，包括刚刚伤愈的由二方面军来的团级干部，随西路、北路工委去加强各县的领导，开展广大地区的工作。

这时，甘南大地仍然有隆隆炮声传来，但许多村庄有了农会，有了抗日义勇队，在秋收斗争中带领农民抗租、减租，在近百万人民中传播了共产党、红军的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短短一个月里，有三千多当地青壮年，走进了主力红军行列。

9月13日，党中央来电说，中央已令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南下静宁接应四方面军。中央希望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西北局根据情况变化，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傅钟为了把会议开好，里里外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傅钟（右四）和军委
总政治部同志合影（左二为谭政）

外，忙个不停。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朱德、陈昌浩、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等大多数委员到会。徐向前、周纯全在前线指挥部，没有到会。

张国焘已不像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工作时那样踌躇满志。他说了赞同三个方面军会师的话，但又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烟稀少，难以供应大部队生存之需。不愿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的意思十分明显。

9月17日，全天传达、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朱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日本要独吞中国，在中国捞利益的英、美会促蒋下决心打日本。就是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像张学良、杨虎城那样主张抗日的将领也大有人在。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和他们联合起来，把蒋介石逼到非抗日不可的地步！我们有的同志只看眼前，要不得，要转来。

陈昌浩拿着新印出来的《前进》第6期，上边有他的论文《争取当前伟大胜利》。他着重说红军实力愈集中，战胜胡宗南的条件愈充足，争取友军、扩大统一战线愈有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愈有把握。当他提到，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发展，应该开

展党内理论教育，加紧思想斗争，实践党的原则的自我批评……张国焘不高兴了，打断陈昌浩的话说，陕北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能拥护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和我们已经一致了，过去的争论，不必重提到紧张的地步。当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战略方针问题，全党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

不只傅钟，朱总司令、陈昌浩都感到了张国焘的话意味着什么。傅钟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说，今天传达的《决议》说明党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思想又有发展，要加强学习，检查过去有哪些思想不合现在形势需要的，彻底改过来。《决议》里讲，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共和国的斗争中，绝对不应削弱红军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朱总司令接上话茬说，对头！要检查过去，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感情用事。解决军需问题，必须注意军民、军政、我友的团结，不能像法国大革命时那样，脱别人身上的裤子。

谁知，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会师的帷幕刚要拉开，朱、陈忙着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的故态发作：反对北上，主张西进，过黄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西北局作出的决

定。陈昌浩再也忍不住了！愤起反驳张国焘，力主北上会师，维护西北局决定。争论十分激烈。张国焘甚至说，北上“是断送红军”。朱总司令平心静气地说：“西去会损害三军大会师。”按当时法规，政委是党和苏维埃的代表，在军事行动上最后决定权。所以，朱总司令非常温和地劝他不要有最后决定权的总政委身份，推翻中央西北局的集体决定。傅钟也劝他，向北去会合，四方面军的力量倍增，对全局大有好处。

张国焘看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说，总政委我不干了！让陈昌浩干。他扔下战役纲领和作战命令，带上警卫人员离开总部，去了驻漳县的前线指挥部。

朱总司令非常镇定地说，张国焘不干，我们干。中央的大会师部署不可耽误。他一面听参谋们谈情况，和参谋们研究计划，下达命令；一面要傅钟组织总部指挥机关和西北局，向北开进。

9月21日，在总部北进途中，收到张国焘从漳县前线指挥部发给部队的电报，令进到通渭执行静、会战役的任务的部队，停止北上，转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

朱总司令大吃一惊。原来张国

煮没有甩手不干呀!

傅钟得知也愣住了。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张国焘这样干,将使全军再次陷入危难境地。

处变不惊的朱总司令和傅钟商量,用电报通知已返回各自岗位的西北局委员,火速到漳县,继续开会。傅钟知道,这种时刻,不能和张国焘闹翻,要团结住他。傅钟立即拟好三份电文,发给漳县前线指挥部。发给徐向前总指挥和周纯全政委转张国焘的电文如下:

向、纯转焘:

(甲)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同意,深为可虑。昌浩今早可到漳,带来陕北亲译长电,表示国际态度,望详加研究。

(乙)接到指示,已告各方停止一切行动。

(丙)弟等即日赶到漳县,并电告传六、何畏、长工也兼程赴漳,续商大计。

(丁)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

朱、傅飞复焘(向纯转)

1936年9月22日3时

挫败张国焘

朱德带领傅钟一行十多人,十几匹马,急速赶到漳县。接到电报的西北局委员们也陆续到达了。这时,傅钟才知道,张国焘到漳县之后大发了陈昌浩一通牢骚,激动得落泪痛哭,他气忿忿地说,四方面军就让你陈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坐班房!

前线指挥部的领导从四方面军的处境看,不北上而西渡黄河,可以避免胡宗南这股强敌,好处是明显的。于是,同意了张国焘的主张,下达了停止北上,掉头西进的命令。这样,部队立即出发西行,朱总司令来电“停止一切行动”的命令,便没有

执行。

在三岔开会时,张国焘情绪很好,牢骚也没有了,辞职的事也不提了,他在地图前指指划划,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西进方案的“优越”。张国焘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容易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再说,北上到静会作战,也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人员弹药都不充足。单说五军炸弹10个有5个打不响。胡宗南呢,近年没有多少战斗消耗,齐装满员,供应充足。两下一比,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岷州会上我说北上断送红军,不是吓唬人的。

张国焘的一番话,仅从军事上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看,不能说是杞人忧天,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也不无道理。部队三过草地,特别是在百丈鏖战,遭受重大损失,元气大伤,再与强敌作战确有困难。但有一点张国焘避而不谈,那就是静会战役是三个方面军协同行动,互相配合作战,决不是四方面军孤军作战。

朱总司令作了长篇发言。为了消除对立情绪,他尽量形成冷静辨别是非、认识真理的氛围。他说,四川军阀打仗,好溜边边,去拣便宜。我们是红军,只要革命需要,也能打败胡宗南;为了抗日救国,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统一指挥,红军力量大大增强,会增加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和我们一起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进行抗日。这个契机,万万不可错过。朱总司令语重千钧地说:“所以我坚持第一方案,从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优点多。”

陈昌浩比朱总司令一行早到漳县一步,受到了张国焘的指责,情绪不好,他在会上只是表露个人感情、思绪,甚至说不想当方面军政委了。对方案本身谈得不多。

傅钟深为陈昌浩的表现感到惋惜。但更焦急的是,委员们对总司令的分析反映冷淡。所以他说了好多表示同意总司令分析的话,并充满感情地强调说,我们曲曲弯弯走了17个月,牺牲了无数的战友,向北再走一步,就到达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往西走,离我们的目标又远了!说时,他激动得有些哽咽。

这次“三岔会议”,前线指挥部的同志大都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队已经行动,让张国焘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

朱总司令为顾全大局,尊重多数的意见,说,那就先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做好工作,尽量减少损失。同时,向中央报告,如果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部队本来准备去打静会战役,会合一方面军,情绪很高。现在掉头向西,议论很多:“日本鬼子在东面,往西走抗谁去?”人心浮动,疑虑大增,部队基层天天有逃亡的。历来能打能走的战功卓著的第276团报告说:拂晓出发时,发现18名鄂豫皖时期的老战士开小差了!

幸运的是,9月27日,党中央来电报指出:“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并说“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皆可占领……”与此同时,毛、周、彭也来电称:“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好在天公不作美。带领先头部队的徐向前从前边回到洮州总部,说,据老乡们介绍,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不能西渡黄河。

张国焘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该回头的时候了!

张国焘还想来个漳州三岔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座天主教堂召开的。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大雪封山,可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也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出来的老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傅钟和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会前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党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有别的打算。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和决心。

当了妇女部长的刘坚,也在大会上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战士们北上有劲,不愿西进。没有御寒的东西,粮食也难搞,再西进,敌人消灭不了我们,自己也会被冻死、饿死!

张国焘猛地站起来吼道:是谁教你这样发言的?!刘坚回答:这是战士的呼声,不信,可以去调查。

这时,傅钟把军帽一掬,满头茂密黑发,像头狮子一样,也猛地站起来吼道:“西进就是脱离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生死攸关!”

本想争取多数的张国焘,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宁、会宁地区。

9月28日,朱德、张国焘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29日,中革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接此电后,复电:“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欣慰。”

自9月30日起,四方面军分成5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四军为第1纵队,三十军为第2纵队,九军为第3纵队,三十一军为第四纵队,五军为第5纵队,浩浩荡荡,向北挺进。

10月2日,陈赓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奔袭会宁守敌成功,未费一枪一弹占领会宁城。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第10师,在会宁之清江驿、界石铺与一方

面军一军团第1师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会师后,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傅钟代表中央西北局,正式宣布被张国焘错误关押的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傅钟随红军总部到陕北保安后,毛泽东写信给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任命傅钟为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并特嘱:什么话都可以和傅主任说。

在中共“七大”会议上

1945年5月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大会发言的最后一天,军委总政副主任、七大代表傅钟,走上讲台作了长篇发言。

傅钟发言的中心是:《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山头主义》。一开头,他检讨了在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松岗(即卓木碉)会议上,对于党中央,尤其是对毛主席,那种极不尊重的鲁莽态度”。

回顾四方面军的历史,傅钟指出,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单纯强调打仗,特别是肃反的扩大化,使军政关系、军民关系严重恶化,以致个别地区群众“反水”,喊张国焘为“张帝国主义”。随着四方面军的发展壮

大,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愈演愈烈,涂污了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直至他在长征中犯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罪恶。

傅钟以无比崇敬的激情赞颂董振堂军团长和杨克明、陈海松、熊厚发、曾日三、姜启化等四方面军高级将领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浩然正气!当他提到,在西路军斗争中,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同样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四方面军的同志的鲜血与一、二方面军的干部的鲜血交流在一起”时,会场爆发的“大鼓掌”声,催人泪下,震人肺腑!

傅钟接着讲了加强团结要反对山头主义的倾向与情绪。他说,依靠党依靠人民,是稳如泰山,万事好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只说大山头、小山头,其结果把山头背在背上,山头是很重的,把自己压的又是驮子,又是瞎子,使得举步艰难,阻碍前进……

毛泽东带头鼓掌表示赞赏傅钟的发言。第二天,在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毛主席说:“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

傅钟的发言,接二连三地被毛主席引用,这在750多名七大代表中,是少有的,极难得的。

(责任编辑 仲文)

《半月谈》 时事政策顾问,学习生活益友

以“中华第一刊”著称的《半月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以时事政策为主的综合性半月刊。

《半月谈》是党刊,主要面向城乡广大基层读者。时事性是其特色,权威性是其优势。

《半月谈》准确传达中央的政策精神,突出报道改革开放的探索经验,热忱宣传经济建设的进展走势,深刻剖析社会关心的热点难点,深入透视引人注目的国事心事,切实传播先进适用的科技知识,及时评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一册在手,可晓天下大事。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2—510。国外代号:SM340。1998年定价:1.80元,全年43.20元。

一个伟大的女性，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酷斗争中，用她坚贞的信念雕刻了自己的革命形象——

李立三夫人李莎的传奇人生

● 李思慎

我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都要与李莎打交道。这位来自苏联的夫人，虽然在气质和风度上有些“洋气”，但她对工作人员始终是平等待人，和蔼可亲，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的。但是，毕竟由于有着“首长夫人”和“外国人”这层“隔膜”，所以对李莎个人的更多情况可说是毫无所知。

1996年，是李莎来华工作50周年，为了深入了解她不寻常的一生，征得李莎的同意，我前往北京，再次住进李莎家里，对她进行了十多天的专访。李莎沉重地向我讲述了她坎坷的人生。

—

李莎的原名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斯基县斯图坚科村。乳名叫丽扎。父亲是沙皇时期的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

丽扎的生母，在十一岁时就成为孤儿，她来到了父亲家当了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继室，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丽扎是家里

最小的女儿，她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

但美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田园荒芜了，父亲于191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新的苏维埃的内战结束了。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粮食颗粒无收。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莫斯科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下，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到一家缝纫工厂做工。

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步好转。小丽扎开始上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从无差错。

丽扎品学兼优，在她系上红领

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她的名字，她十岁就当上了小“主席”。小丽扎回到家把圣像摘了下来，妈妈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劳动部门介绍，她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就到印刷车间劳动。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8卢布，丽扎高兴极了，她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起来。

丽扎经过三年的学习毕业了，她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这年夏天，17岁的丽扎告别了母亲，与伙伴们一起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连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技术编辑。

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物资又短缺，工作任务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

没有怨言，在艰苦环境中丽扎工作更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丽扎家庭出身不好，给了她两年的候补期。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有50万中国工人，他们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后来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传（后来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吴玉章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二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返回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

一天，丽扎来到高尔基大街，看望刚从远东归来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他，黑发蓬松，眼睛明亮，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从此，这几位好朋友常常相约在一起，或聚会，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到公园划船，他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1947年，李莎在哈尔滨

1934年秋的一天，丽扎来到李明的住所，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由于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里断定他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的人，总是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的，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他去了，再没有联系。

若干年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区的联络。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上海的地下电台停止了工作；红军在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时，随军电台在被敌人轰炸中毁坏，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络。李明到达阿拉木图后，先派出两批人员经

新疆、甘肃，设法同红25、26军建立联系。李明曾提出亲自回到新疆的建议，但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最后，还是刘长胜带上由李立三亲自编制的密电码回国，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朋友聊天，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一下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回事，当即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过批判。”因此，在她的想象中，李立三一定是一个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一脸皱纹的老头子。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李立三是谁，他在哪里？”这位朋友告诉她：李明就是李立三。丽扎听了朋友的解答，惊异地张大了嘴，以为他在与自己开玩笑。她果断地反驳道：“你搞错了吧，李立三不是一个老头子吗？而李



李立三（中）在莫斯科出狱后和李莎（右）及其外甥女在一起

明才20多岁……”朋友肯定地说：“李明就是李立三。”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既惊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里呢？丽扎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正当丽扎对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时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参加大学的考试，突然有电话找她，从电话里她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盼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她放下了课本，直奔相约的故地。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李立三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他谈到了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加倍地工作将功补过。他还向她明确表示：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那耿直、爽朗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与36岁的李立三的爱情得到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批准。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立三连在一起了。

在新婚佳期，丽扎看到李立三从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

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兼职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立三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来；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然而，月有圆缺，肃反扩大化的冲击波，一下子撞碎了这个新婚的小家。李立三一下子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而丽扎也自然地变成了“人民敌人的老婆”。

这是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的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也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于是不少中国同志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或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

康生借口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下班途中丢失了一个公文包，虽两天后从车站找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失密事件。但王明、康生趁机大作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多次召开会议，批评李立三“玩忽职守”，通过共产国际干部局，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

送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苏联内务部当即对李立三采取了秘密监视。

王明、康生在11月回国了，苏联内务部于第二年的2月24日凌晨逮捕了李立三。罪名是说李立三是中国人在莫斯科的反苏维埃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李立三被带走后，丽扎急促地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留下的话，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谭秋作了汇报。

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员就把丽扎从大楼赶到院内一间阴森、潮湿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

丽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团呈述了李立三的冤屈，向外国语学院团支部作了汇报。这位支部书记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随之而来的是，党团干部反复与丽扎谈话，要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丽扎被开除了团籍。她像只迷途的羊羔，孤独地在漫山遍野呼唤。当时，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她发疯似地到处打探李立三的下落。她去过布特列尔斯基监狱、列沃尔托夫监狱、卢比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接到窗口一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她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才在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立三。她要求与他见面，由于他是“政治犯”，家属是不允许会见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可以转交李立三50卢布。

李立三被捕后，丽扎仅依靠学院每月发给她的250卢布助学金，

维持家庭的生计。尽管经济很困难，她还是每月从中挤出50卢布，准时送到监狱，后来，李立三释放出来，告诉丽扎，当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卢布，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因为，在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送给他的钱，买来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着从监狱里出来。

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是（摘要）：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在莫斯科的中国特务恐怖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

李立三在申诉材料中写到：1926年在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是，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的安排，坚持要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1928年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临开会前，斯大林曾经找李立三单独谈过一次话，由王明充当翻译。在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时，俩人的看法不一致，而引起争论。为此，斯大林把记录员都赶走了。谈话结束告别时，斯大林对李立三说：“我见过很多人，而像你这样聪明又有见解地、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对于1934年至1935年期间的工作，李立三写到：这期间我都在中苏边境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派遣，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转运中国到苏联来往的人员，架设因中共红军长征而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联络……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

知：李立三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立三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立三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立三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倍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高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立三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立三已经有了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信，告诉李立三：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

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

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已疲惫不堪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苦闷时，突然急促的门铃响起，她立即拉开房门，站在门前的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李立三。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的泪水突眶而出，俩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坎对丽扎说：“瞧，给你带来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

好一个礼物呀！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第二天丽扎就跑到外国语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立三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共产国际代表时，才



1954年，李立三、李莎（中）和江渭清夫妇在南京

逐个审查了幸存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

1939年9月，周恩来因治疗臂伤到达莫斯科，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当他了解到李立三被捕情况，便与苏联当局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押了一位名叫李立三的同志？”

“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苏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对方回答说。

“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有错误，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周恩来激愤地说。

1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正式向李立三宣布审查结论：“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审查员）等人的杜撰诬陷。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李立三释放了，但事情远未了结。

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时，共产国际作出过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尚未撤消。特别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坚持诬陷李立三，歪曲中共党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为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为彻底澄清这些诬陷，李立三在丽扎的帮助下，写出了长达240多页的打字材料，有力地批驳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诬陷，材料送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

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李立三的申诉。他们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有关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

李立三释放后，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只得蜷居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住在莫斯科，必须迁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问题。在这位善良的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在“红色恐怖”的氛围中，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忍受着，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默默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军逼近莫斯科时，他自愿参加了修工事，挖战壕，作为防空队的一员，经常通宵站在屋顶上值班，还要参加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引起的火灾。

苏联红军取得了保卫莫斯科战役的重大胜利，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巨大的乐趣。

战争期间，人们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到秋天收获不少土豆，才基本上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

李莎回忆说：“1936年我同立三结婚。1946年我们回到中国。在这十年当中，有八年的岁月都是在艰难、困苦、忧患中度过的。”

三

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1945年6—7月间，郭沫若以学者身份到苏联访问，李立三多次去拜会他，表达思乡之情，并托他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夜饭，正当她们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晚上九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购买年货，晚上九时才回家，他得知后，马上就去了联络部。

十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丽扎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他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后，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

这个意外喜讯，为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

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丽扎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遗憾的是：不能同行。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

1月底又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15年之久的祖国。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丽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丽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得到了苏共中央的批准。

9月24日，丽扎告别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孙维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火车。

列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昼夜向东方的中国奔驰。在苏、中边境的一个小站，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走进车箱，向丽扎敬了一个军礼，亲切地报告：“首长工作很忙，派我来接您！”

在李立三的警卫员照料下，丽扎一行换乘一列载送外交文件的专车，于10月6日安全抵达她的第二祖国——中国哈尔滨，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号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们的第二个女儿雅兰就降生在这里。

四

为着方便工作和生活起见，李立三就以她的乳名——丽扎的谐音，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莎。

刚从苏联来中国不久的李莎，就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担任俄语教员，开始了她在中国的教学生涯。

1949年3月，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京不久，4月9日，李莎就从哈尔滨来到北京，与党中央机关一起住在香山。一天晚上，李立三带着全家去拜访了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这次会见时，李莎仍然记忆犹新。

李莎到北京后，就在草创时期的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后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合并）从事教学工作。她不仅要直接对学生讲课，对学院的教师进行辅导，还担任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的顾问。

1959年夏天，康生借庐山会议之机，散布“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的谣言，又有人给中央写了诬告信，说李莎是苏修特务。随之，中央和华北局对李立三采取了在政治上不信任的态度，工作权力基本被剥夺。

康生一下庐山就找李立三谈话，说李立三1938年苏联坐牢时“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9月10日，李立三给康生写了一封长信，就上述两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陈述和批驳。

此后不久，李立三在1960年1月又给陈毅同志写了一封长信，就上述问题向这位老朋友请教求助。

1962年，陈昌浩给中央写信诬告李立三，说李莎和女儿都与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等等。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以后，10月，中央一负责人和康生代表党中央与李立三谈话，正式提出要李立三与李莎离婚。这个决定使李立三如雷轰顶。他坚信李莎不是修正主义分子。

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篇有4000字的长信，据理进行抗争。

恩来同志：

找我谈话以后，关于李莎的问题，经过再三考虑，还想向你申诉以下意见：

……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十六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

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她在十六年中，经常担任工作。从去年起，她同时在外语学院、外文出版社、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因为这些机关的苏联专家走了，都要她去工作，基本上做到尽职尽责。

……我和李莎经过了不少困难的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她没有脱离我，所以现在要我和她离婚，感情上的确是很难过的。如果政治上真有此必要的时候……我决不会丝毫犹豫，而坚决和她脱离关系。现在，她反对修正主义的态度，既然是明确坚定的，我想就没有和她脱离关系的必要。

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没有错误，或者对某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便请给以指示，找我再谈一次。

敬礼！

李立三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四日

李立三积极做李莎的思想工作，促使她同意加入中国国籍，并争得陈毅的帮助，与公安部的领导同志商妥；不按苏联的法律规定，在未办理脱离苏联国籍手续的情况下，单方面直接加入中国国籍。

五

1966年春夏之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在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清算了“彭、罗、陆、杨”的“反党罪行”。6月4日，李立三接到了如下书面通知：

立三同志

根据雪峰同志口头传达，中央决定停止你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华北局

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身为八届中央委员的李立三，也被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此后，李立三被当作“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华北局机关不断地接受群众的批判。

1967年5月25日，关锋、戚本禹代表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红色造反派”，宣布李立三和他的老婆李莎是“苏修特务”。

这些人把李莎先是押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楼住下。第二天，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志叫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请吧！”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来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没有透明的玻璃窗户，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类似日军碉堡上的了望孔。这就是当时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单人囚室有6平方米面积。除去木板床铺，剩下的空间还够一个人来回走几步。钢筋混凝土墙壁，足有一米厚。门是两重的，人一进入室内，那个铁栅门就会自动锁上。

李莎被单独关押，进入监狱后，立即给换上一身黑色囚服，看管人员向她宣布：“从现在起，你没有姓名了，你是77号。”同时要求她每天要正襟危坐于离地面只有八寸高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

就在这一天，李莎的两个女儿——李英娜、李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但是，母女、姐妹之间近在咫尺，彼此不知下落。

在狱中，专案组逼着李莎交待一些中央领导的“问题”，逼她承认她是早被招聘的“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这些都被李莎一一顶了回去。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让她站着交待问题。从晚上十时直至下半夜三、四点钟，对她轮番审讯，然

而，李莎始终不说半句假话。

在伙食方面，吃的是窝窝头，老菜帮子熬汤，既吃不饱也饿不死。1972年初，毛泽东得知监狱的恶劣情况后，下了一道指示，一让犯人吃饱；二让犯人睡足；三让犯人在没有疾病时才可以审讯。从此，虐待停止了，伙食也有所改善。

八年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在长达2880多个日日夜夜，没有笑脸，没有人同她讲话。她张开嘴，发现喉咙已经不会发音，她抬起脚，发现两腿已难迈步。只有在那种逆境下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才知道恐怖中的孤独是多么可怕！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第十个年头——1975年，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以后，5月22日，一位公安人员通知李莎要带她离开秦城监狱。李莎问：“要我去哪里？”回答：“到山西运城去。”“是去运城坐监狱？”“不去坐牢，是去那里‘养老’”。

从秦城监狱乘上了同八年前进秦城监狱时一样的小轿车，在一名女公安人员“陪同”下，上了开往山西运城的火车。在途中，李莎问“陪同”：“李立三现在在哪里？”“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满以为李立三已在运城迎接她，暗怀喜悦心情期待着与丈夫的团聚。

李莎回忆说：“我刚到运城，只见整洁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双人床，有崭新的被褥，还有一对枕头。不禁想起立三，想到他，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唉！冷酷无情的事实是，李立三早已离开了人世。就在她被送进秦城监狱的头一天（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就已离开人世。这对李莎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怎么也不相信：度过了那么多折磨的李立三会自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得知：两个女儿都受到株连，与她同一天被送进了同一监狱，坐了两年牢。母女三人，近在咫尺，却互不知其下落。小女儿在监狱中

留下了久治不愈的病根。她还得知李立三的二儿子李人俊在湖南衡阳还被判了死刑，险些送命。

李莎的住处，原来没有围墙，上级拨专款修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小院可以种花、放养鸡群，还可以到农贸市场上去买鲜嫩的蔬菜、食品，到商店采购生活日用杂物……

李莎的住处外面，有派出所的人员长年住在那里，对她这个政治犯来说，警卫和监视双重任务兼而有之。

她的邻居是农科所的人，对李莎友好。冬天，住室冷，他们帮她买煤生炉子，李莎在这里学会了封火炉的技术；李莎要养鸡，有人帮她搭起鸡窝，帮她买来饲料。鸡蛋自给有余；李莎要种蔬菜，有人向她传授种植技术。

李莎的女儿花300元给她买来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李莎请来农科所的职工及家属子女到她房间里来看电视。每天晚上，她的房间都挤得满满的。

六

李莎于1978年12月19日从山西省运城市返回北京。事后，李莎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要不是你当时给英娜出了那个主意，要不是耀邦同志敢于负责的求实精神，果断地作出批示，恐怕要拖到1980年以后才能回到北京。

1969年8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经过整党，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娜、李雅兰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到华北局机关设在汉沽农场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当时我也在那里劳动，经常能见到她俩。但是，由于我们双方都处于被审查的地位，为避免被说成与“苏修特务”划不清界限，我是不能与她俩姐妹交谈的。12月底，

我因要到甘肃去工作,一天中午,我背着行李往火车站去的路上,碰见她俩姐妹收工回营,我才鼓起勇气对她们说了一句:“我到甘肃去了,你们要多保重。”就算是告别了。

1978年11月底,我因工作任务回到北京,当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十分活跃,真理标准的讨论、“两个凡是”的争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我敏感到机遇来了。我打听到李英娜还在北京外语学院,于是第二天就到了李英娜的家里,一见面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到她妈妈李莎的身上。

我略加思考后说:“这样吧,你再给耀邦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对你爸爸的问题、对你妈妈的其他事情都不要提。信写好后,千万不要邮寄。那样,耀邦本人是看不到的。可以在晚上六点以后,送到家里去,利用他回家吃饭的时间,交到他手里。”

“我不知道耀邦的家住在哪里?”

我说:“由灯市西口往西进去,第一个胡同往北,富强胡同甲6号。”

12月4日晚李英娜拿着写好的信,到了胡耀邦的家里。遗憾的是,当晚胡耀邦没有回家,是由胡耀邦的儿媳、安子文的女儿安黎接待的。安黎向李英娜表示:等爸爸(胡耀邦)回来,一定交到他手里。不出所料,胡耀邦于12月5日在英娜写给他的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党委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了,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

12月19日李莎返抵北京,恢复了自由民的生活。20日我在李英娜家里与李莎见了面,感慨万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

党中央在为一批健在的老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同时,抓紧对原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所列的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案件进行复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于1979年12月27日和1980年1月7日分别为李莎与女儿李英娜写出了复查结论。

对李莎的复查结论说:原中专三办认定李莎把李立三告诉给她的党的机密提供给苏联使馆,查无实据,不能成立。因此,对“苏修特务”的问题应予否定……一九七五年八月中专三办定李莎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的审查结论是错误的,予以撤销,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补发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

对李英娜的复查结论说:李英男(李英娜)同志受株连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12月27日,中央为李立三作出复查结论称:“1975年8月4日,原中专三办结论,定李立三同志为苏修特务分子,清除出党,纯属冤案,予以撤销”。

姗姗来迟的追悼会,是在李立三谢世13年以后举行的,也是李立三一生中党和人民为他公开举行的第四次追悼会。共同的特点是既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原因是,他的骨灰在13年前就被“造反派”给“随便”埋掉了。党旗覆盖的“骨灰”盒中,只放了李立三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但李莎还是动情地说:中央选定3月20日为李立三开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送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在李莎恢复工作以后,1979年被评定为教授职称,分到了一套四室一厅公寓;1980年被批准享受专家待遇;1983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被监禁十一年半的李莎,从山西运城回到北京时已是近65岁的老人。她原有的住房被别人占去了,

只得寄居在女儿那两间旧房里。她不计前嫌,犹如枯木逢春,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顾不上安排家庭琐事,就又精神振奋地投入了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排满了她的日程表:给研究生上课、为进修班辅导、编写俄语教材、俄语辞典,主编《当代苏联文学原著选读》,为《俄汉同义词词典》定稿,受国家教育部门的委托,为全国部分高校俄语教师举办讲学班,参加《周恩来选集》俄文版审定工作,撰写一篇篇学术论文等等。她是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全国政协第六、第七、第八届委员,她特别感叹时间不够支配。她说:“我还不老,我还有精力,我能够为国家做贡献。”

1997年5月15日,是李莎在华从事教学工作50周年。这天,国家教委、外国专家局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以表彰她在50年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更正

本刊1997年第8期刊载的《迫害刘志丹的执行人不是张敬佛》一文,意在纠正《西行漫记》中的一段史实上的讹误,但在叙述陕北“肃反”问题时涉及到郭洪涛同志的一段话与事实有出入。中央有关文件曾就此作过结论: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的主持人,没有诬害刘志丹等同志的意图,也不同意把刘志丹等同志当反革命处理,还指出:“我们相信逮捕张秀山同志后,郭洪涛同志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谨此更正。

我和金门泅渡归来的周振德一段机缘

● 郭 锋

近几年来,我竟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看到了有关沧州化工实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周振德的宣传报道——一则是他与台商合作,引进先进技术,生产出了一种新产品石英地板砖;另一则是化工部顾秀莲部长亲临他所在的沧州市化工厂视察,并宣布把这个厂定为化工部的重点企业。看到我这位北大的校友周振德取得如此成就,我不禁想起1976年转业天津之前,在沧州军分区搞对台宣传时与周振德接触相处的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殊途却同归 沧州来相会

我和周振德,投向共产党参加革命,一先一后,中间相隔二十多年,但某些经历却有近似之处。我是在日寇统治下过了八年的亡国奴生活,抱着对国民党的极大幻想,迎来了祖国的光复。但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腐败使我大失所望,加上中央社的欺骗宣传(明显的一例是造谣说朱德聘请汉奸文元模当顾问),促使我去解放区张家口看看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当时共产党人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报考了华北联合大学,从此参加了革命。但华北联大与我原来上的北京大学相比,太不正规,我产生某些不满情绪,因此受到同学们的怀疑,直到下乡参加土地改革,才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思想靠近革命。学校保送我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中由团调旅,由旅调军,由军调兵团,最后调到北京军区,在军区报社一干就是20年。但这期间,为一历史问题又曾受过严格审查,以致在我1970年离开军区下放沧州军分区时,组织问题仍未解决(我是1973年在沧州军分区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的)。我在分区五六年一直没有任职,只是在宣传科帮助工作,着重抓对台

宣传工作。

周振德是原国民党军92师275团中尉排长,小时随母及姐去台湾寻父,在台湾读完高中上了军校,到部队后表现不错,由少尉晋升为中尉。一次部队进行对抗演习考核,两个师各出一个加强营,营设侦察排,他被临时调去当侦察排长。演习结束后驻大金门岛休整待命,他和连长们一起看地形,知道了哪是真雷区哪是假雷区,就利用一个月黑之夜——1969年8月3日泅渡回归祖国大陆。谈起他来的动机,他说主要出于好奇,想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因为国民党给共产党造了不少谣。如一幅漫画,把人民公社描绘成集中营,村四周围了铁丝网,解放军战士端着枪来回押送下地干活的农民。这种离奇的编造反而使周振德产生怀疑,暗想毛泽东如果这样统治大陆,中国人民又怎能造出原子弹?他过来后就要求上大学深造,但那时正值“文革”,大学已停课闹革命,有一批大学生正在江西省军区农场劳动,他也被送到那里。这个农场有解放军的一个连参加管理,排长是个年轻人,不懂党的政策,管理上简单化。星期日周振德去南昌市游逛,他就派一名战士紧跟不舍,这使周振德很恼火。劳动结束后,大学生分配工作,周振德也来北京等待分配。北上途中,福建前线台编辑为他拍照,他就有些不情愿,他在北京东单旅馆,三四天蒙头大睡不起床,坚持要见总政首长。北京军区联络部派年轻干事找他谈话,他不予理睬。后来派了一年长的孙干事,一见面就亲切地叫他“周振德同志”,他腾地坐起来说:“什么?什么?你叫我‘同志’?你不认为我是特务?”孙忙说:“怎么会呢?你冒着生命危险投奔祖国,这本来就是爱国行动嘛!”孙干事常陪他聊天、看电影,一次到政协礼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振德发现一同出席晚会的还有我国的重



归渡回来的周振德(中)被安排在沧州市造纸厂当技术员

要外宾,由此使他感到了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于是顺利地服从分配,于1970年9月底愉快地来到沧州市造纸厂当了一名技术员,工资按人民币与台币的比价,仍然相当于他当国民党排长的收入,这在当时的沧州是相当丰厚了。这是精心的安排,沧州是他原籍献县就近的中等城市,沧州市造纸厂是北京军区的一个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周振德来沧后的第一篇对台宣传稿不是我搞的,我是从第二篇开始。由于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有些老的起义人员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国民党就抓住这些事添油加醋大事宣扬。周振德的归来恰在这一特殊时期,而在他身上落实党的政策又很好,因此我在沧州那几年,几乎每年都从不同的侧面宣传了他,直到1976年我转业的前夕,还帮助他和他妻子一道搞了个录音讲话,向他在台湾的母亲报告了他上大学,建立美满家庭以及喜得贵子的好消息。

事业有发展 婚姻遇波折

我在接手周振德的宣传报道之

后,从他口中了解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表现以及他回归祖国的动机,我把这些与对台宣传部门的同志共同作过分析研究,认为他讲的情况是可信的,将心比心,我对他受到某些人怀疑、他很反感这件事十分理解,对他的这些遭遇深表同情。在他分配到沧州市造纸厂以后,群众中也有各种各样议论,但从厂领导来说,还是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在使用上是放手、信任的。开始让他在制浆车间搞维修,指导员手把手地教他。不到半年就调他到设计组工作。那时厂里生产造纸用碱要排放出一种有毒废气——氯。为了变废为宝、消除污染,他们想上一套聚氯乙烯装置,就让周振德参加设计、试制。他对化工本来一窍不通,就自己花钱买书自学,厂里也派他到外单位考察学习,兄弟厂无私地提供图纸、资料,全市组织了大会战,使聚氯乙烯这种塑料制品的原料很快投产,他通过实践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和设计知识。这时我组织他写了一篇对台广播稿《我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两年的感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和福建前线台在1972年5月先后采用。

在建设聚氯乙烯工程中,周振德一直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汗一身泥,没有一点架子。他的这些表现引起了一位新入厂的高中毕业生、女化验员小苏的关注。周振德在生产中有时要取些样品拿到化验室化验,小苏见他有时为采样眼睛熏得又红又肿,很受感动。小苏对化验中有的问题弄不大懂,就向他请教,他都耐心解答,还找来一些书借给她看。就这样,他们在工作交往中增进了了解,慢慢产生一些感情。

小苏和周振德的接近引起一些职工的议论。有的尖酸地说他俩都是“没挑儿”:女的长得漂亮,念书时就是校花,“没挑儿”;而男方长得实在一般,但又是这么个出身与来历,也是“没挑儿”。两个“没挑儿”怎么会凑到一起了呢?有人猜测是小苏看他挣钱多,又是光杆一人,进门就可以当家。这些话灌进小苏的耳朵里,使她十分气恼,但也促使她认真思考这一向题,并使这个倔强的姑娘很快下了决心。造纸厂内就有小苏的两个亲属,他们很快把信息传给了她住在农村的父亲。父亲出面干预了,他把女儿叫回家,指令她与周振德立马断绝往来。她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残废军人,打天津时他的两条腿都被炸断了。在他养伤住院期间,曾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因家庭成分究竟是否富农问题解决不了,给搁置了。他说他家有盐碱地三四十亩,只因他人入伍后家中无劳力就由亲友代耕的,根本不够富农。因此他复员后多次找政府要求改正成分,从村找到县甚至找过民政部,结果“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揪斗了他,说他是“上窜下跳闹翻案”。现今老问题没解决,又来了新问题,他跟女儿说:“你看,现在你找了这么一个主儿,将来再赶上个运动,我真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呀!”小苏从家里回厂后,找领导谈了此事,问领导该怎么办。恰好这时我去该厂了

解情况，厂领导接受我的建议，待我们把上上下下和男方女方的情况彻底了解清楚后再作定夺。

帮他排难解忧 结成美满姻缘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是北京军区主管民兵工作的宋副司令员曾来造纸厂蹲点。当他了解到周振德此时已经26岁时，就跟军分区政治部宋主任说：“组织上要关心周振德的生活，帮助他找个对象，成家立业。这需要做工作，不然他自己是不好找的。”从此厂里就为他张罗此事，但困难不小。不是女方不同意，就是周振德看不上。他总是说：“不慌，不慌。”如今他和小苏自由恋爱，真是厂里领导巴不得的事。

我从造纸厂回到分区，跟科里同志商量后，大家都认为该管，关键是要看小苏的真实思想和态度。于是我们就用电话邀请周振德和小苏到分区来一趟。晚饭后，我们等了好一会，原以为他们不会来了，忽听一阵车铃响，周振德骑了辆自行车，后座上侧坐着一位女同志，一见这情景，我们就明白了八九分。当时科长把周振德叫到一边，我直接找小苏

谈。小苏看来眉清目秀，落落大方。她一五一十地讲了她认识周振德的经过，把对小周的印象归纳为三点：一、小周工作热情，不怕苦不怕累，劳动中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们普遍反应很好；二、他学习刻苦、肯于钻研，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抽烟，几乎都用来买书了，过去他对化工生产没接触过，如今讲起来头头是道；三、他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抛弃了自己的亲人，冒着生命危险返回祖国大陆，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小苏还悄悄告诉我，自从听说她父亲不同意他们发展关系，周振德很沮丧。她担心，万一跟他断绝往来，他会受不了。但是她父亲向她提出的几个问题，她也确实回答不上来，希望领导能给她个明确答复：一、周振德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二、怎么给他定成分？三、如果和他结婚，亲戚们会不会受影响？我答应把她的问题如实向上级反映，请上级尽快给以答复。

1972年9月12日，我接到省军区的电话通知，说北京军区联络部对小苏提出的问题分别答复如下：一、周振德出于爱国心，弃暗投明，爱国有功；二、他过去是旧军人，现在是工人，成分就是工人；三、和

周结婚对女方家庭有无影响，这要看周的表现，他表现好就没有影响，表现不好就有影响。电话最后强调，让分区做一下工作，很好地落实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我把这个精神跟造纸厂领导说了，也跟小苏谈了。小苏听了前两个问题的答复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但谈到第三个问题时，她有些迟疑，犯了考虑。后来我去北京，又亲自找北京军区联络部夏部长谈，他听了也觉得第三个问题这样答复不太妥当，应更正如下：主要看是什么问题，如是犯罪、反革命、投敌叛变，那就要看跟家属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牵连，那就有影响；没有关系没有牵连，那就没有影响。夏部长还讲，小苏父亲的某些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作要做深做细，要在比较成熟的情况下使家人对他们的婚姻不要有很大的抵触。谈到安家问题，夏部长说，如有困难，厂里能解决的厂里帮助解决；厂里解决不了的，可在军分区特别费中开支；实在不行，可报北京军区，由联络部的业务费中开支。千万不要让周振德为了结婚卖东西或借债。

造纸厂的党委书记也是一位转业军人，专程到小苏家，以老战友的身份与她父亲拉家常，谈小苏他们的婚姻。小苏父亲最后说：“我已看清楚了，这桩亲事算是说定了；她本人同意，各级领导也支持，又有婚姻法作保障，所以我不反对——反对也没用。只求领导上给出个证明，讲清这桩亲事与我无关，把证明装入我的档案，等将来再有什么运动，别整我就行。”

1972年底举行婚礼那天，厂子里、市轻工业局、军分区都有人到会祝贺，唯独小苏的娘家人说来没有来。所以婚礼进行中，小苏始终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在她这种神态影响下，周振德也是满脸严肃。同我一块来的分区管摄影的老康端着个照相机总也等不来一个理想的镜头。



1973年元旦前夕，周振德与苏桐贞结秦晋之好



1973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的周振德

第二天上午，我和老康再去看新郎新娘时，情况就大不同了，刚到门口，就听到屋里一片欢笑，满屋子都是新婚夫妇在本厂的同事。新郎新娘也跟大家一起又说又笑，我看看这屋子，粉刷一新，立柜、书架、写字台……一应新家具，都是轻工业局给买的。老康在这里抓拍了几个镜头，还给新婚夫妇拍了一张合影；周振德手捧着一本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小苏在他旁边，边织毛活边跟他一起看杂志。随后我给中国新闻社写了一篇《访起义排长周振德的新家庭》的通讯，中新社以本社记者名义发了稿。香港1973年2月7日的《新晚报》，2月20日的《大公报》，都采用了。我与周振德相识，开始于我对周振德宣传报道，由于我对他曾有某种相似的经历和情感，因而对他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同情。我关心他，直至他的婚事。

我始终认为团结教育好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来投奔革命的青年人，是我应尽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对台的宣传报道中特别注意真实性，不胡编乱造，不夸大其词，不强加于周振德。一般稿件，我都是先让他自己来写，然后再和他深入交谈，并采访他周围一些同志，然后帮助他补充修改。成稿以后还要拿给他

看，认真征求他的意见。我总是让他自己先读，发现什么地方他念着拗口，或者读到什么地方他停顿一下，我就鼓励他把自己的考虑提出来，作进一步修改。我认为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原则。特别是对周振德来说，他是因为怀疑国民党中央社的造谣欺骗，才冒险返回大陆的。所以我更要有意识在他面前树立起与国民党欺骗宣传截然不同的正面形象。正因为我坚持了这一点，我和周振德才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谊。

喜庆上大学 翁婿亦和谐

正当周振德工作蒸蒸日上，建立家庭后生活正美满的时候，1973年8月，他突然提出上大学的要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回大陆后就有过这种想法；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工作实践中深深感到依靠自学的那点化工知识不能适应需要。但是他提出要求的时间太晚了，时值8月，大学招生早已结束，该到新生开学的时候了。我抱着试试看想法，把他的愿望如实地向省军区 and 北京军区联络部作了反映。万没想到，上级很快

给了肯定的答复：高教部作为特殊情况，特意批给一个指标，让周振德在河北省范围内选一个化工学院去学习。于是我和省军区的同志一同为他跑这件事。调查了解结果，石家庄虽有一个河北省的化工学院，但筹建不久。校方为难地说，条件太差，仍在边筹建边招生阶段，怕周振德来到这里，学不到多少东西，这样影响反而不好。

我回来把情况跟周振德讲了，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他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看，上边写的都是全国有名的大学：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复旦、西安交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好家伙，比我了解的还多呢！他坦率地说：“我想上级特批我上大学，实际上是考虑到对台宣传的需要。上一个不正规、没什么名的大学，将来宣传了影响也不大，弄不好还会有负面影响。我上的大学越是有名，影响也就越大呀！”我把他的意见再次向省军区和北京军区联络部反映，联络部的同志们听了都笑了起来，说他真算是把我们琢磨透了。经过联络部再次与高教部交涉，最后批下来了：同意让周振德到北京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业去学习。

消息传来，皆大欢喜。他本人十分满意，我们搞对台宣传的也很高兴，就连一直反对这门亲事的小苏的父亲也深受感动。他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真是对周振德信任，不然怎么会这样培养他呢？于是他按照他家的惯例——每当子女上学的时候，都要给他们买支新钢笔。这次他也买了支好钢笔给他这位从台湾来的好女婿。从此，他们翁婿之间以及这位残疾的老军人与其女儿之间的隔阂统统消失了，他们的家庭也更加和谐美满。

周振德还未进校，我和北京军区联络部的同志就提前赶到学校，介绍了周振德的情况，特别讲了他

来大陆后的进步。周振德去北京报到之日，学校专门派卧车去火车站接站。一到学校，师生们都抢着帮他搬行李，收拾房间，还简单而热烈地开了个小型欢迎会。他入学后，很快被同学们选为系学生会和校学生会的委员，分工抓学习。他在学校也十分活跃，除学好高分子专业外，还自修化工专业。他游泳技术高，体育锻炼参加了游泳队和长跑队。他真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显得更加年轻了。在他学习一段时向之后，我就去学校帮助他通过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向台湾人民介绍了他上大学的情况。香港的《大公报》发表了这封信。后来我和老康又去北大，为他拍了一组学习生活的照片，中国新闻社发了图片新闻。

在“文革”期间，大陆的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除各项有关业务课程外，还有一门课程是“学军”。他在学军前写信向我要了一些介绍解放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有关报刊资料，去保定附近驻军某部学军之后，他又写信向我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收获，我随即约他写了第14篇对台宣传稿《我所经历的两种军队》。后来我见到香港《大公报》在1975年10月28日发表，一份在古巴出版的华文报纸，也发表了。

分手二十载 信息经常通

1976年，我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天津的一家正在筹建中的大型石化化纤企业。跟过去在沧州认识的一些人，有的一直保持着联系，其中通信次数最多的要算是周振德夫妇了。我从他们的来信中了解到，周振德北大毕业后又回到了造纸厂，一心扑在工作上，到1978年已得奖状五份。“四人帮”倒台之后，周振德心情格外高兴，曾主动提出要写总

题为《忆十年往昔，奔锦绣前程》的系列文章，并表示愿意与我再度合作。此事虽因我们二人不在一地，又工作都忙没有办成，但我对他的想法很欣赏，也很想试一试。我从以后他们的来信中了解到，接替我工作的秦干事对他们的生活仍十分关心，甚至帮助他们解决烧煤气的设备和孩子入托等向题，厂里也给他们调换了更宽绰的住房。后来造纸厂一分为二，化学车间独立，另建沧州市化工厂，周振德当了厂长。这时他已提升为工程师，当了省政协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这期间我曾让小苏详细写些周振德的情况，以便积累一些资料为今后的写作作准备。当时小苏答应了，并于1979年12月18日给我写来了第一部分：周振德的家世。

周振德1978年晋升为工程师的消息在《河北日报》发表之后，小苏突然接到一位叫吉芙蓉的妇女，从山西太原一家化工厂写来的信，询问周振德是否认识周立本。信上说，周立本是她失散30年的哥哥，而她年近九十岁的老母亲仍然健在。她说她哥嫂离开大陆时带走一女一儿，男孩三岁就叫振德。虽然1969年她从报上已看到周振德返回大陆的报道，看姓名、年龄、籍贯都像她的侄儿，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她们未敢相认。这次是振德在石家庄地区赞皇县农村的四姑看到报纸后把信息传给了写信的这位大姑的。信是大姑的二女婿执笔，全家再三商议过的。信寄来时周振德正外出开会，小苏没等他回来，便回信说，周立本正是振德的父亲，她还把振德的照片给他姑姑寄了去。到了正月初三，周振德夫妇便去山西永济的三姑家去看奶奶。一阵惊喜之后，是全家人的抱头大哭。老人讲起了他们的身世和许多振德小时的事。原来他们本姓吉，祖父年轻时就

带着妻儿离开老家献县到山西来谋生。祖父有一子四女，父亲原叫吉世祥，抗战期间一次去根据地，被八路军抓获，险些当成密探处死，放回后，回锡山部下又说他是八路军派回的探子，要捉拿他。为逃灾避难，只好改名周立本——姓“周”是取“吉”被包围之意。随一人外逃又受骗，被迫在葫芦岛投考了国民党青年军……

后来在通信中我又了解到，化工部投资一千多万元搞烧碱车间扩建工程，周振德为此还去北京与日本人谈判过合资经营问题。在这期间，周振德还曾写信托我找人帮他翻译了几份日文技术资料。

事隔多年，到1992年10月，有一次我出差去沧州，顺便去化工厂看望了周振德夫妇。当时周厂长正在开会，我在厂企业管理办公室找到了小苏，她高兴地告诉我，周振德的母亲已经从台湾来看过他们了。是和他弟弟一家一道来大陆看他们的，在大陆住了三个月，最后小苏亲自送他们一同到了香港。

周振德散会回来，立刻邀我去他家作客。这是他们厂一幢宿舍楼的三楼，三室一厅，厅内放一大座钟，上学的儿子正在看境外一场台球比赛。戴着金丝眼镜的周振德拿出这次母亲带来的他小时、他父亲以及他父亲墓地的照片给我看。在他家，小苏为我和周振德拍了一张合影。这时我才想到，与周振德同在沧州多年，报社的老康为他拍了那么多照片，就没有想到让他给我们拍合影，小苏拍的还是我们二人相识以来的第一张合影呢。

从他家出来，我又到军分区宣传科老科长家串门，知道了有关周振德的更多情况，几乎都是赞扬他的话。他们厂已是河北省和沧州市的利税大户，很有声望。周振德亦被选为沧州市的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 文 贤）

她虽然没有地位，没有金钱，没有家产，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但她却以勤劳、善良、贤慧之美德，哺育了一位世界名人，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无名氏哺育世界名人

——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忆母亲教子

● 黄智敏

“我和罗罗是‘一奶同胞’！”

“罗罗，就是我的弟弟华罗庚！我们家里人都喜欢这样叫他。”

“我母亲就生了我们俩。”

“我比罗罗大三岁。”

……

前不久，我登门拜访了已故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姐姐华莲青。她向笔者侃侃谈起他们生身母亲的往事……

“我母亲的老家在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我妈18岁那年，与我父亲华瑞栋结婚。”

“我姥姥家比较穷。小时候，我妈带我去过姥姥家。她的住房很破旧，下起雨来，到处漏水；她的衣服和床上的被子补丁贴补丁，连家里的凳子，也是缺‘胳膊’少‘腿’的。”

今年整整90岁的华莲青大姐，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也很好，说起八九十年前的事情，就像是昨天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

“我家祖籍原在江苏省丹阳县昉仙桥，后来才搬到紧靠太湖西北角的金坛县定居。”

“我父亲华瑞栋（小名叫华祥发，人又称他‘华老祥’），从小就在县



华罗庚教授

城的一家布店学徒。结婚那年，他刚刚出师。老板看他精明能干，就留他在店里帮忙。每月收入很低，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我母亲从娘家嫁到华家，照样过着穷日子。说起我的母亲，那真是可怜呀——她一辈子穷得连个名字都没有！”

说着，说着，华莲青大姐泪水满面，声音哽咽，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接着说起来：

“当时，大家只知道她娘家姓巢，乡亲们大都叫她‘华巢氏’，而我父亲则叫她‘孩子的娘’，罗罗出世后，改叫‘罗罗他娘’。”

“我母亲曾信过佛教，教里的主持曾给她取过一个名字叫‘巢性清’。由于知道的人很少，这个名字也没叫开；没过几年，连我母亲自己都忘记了。”

“我母亲勤劳、善良、贤慧，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尊敬和赞许。”

“我们家有个邻居，年老多病，又无子女，常常断炊。我妈妈可怜这位老人，就经常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老人手里。老人逢人就说，华巢氏真是个好人啊！”

“一年冬天，有个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路过我们家门口，不慎跌进池塘里。我母亲把她拉上岸后，又接到家来，给她换了干净衣服。有条新棉裤，我母亲一直舍不得穿，这回也送给那位妇女穿上了。”

“有时，我不解地问妈妈，我们家穷得叮当响，你为什么还老把东西送人？妈妈总是乐呵呵地回答说，做人不能光想着自己。再说，现在妈妈还年轻，还能劳动。能劳动，就什



华莲青近照

么也不愁。

“的确，母亲是一个很勤劳的女人。她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也常年到别人家去打工，劈柴提水，做饭烧水，拆洗衣物，打扫卫生。每天从早干到天黑，累得直不起腰、抬不起腿。尤其是严冬，太湖的风太湖的水冷得刺人，母亲双手冻出了一个个血口子。我父亲看了心疼，劝她不要干了，而妈妈反倒安慰父亲说，冬天就过去了，春天天气一暖和，我手上的口子自然就好了。

“罗罗是在我父亲四十好几岁才出世的独儿子。父母虽然特别爱他，可从来娇惯他。有一次吃饭时，妈妈给我夹了一块鱼，罗罗看了不干，又哭又闹，要我把鱼块夹到他碗里去。妈妈说，这鱼是大家吃的，你吃，爸爸吃，姐姐吃，妈妈也吃，大家一起吃。罗罗那时只三岁多，妈妈虽然说了那么些话，可罗罗还是要我把鱼块夹给他。这时，妈妈生气了，让我把鱼吃掉，说不能惯罗罗这个毛病。罗罗看妈妈真的生了气，也不敢再哭闹了。

“听我妈妈说，我出世的时候，妈妈的奶水很多。我一、两岁时，天天只吃奶，很少吃别的东西。邻居有个与我同岁的小男孩，母亲的奶水

不够，长得又黄又瘦。母亲心疼那孩子，就让那孩子天天来吃她一、两次奶。邻居为了感谢妈妈，给钱送新衣服，妈妈都不要。在罗罗小的时候，我常把这件事讲给他听。罗罗听了，也倍受感动，还天真地对我说：姐姐，等我长大了，也要像妈妈那样行善，把奶给别的孩子吃。

“大约在罗罗两岁的那年冬天，妈妈带着罗罗坐两个人推的小车回丹阳老家去。那天，正好大雪纷飞，天很冷，半路吃饭时，母亲让推车人暖和一些，就多让他们喝了几杯酒。不料，两个人一上路就昏昏沉沉，走路也东倒西歪起来。在过一座石桥的时候，连车带人都掉进河里去了。水深凉澈，母亲虽不识水性，不会游泳，但她非常冷静沉着，一边紧紧地搂着罗罗，一边大呼‘救命’。一个浪头袭来，把在冰冷水中挣扎的母亲卷进了激流。正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又涌来几个浪头。这几个浪头就像几十个壮汉子，把他们母子俩人推上了岸边。当救人的人赶到时，母亲和罗罗已经脱险了。这件事，当年在我们家乡流传很广。罗罗长大成人后，提起这件事，常常为妈妈的无畏精神感到自豪。

“我们当时的家就住在县城的清河桥下面，抬头远望，河网交错，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我和罗罗常常端个小凳子，坐在那里看书、写字。邻居赞叹说，他们华家两个孩子多乖，多有规矩。

“我大伯身体不好，孩子又多，家景比我们家还苦。于是，我父母就把大伯家的三个孩子带到我们家来养。母亲对这三个孩子，如同亲生的一样。这三个孩子比我和罗罗都大。自从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后，每年做新衣服就只有他们的份了。妈妈对我和罗罗说，哥哥、姐姐比你们高，没衣服穿不行，你们长高了不怕，哥哥、姐姐不能穿了的衣服，你们可以接着穿下去。我和罗罗听了，心里还满高兴的。

“罗罗长到十来岁，也常在当年父亲经营的‘乾生泰’的小杂货铺里干些零活。罗罗从小就爱看书，尤其爱读数学书，有时读书竟入了迷，为此也闹出过不少笑话来。比如顾客来买东西，喊他拿东西来，他有时既不给顾客拿东西，又不回顾客的话，有的顾客还以为他是个哑巴哩！有一次，有位顾客来买香烟，他却给顾客递去火柴。还有一次，顾客要买火腿，他却给顾客拿去香料。

“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写的《华罗庚》传中，就写过不少这类事情，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有一年冬天腊月二十九的晌午，天空飘着鹅毛般大雪，金坛小镇成了银白色的世界，远近不时响起噼啪的爆竹声。一位老乡走进店门，一面抖落浑身的雪花，一面问：

“多少钱一支线？”

这时，全神沉浸在数学中的华罗庚，头不抬，手不停，把刚刚在香烟盒纸上演算的结果脱口而出，说：

“853729！”

“多少钱？”

“853729！”

买棉线的老头诧异地问道：“一支棉线怎值这么多钱？”

坐在柜台后面的华老祥听了，赶忙出来招呼，可是那位顾客一气之下，竟扭头走了。

华老祥顿时火冒三丈，他从儿子手里一把把书夺过来。这时，华罗庚才从数学的迷宫里清醒过来。

“罗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身在杂货店里，心却在数学王国里。因此，他在接待顾客买东西时，心不在焉，还常常算错帐。一次，有位顾客来买棉花，竟少收了那位顾客一块大洋。

“我父亲常常为罗罗读书入迷而误事的事发火，有时还夺过罗罗的书，撕成碎片，或扔进火炉里烧掉。

“在对待罗罗读书的问题上，妈妈与父亲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妈妈非常支持罗罗用功读书。她常说,要制出好的刀剑,必须淬火加磨砺。孩子要有出息,也必须经过一番刻苦锻炼。因此,妈妈常常抢过父亲手中夺来的书还给罗罗,然后又耐心地对父亲说,罗罗爱看书,是一件好事,做父亲的应当大力支持才是。这种烧书、撕书的办法,只能伤害孩子,帮助教育不了孩子。开始,父亲听不进这些话,经过母亲反复讲,父亲才慢慢觉得妻子讲得有理,气才慢慢消了。

“罗罗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妈妈怕罗罗用功过度,累坏了身子,就常给他做些他爱吃的东西。深夜,妈妈看到罗罗还在读书,就悄悄地给他端去一杯糖水,或者热茶。

“罗罗在严父、慈母的关怀下,

更加发奋读书了,从中也学到不少本事。有一件事,真把父亲乐坏了,他逢人就说,看来读书真有用呀!我罗罗快有出息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年秋天,罗罗跟父亲到一家茧场帮人家盘点。十几个人,干了整整一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吃完晚饭又聚在一间小屋子里‘清帐’。罗罗那年刚十来岁,不多会儿就睡着了。深夜,一阵秋风吹打门窗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才发现满屋烟雾,大人们在焦急地议论着什么。罗罗轻声问父亲出了什么事了,父亲告诉罗罗,帐对不上,相差上千块钱呢!这时,罗罗才从老板手里拿过帐本,又抓过算盘,噼噼啪啪地算起来。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罗罗告诉老板说,帐对上了!满屋子

的人听了这话,都惊呆了。大家照罗罗的算法仔细地又核对了一遍,果然分毫不差。

“从这件事之后,父亲再也没烧过和撕过罗罗的书了。

“在罗罗成了世界著名大数学家之后,有的乡亲说,这是华家的祖坟风水好;有的说,这是华巢氏积德行善‘修’来的;还有的说,罗罗从小聪明过人,是神童下凡……

“罗罗听了乡亲们这些话后,曾多次同我、同亲友、同朋友说我华罗庚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尊敬的母亲,是她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人、做事的!

“我觉得罗罗的话是对的!”

(责任编辑 洛松)

· 广 告 ·

肾炎灵揭秘

一个时期以来,郑州管城中医院的肾炎灵系列药物根除慢性肾炎之痛苦,挽救尿毒症之危亡,病人为之奔走相告,齐声赞叹:肾病克星出现矣!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省中医管理局、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进行了深入严格的鉴定,指出:“该成果的推广,无疑会给广大肾病患者带来福音,其推广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半月谈》、《人民日报》等也不吝篇幅,详尽报道“张大兴克肾炎”。肾炎灵之“火”由此可见矣!然与之相关的一些秘闻则鲜为人知。

张洪鹏、张大兴之先人,秉承祖业,悬壶济世,本世纪之初,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曾盛传张氏医术之高,尤以治肝为绝,无论全身肿势何等之凶险,张氏药方一服可消之大半,三日后则一如常人。此方乃益肾膏之雏形也,其秘在攻补兼施,温阳利水也。传至张大兴,除了尽得祖上真传外,更博览古今,汇通中外,渐知祖上绝招所治之肿病,西医谓之肾炎居多,化验多以蛋白尿、管性尿、血尿等为主,或有高血脂、高血压等,其症状除浮肿外,兼有乏力、腰痛、易感风寒(热)等,再以治之,也每多

效验,然也有病久难愈者,思忖之,病机不同矣。调方加减,不甚效,再调之,亦不甚满意,数番思索,终不得解。乃效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辛苦不少,受益非浅。再成方、尝百草而验其用,经历再三,肾炎灵终于诞生矣!以之合益肾膏同用,治慢性肾炎之顽固性蛋白尿,常以2—3个疗程即可消除,并以肾炎灵巩固一段,便终生不患此病矣!其秘亦无他,整体出发,平调阴阳,提高免疫力,药用补肾利水,健脾化痰结合也。

张毛利姐弟三人,张大兴之后人也,作为张氏治肾传人,均从小接受“学海无涯”之古训,故不敢微微怠懈,寒窗苦读十几年后,亦着重修习国医,钻《内经》义,研仲景学,考金元之各家,究时珍之本草;更通细胞之理,明细菌之道,奋发不倦,攀登肾病之更高峰——肾衰。张氏一家即有老辈丰富之经验,又有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之新观点、新思维,紧密结合,几经寒暑,创立了尿毒症之病理——虚、瘀、毒、湿;疗法——阴中求阳固其本,瘀湿毒邪重攻之;方药——复方益肾散合肾炎灵系列。脱离透析、愉快走向新生活之病家皆呼:肾衰救星出现矣!据考,仅1993年至今,肾衰患者所送锦旗就有数十面,感谢信数百封。

地址:郑州市管城中医院肾病科(城东路60号)

邮编:450004

电话:(0371)6336346

冀广审省字:606—1847

“只通物性，不通人性”的

二哥韩修德

● 韩纯德

老来爱回忆旧事。每当想起我的二哥修德，眼前便浮现出一个相貌清俊、身体适中的汉子，他原本白晰的面容被晒得黝黑，背着背包、水壶，一手拿着矿石样品袋和高倍放大镜，一手拎着长把地质斧，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地在天山之麓攀援跋涉。他是一位矢志为开发祖国资源而走遍三晋黄土高原和大西北山山水水、沙漠绿洲的老资格地质师。

二哥是早期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本科毕业生，当时的校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先生，系主任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二哥是全系26名学生中的佼佼者。

我们家是山西定襄县的一个商业世家，父母一贯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1919年家道中落，父母把复兴家业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二哥身上。二哥从小就聪敏好学，他在上小学和在太原一中读书时，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我家开设在内蒙古多伦的恒生瑞商号的收益曾是专供二哥外出读书开销的。后来尽管商号倒闭家庭破产，生活困苦难熬，父母仍然想方设法借债供他读完了大学。那时能进北大读书的学生除省、县两级政府每年给180元的津贴外，家里还得拿出200元现金大洋。由此可见父母对他的期望。

二哥生于1898年，长我15岁。我记得他小时候活泼好动，爱踢毛毽和足球，是太原第一中学足球队队员。在北大读书时，有一天他路过操场，正巧一只足球飞过来，他一个倒钩把球踢回球场，引得运动员们一片喝彩。就这一记妙传使他很快被吸收为北大足球队队员。他还经常操练太极拳、徒手擒拿、木棍对打等武术。他对京剧、晋剧也很喜欢，放假时在家经常教我唱京剧段子。开始教的是《三娘教子》中老薛保劝慰三娘的那段二黄腔。

他对晋剧武生出场时上翻三折落地、倒翻可以上梁的绝技赞不绝口，对梅兰芳大师的艺术和品德，如抗战时蓄须拒演的民族气节推崇有加。他的独子福田说，父亲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他读过不少专业以外的书，如《文心雕龙》、《聊斋志异》、《浮生六记》以及十才子书、《中山全书》等他都认真研读过。我知道修德对《红楼梦》的研读曾颇为投入，他在北大时就读过22遍。后来他在川至中学教书时，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赖若愚、续吴山等都非常喜欢听他讲《红楼梦》的故事。

我的这位悟性很高，兴趣广泛，在知识的海洋中搏击的二哥，在生活的道路上也有他意想不到的坎坷和不幸。

先说他的婚恋情况吧。我父亲韩弥敬生前是定襄城关的开明士绅，他曾带头在南关扳神像腾庙宇兴学校，为乡人称颂。但他毕竟是旧时代的人，虽然把教育子女读书成才作为治家的主旨，但仍然沿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习俗。父母给二哥说的第一个妻子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女子，长相也与二哥大不相配。二哥寒暑假回家时从不与她同居，也很少说话。他在北大读书时，有时住在西直门内我岳父李寿山家。李家的大姑娘叫巧莲，聪明贤慧，长得也很标致，而且也是个婚姻不幸者。二哥和她同病相怜，彼此很投缘。但当时在那种旧式家庭的环境中，只能心心相印而不可能成为眷属。二哥大学时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解除他的这种使男女双方都痛苦难捱的封建婚姻。我在天津北洋工学院上学时，手边一本物理课本是二哥读过的旧书，书眉上有好几处都写着“换换就好了！”

后来，二哥是在他家乡的妻子不幸者病故后，才和邢佩珩结婚的。邢是师范毕业生，家住太原，也是我家



在天山脚下野外作业时的韩修德（左）

的亲戚。二哥从北京回家途经太原时，常住在邢家，他俩就相互熟悉了。有一天晚上，二哥看到他枕头上放着一块花手绢，他断定这是她爱的暗示，便主动求婚。他终于满足了夙愿，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1924年二哥从北大地质系毕业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血雨腥风笼罩着华夏大地。要吃饭，要生活，就要找工作。可那时的地质工作者职业难求。好不容易在山西省平遥县励志中学找到了个教员的位置。这所学校是一个票号资本家办的私立学校。二哥性情耿直，不谄世故，对老板从不曲意逢迎，于是关系搞得很僵。一天，二哥突然把领到的薪水换成零币，到集市上散发给老百姓，随后便离开了学校。他失业了，直到1926年，他才又到五台县河边村的川至中学担任化学教员。这时我也随他进川至中学读书。可他只干了一年又辞职回到太原。失业一段时间后他在《民国日报》当了校对。一个名牌大学的地质学毕业生迫于生计只能做个报馆的文字校对，真是难为他了。

颠沛流离若干年后，在抗战前几年，二哥经人推荐进入山西小探矿局担任技佐，这才如鱼得水，找到了发挥专长的地方。抗战以后听说他随探矿局转移到陕西。由于我一直在家乡从事抗日工作，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据他的儿子福田回忆，因山西探矿局迁到陕西无事可做，他又到了甘肃，当过兰州阿干镇煤矿的工程师。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特别讲究巷道的支撑和通风以及井下水、火、塌方的防护，以保证井下矿工的生命安

全。以后他又当过黄河水利委员会下属的青海享堂水文站站长，常年监测黄河的支流大通河的水质、水位及流量。大约是抗战胜利后，他又到了新疆地质调查所工作，后来于1950年至1952年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及漫漫沙漠中风餐露宿中度过的，其工作的困难，生活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有一次他和同伴在荒野探测，天热口渴。水壶里早已没水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坑，水中有股浓重的马尿味儿。几个人再四处寻找，也没有发现一滴水，只好回来捏着鼻子喝下这臭水。

解放以后，我在太原市委工作，得知二哥在新疆从事地质工作。有一次王震同志由北京返新疆途经太原，省委书记程子华到机场看望王震时提出，韩修德对山西地质情况比较熟悉，希望王震同志给予关照，将他调回家乡山西工作。老同志都知道，王震是一位爱护人才，重视知识分子的领导人，他回新疆后得知二哥是一个难得的地质专家，不同意把他调回山西，而是提升他为新疆地质局副局长。1956年底，他终于调回山西省地质局担任工程师。

二哥原本性格活泼，直爽单纯，可是后来却变得脾气孤僻、怪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年轻时的性格形成强烈反差。这可能和他初出茅庐时的志向难遂、历尽坎坷有关。有一次，地质部的一位处长到新疆出差去看望二哥，他回北京后对我说：“你二哥这人真有意思，我去拜访时他说了一句‘你来了’，拿出一盒哈德门香烟放在我面前，就再也没有第二句话了。”二哥给人写信十分简单，从无衍词套话。有一次他给我写信，只写了：“……？……。”他调回北京后，只去两个地方串门，一个是我家，一个是他岳母家。他就是这么一个“只通物性，不通人性”的人。这里说的“不通人性”是指不懂人情世故而言。他对世俗人情总是采取退避三舍的超然态度，他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待遇，而是把全部精力倾注到他所热爱的专业上去，这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追求。大概也是由于他的性格原因，1954年他不再当副局长，仍然当他的工程师。

1978年，二哥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我的二哥韩修德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他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一份份地质调查报告。但他的一生也让人感慨。所幸今天我国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二哥那样，性格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扭曲和压抑。

（作者韩崇德，抗战初期曾任中共山西省定襄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杜 晋）

八十重上黄山

——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 胡绩伟

今年6月,我应安徽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安徽老年报社的邀请,以81岁之身,在距上次15年之后,重上著名的风景胜地黄山,引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回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安徽在20年前揭开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序幕的情景,也是《人民日报》在当时对安徽改革进行大力宣传的情景。

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意义在这里。

6月8日一到蚌埠,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蚌埠原是凤阳县的一个小镇,凤阳是农村“大包干”的发祥地,我立即想起了当时曾经流传全国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在6月10日的一个笔会上,我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重游安徽

包干到户发祥地,农村改革先锋军。

大别幽兰香万里,包字进城百业兴。

黄山九华全球赞,歙砚徽墨华夏魂。

凤阳花鼓歌巨变,江淮沃野季季春。

12日到了合肥,同一些老新闻同行畅谈了当年《人民日报》对安徽的宣传情况。恰好,合肥新出版的《华夏纵横》杂志刊登了江鲲鹏同志写的《安徽农村改革开拓者的足迹》,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又重新翻阅了原新华社记者,后任原《农民日报》总编辑的张广友同志所写《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的第三章:《包产到户:中国农村的历史转折》。这都帮助我更清楚更准确地回忆起那一段美好的情景。这次从皖北到皖南,驰骋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我的思绪时时回到20年前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

十年浩劫以后,全国人民在沉思,在觉醒。中国需要再一次大解放,大翻身。一场全面的拨乱反正运动正在各方面兴起。

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展开后,中国人民第一场翻天覆地的壮举是平反冤假错案,大胆冲破多年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种种政治枷锁,把许多劳苦功高的老一辈革命家解放出来,重新走上了各个重要岗位。紧跟着就是那场石破天惊的农村改革运动,冲破“人民公社”的天条禁令,迈开了摆脱贫穷苦难的沉重步伐,开始扭转了整个国民经济倒退的车轮。接踵而来的就是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和多年来的清规戒律,亿万人民从解放思想到放开手脚,重新大干起来。

“文革”以后,我第三次解放出来,调回人民日报社,顶替了那位“戈培尔总编辑”。十年的深刻教训,促使我在经过一小段摸索、徘徊以后,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人民日报社的同志们同心协力、英勇奋发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坚决为披荆斩棘、改革开拓的人们,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平反昭雪的宣传刚刚开始,紧跟着又开始了为农村改革鼓劲加油的宣传。在这场农村改革中,安徽站在前面,《人民日报》对安徽改革的宣传也是相当积极的。可以说安徽的改革同对安徽的宣传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是遥相呼应、相辅相成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8亿农民大都处在贫穷落后和半饥饿状态中。河南、山西、安徽在冬春季,年

年有大批农民外流逃荒,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乞丐”群。

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层仍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两个凡是”,农村经济仍然遵照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原则,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业生产得不到恢复,农民仍然处于缺吃少穿的穷苦水平线上。

1977年6月,万里同志被派到灾难深重的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走上了同“凡是派”作斗争的第一线。

当时,广大农民要想摆脱贫困,一举一动都受到“人民公社”条条框框的制约,动辄就得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棍子。万里同志带领省委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支持群众摆脱贫困的种种创举,仅半年时间,安徽的形势开始好转。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记者采写的《安徽大步赶上来》的长篇报道,对安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紧跟着,安徽省委总结了广大农民意见和种种改革作法,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六条”意见(全称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决定》)。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报社记者对万里同志的专访,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着重报道了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起草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安徽这“六条”,是从政策上对各级领导多年来存在的瞎指挥加以限制,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一宣传,在全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这时,小平同志出访巴基斯坦路过四川,把安徽经验介绍给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很快,四川省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起草了一个“十二条”,加快了四川的农村改革步伐。当时,坚决站在农村改革最前线的还有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广东(第一书记任仲夷)、贵州(第一书记池必卿)等省区,这就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帷幕。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传遍全国。

在万里同志主持安徽工作时,新华社总社派记者张广友,随万里进行采访;同时也调来四川分社农村组长刘宗棠到安徽参加报道。他们二人到靠近风阳的定远县进行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的情况向万里同志汇报,得到万里的肯定,作了很重要的指示。他们立即把这写成稿子,特意把万里的指示放在稿子的最后一部分。197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的地位把这篇题为《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登了出来,同时把万里同志的讲话改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刊出。万里的这番话,真可说是金玉掷地,铿锵有声,今天看来,仍然值得一读。现在摘录几段,抄在下面:

万里说:“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说到底,是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是把群众当成真正的英雄,还是当作‘阿斗’的一个原则问题。”“为什么一提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就有那么一些同志顾虑多端,忧心忡忡,又是担心自己的指挥不灵了……又是怕生产队搞自由种植了。主要原因是这些同志缺乏群众观点,官僚主义严重。我们中有些人不懂或不大懂农业生产,又不了解实际情况,还要生产队听他们的指挥,不出问题才怪呢?”万里最后说:“我们不仅要看到瞎指挥是侵犯生产队权利的行为,而且也要看到它的危害,号召广大农民要为自己生产自主权不受侵犯而斗争!”

当时,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是反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了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气都搬出来”,因而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的。他们顶着各种极左的帽子和棍子,突破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条条框框,坚定不移地前进。他们根据当时安徽的实际情况,大胆进行了“借地渡荒”和“包产到组”的作法,虽然引起省内外各种各样的反对声,《人民日报》却是始终予以坚决支持。

这时《人民日报》又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针对“两个凡是”批判极左思潮,这对全国的农村改革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支持与鼓励。为了推广“包产到户”(当时还不敢直言“包产到户”,改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到人,责任到人”),万里同志指示张广友又写了一篇《农业计酬必须联系产量》,在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的二版头条刊登出来。万里同志说:“中央的文件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嘛!中央的政策是指导实际的,也是从实际中来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个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都有个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过程。”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强调了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却又规定“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文件发出以后,争论进一步扩大。对于那些坚持农村改革和反对农村改革的人来说,都认为是对自己的有力支持。

安徽省委在讨论这个文件时,虽然大都同意“包产到户”,但顾虑很大。万里同志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因而使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是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检验。”他同意在肥西县的山南公社试验包产到户,得到省委常委

委会一致通过。结果,山南一试验,全县40%的公社也都跟了上来。

安徽凤阳县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年九荒”的地方,合作化以来的23年,一直是个“三靠”县(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推行包产到户收到了明显效果后,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感到这样还不满足,又悄悄地实行了“包干到户”,老百姓把这叫“大包干”,反对的人把它叫“分田单干”。他们瞒上不瞒下,秘密议定:“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搞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群众表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

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队搞大包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开了,很多生产队来学习取经,批评“小岗搞资本主义”的风也吹大了。县委书记陈庭元亲自到小岗去作了调查,表态支持他们。陈庭元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队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结果在这一年获得大丰收。这个一直靠国家救济、贷款的“三靠队”,1979年包干一年,第一次向国家交了6.5万斤粮、2万斤油料,平均每人农副业收入四百多元。农村对大包干歌颂道:“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又说:“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小岗生产队大丰收以后,1980年1月,万里同志专程来到小岗,一下车就挨家挨户查看,只见各家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可是农民的心里还是很忧虑,因为有人说他们是开倒车,怕又来一次“反资本主义”运动。万里说:“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在万里的支持下,凤阳县很快推广“大包干”,从此结束了凤阳几百年来群众外出讨饭的历史。

二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安徽推行农村改革的发展情况,产生了推动全局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也不是风平浪静的。1978年3月,由于我对稿件的处理不当,发生了一次大的失误,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至今仍然感到很内疚。

事情是这样的:

1978年3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七省座谈会上,围绕着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安徽的经验受到称赞,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评。3月14

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给人民日报社送来了一封“读者来信”,还加了“编者按”,要求《人民日报》予以刊登。这封信不仅反对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也反对,认为“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编者按更以中央文件的语气指示说:“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的地方,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作法。”

尽管我不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和按语的意见,可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要《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稿子,我这个总编辑不能不登;何况我们当时的主张是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发表。当时,我头脑很不冷静,没有找一些同志商量,想一个比较妥当的处理办法。一气之下,就决定登一版头条,心想让这篇极左的货色登台亮相,引起大家注意,让广大读者去评价。结果,一封以张浩署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和“编者按”用突出的大字标题在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地位上刊登出来。

来信登出后,又经过电台和新华社广播,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广大地区,以为中央的政策变了,有的赶快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停下来;有的惶惶不安,等待上级来“纠偏”。那些反对农村改革的人,则趾高气扬地说:“这说明还是我对!”

报社收到很多电话和来信,批评《人民日报》不该刊登这封信。很多领导同志,包括当时的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都批评我,耀邦同志说,登头版头条,表明报社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应当登在农村版,或者放在一版的下面。“编者按”也应该改掉指示、肯定的口气,改为“引起注意,可以讨论”的调子。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守一同志(1940年初在延安创办《边区群众报》时,他是报纸科科长,我是主要编辑,我们间的关系一直很好)给我来电话,询问刊登这封信的原由,告诉我安徽省委对这封信的批评意见。他劝我赶快组织稿子对这封信提出反驳,把坏事转化为好事。

我接受这些批评,承认自己的失误。报社农村部的同志立即同参加七省农村会议的安徽省委的同志商量,由辛生和卢家丰两同志署名,赶写了一封反驳信,报社农村部又加了一个“编者按”在3月30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编者按”中还对报社在处理张浩来信上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这场风波才算完结。

刊登张浩来信的这件事,经过这一反复,倒真的把坏事办成了好事。结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农村改

革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更为广阔地开展起来。人民公社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无法开展下去了。万里同志说:“我们的实际行动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表态……我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对于当时有人批评安徽“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反对学大寨”等等指责,万里同志说:“我们没有那个条件,就是不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阳关道可走,只好走独木桥。”

万里同志的这番话,点出了问题的根本。《人民日报》特约当时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吴象同志写了一篇曾经誉满全国的文章:《阳关道和独木桥》,1980年11月在《人民日报》上登了一大版。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高度来加以立论,批判了我们多年来在没有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硬要搞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这篇文章最后说:“不论是独木桥、木板桥、石板桥、铁索桥,只要是能走人的,我们统统要加以利用,加以改造,加以发展,这样才能走出沟壑纵横的深山,来到平坦的原野,踏上金光灿烂的阳关大道。”

三

1982年,安徽的农村改革已经全面铺开,稳步发展。但就全国来说,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稳定,而且那些坚持左倾观点的人,一有机会就攻击安徽等省市的“双包”(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离经叛道(就是离马列主义之经,叛人民公社之道)。为了批驳这股保守势力,我在这年的7月,带着几名编辑和记者专门到江西、安徽作了长达两个月的调查研究。

在安徽滁县地区所辖的是10个县,每个县我走访了一个公社,到处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在凤阳县,我到了早已闻名全国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同这里的农民和干部进行交谈。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央的政策稳定下来,不要改变“双包”生产责任制。农民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小诗:

牛壮猪肥稻谷香,你追我赶盖新房。

年年逃荒千日泪,家家自主万斤粮。

欢声笑语迎宾客,知心话儿带中央。

包干到户甜如蜜,千万莫变稳为纲。

在滁县地区我开过几次座谈会,同县委同志和农村干部们探讨农村改革中的很多问题,既了解了实际情况,又了解了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动向,可以说我这次是满载而归。

回到报社以后,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宣传农村改革。我同一起去作调查的胡志仁同志合作写了两篇理论

文章,从理论上批驳了种种所谓“离经叛道”的言论。一篇是《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4日刊登的《农业大变革的启示》,一篇是12月27日刊登的《八亿农民当家作主》。

前一篇文章分析了列宁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是我们多年来奉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是我们几十年来大搞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根据,也是多年来搞政治运动批人整人的天条。文章从列宁当时说这话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阐明这仅仅是列宁当时针对他们本国具体情况讲的话,根本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本原理。文章还具体分析了我农村和农民的具体条件,阐明列宁这句话是那些左倾理论家们搬用的教条,是打人的棍子。这篇文章从实际和理论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双包责任制的优越性。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转述了安徽农民的心里话:“在安徽滁县地区……听到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都这样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干部和社员群众力没有少出,苦没有少吃,国家为发展农业的钱没有少花,各级领导机关的心也没有少操,今天搞这个定额管理,明天搞那个评工记分,为什么生产总是上不去呢?是中国人蠢吗?是中国农民不勤劳吗?是农村党组织和干部不好吗?不是!究其原因,是没有很好地研究我国的国情,不去寻找符合我国实际的经营管理体制,也不考虑各地不同情况和特点,一切照搬照抄,用一个模式去套,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结果吃了很大苦头而迟迟不能觉悟。”

在第二篇文章里,着重阐明这样一个道理:“衡量党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不在于是否合乎某一个教条,不在于是否合乎某一个领导人的‘指示’,而在于是否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需要,是否能够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地阐明广大农民拥护包干到户的道理。文章说:“我们访问了一些老农民,他们都称赞包干到户就有了自主权,农民对生产经营、生产管理和劳动成果分配有了自主权,农民也能够合理支配自己的生产时间和业余时间。”

文章中还引用了一段农村妇女特别欢迎包干到户的话,更是合情合理生动感人。她们说:“过去我们天天捆在田里,活忙活闲都得泡在一起,事事都被干部管着,干得再好也是七分八分,累了一天回家还有一大堆家务事,连走娘家也得看干部的脸色。包干以后,妇女劳动灵活多了,可以多干些精细活,累活重活都让男劳力干了;早早把活干完可以回家干家务,一家人分工合作,田里活家里活都干得痛痛快快,赶集、走娘家也自由了。”

请看,这就是包干到户使农民真正作了土地的主

人,作了庄稼的主人,作了自己的主人。这就是农民要求的最起码的民主。文章结尾说:“现在,八亿农民的生气勃勃的积极性,已经扭转了农村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并对推动全国形势的好转起了重大作用。八亿农民当家作主,对于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也将发挥重大作用。”

15年后,我这样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安徽这一段农村改革的历史,回忆起我当时所支持的《人民日报》宣传农村改革的一些历史片段,回忆我自己对农村改革的认识深化过程,这也是我对这次重上黄山、重游安徽的主要兴趣之所在。

四

回过头来看,15年前那一段曲折、反复、艰辛的历程总算过去了,如今整个安徽早已面貌大变,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冲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村经济大翻身。包产进城以后,由服务业、手工业、小工商业复苏到整个工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全面振兴。改革开放以后,私人企业、乡镇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资企业迅速发展,改掉了计划经济体制,整个国民经济生机勃勃,日新月异。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由安徽开始”这一点,从安徽的发展是看得很清楚的。

这次驰骋在贯穿安徽南北的公路上,沿路大大小小的城镇串联在一起,高楼新宇比比皆是,宏伟的太平湖大桥和铜陵长江大桥,大大缩短了去黄山的路程。沿路农村新房已经换了两三代,特别是皖南一带,新建的安徽古朴民居,一色青顶白墙,飞檐翘角,隐现在绿树翠竹之中,似乎处处都有桃花源的遗迹。

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安徽的市政管理很有特色。合肥的繁华街道比北京的东单、西单还“亮”。值得一提的

合肥有个“金勺子餐厅”,是大型快餐店,门墙上的广告是“10元吃饱,20元吃好”,十分吸引人。店内一个八九间门面的大厅和两层楼的回廊,食客挤得满满的。快餐饭菜,集中了多种风味小吃,花样之多,质量之好,价格之便宜,确实使我大吃一惊,这是值得北京学习的。

九华山和黄山的环境卫生之好也出人意外,很少见到抛弃的易拉罐和塑料袋,这是很多风景区多年努力都没有做到的,十分难能可贵。

这次重上黄山,我已经81岁了。好在已经修建三条登山索道,不然,要我象15年前一样,凭两条腿登黄山,就没有本领再上去了。

上次上黄山,在山上住了四个晚上。那时已经是66岁,凭着坚韧不拔的腿劲和勇攀高峰的信心,游兴很高,诗兴也很浓。这次,八十高龄上黄山受到很多游人的称赞。在山上只住了一个晚上,只攀登了险峻的始信峰。站在千仞峭壁的峰顶,眺望千山万壑,极目绿海碧波,始信黄山不愧为天下第一山。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观看日出富有冒险色彩。在三位朋友的搀扶推拉下,终于爬上狮子山清凉台的悬崖峭壁,从凌晨四点守候到海天鱼白的五点半,只在东方厚厚的云层缝隙中看到一抹朝阳,心情却是无比的自豪和愉悦。

前年,我坐缆车上峨眉山;去年,坐缆车游蜀南竹海;这次又坐缆车上九华山和黄山,这在我思想上产生了一点启示:原来总以为人老了,就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少到外地去游山玩水,又劳累,又冒险,不如在家清闲安全。如今我想,现代科学发展很快,飞机更安全,高空索道也很保险,能够登高远眺,放情畅游,胸宽眼阔,心旷神怡,又何尝不是有利于健康的晚年快事。我想,如果哪一个景区将来能够坐直升机鸟瞰观光,我还想试一试。

(责任编辑 林 跃)

欢迎订阅《纵横》

拥有《纵横》,您将拥有一部具体、翔实、生动的中国近现代史。

《纵横》是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读物,创刊15年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重在披露近百年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再现重要人物多姿多彩的活动。《纵横》拥有一批阅历丰富的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队伍,以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全方位地展示新旧中国的沧桑巨变。

本刊主要栏目有:纵横视点、历史回音、史林探迹、人物春秋、往事追怀、文苑艺林、工商经纬、名人档案、社

会一隅、凡人话旧等。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可供馈赠,值得收藏。浏览《纵横》,您将获益匪浅。

1998年,我们将与广大读者共享《纵横》百期的收获,届时将推出一批回顾与反思本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独家专稿,增辟新栏目,更加关注您所关心的史事。根据读者的意见与建议,1998年本刊对封面与版式做进一步革新,价格开本不变,出版日期提前到每月7日。

《纵横》由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发行,全国邮电局(所)均有零售并可为您办理订阅手续。凡订阅不便或漏订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邮购。

编辑部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话:(010)66192569

只惟实 不惟上

平息“鱼塘风波”

● 季 音

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农村改革，是在不断排除“左”的干扰中进行的，中间伴随着一次又一次规模不等的争论。那时，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农村部工作，不免经历了多次风浪。一次围绕着鱼塘承包问题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

广东一个叫陈处兮的读者给我们寄来一篇调查报告，那上面说：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技术高超，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当地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他承包后的变化可归结为三个大，即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生产队集体收入大增。1979年，陈志雄个人的纯收入是3100元；1980年，他的纯收入增加到7250元。于此同时，生产队的收入也显著增加。沙一大队第五生产队有33亩鱼塘，过去派几个劳力管理，一年最多收鱼6000斤，扣除成本和各项开支，年年亏本。1980年下半年，陈志雄承包了这33亩鱼塘，仅半年就产鱼1万余斤，生产队不花一分钱，不出一个工，就净收入承包金4500元。

可是，那时政治气候乍暖犹寒，不少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同志还没有从“左”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对这件本来并不复杂的事，人们看法不一，发生了争论。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赞成陈志雄承包鱼塘，认为应当让这样的“养鱼能人”大显身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这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好处，不应当再像过去那样把这种能人的手脚捆起来。也有一些人

反对，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争论的具体问题有两个，一个是雇工问题，一个是跨队承包问题，其中又以雇工问题为争论的焦点。这位广东读者在来信上说，这个争论在当地还在继续，希望能够得到报纸的帮助。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持工作，编辑黄采忠把这篇调查报告给了我，我读后感到文中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又感到有些棘手，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边缘问题”，即雇工问题。怎么办？最简便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它丢进纸篓，不发表，天下太平。但我不甘心，既然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端到报纸上，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去思考，去讨论，求得认识上的基本一致或接近呢？我决定在报上组织一次读者讨论，并请示编辑部领导，得到同意。5月29日，我在二版头条地位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的调查报告，并写了编者按语。按语说，这篇报告里所提出的问题在其它地方也有，确实值得议一议，“新情况给我们提出不少新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探讨，求得正确解决”。接着，我们就以《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为总标题，开辟了一个讨论专栏，摘要发表读者的来信来稿。这个讨论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读者来信来稿之多超出我们预料，多数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有少数持否定看法。来信来稿大都有理有据，说理周全，很有见解。我们选

了其中 22 篇，陆续在报纸上发表，基本上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了出来。

讨论很自然地集中到下列几个问题：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如何正确地看待“能人”（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二、如何正确看待在发展商品生产中出现的雇工现象？三、如何正确看待冲破区省行政地域界限出现的“跨队承包”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是围绕着陈志雄承包鱼塘而提出的，实际上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遇到的共同性的重大问题。

没有想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远比报纸上的反响要大。就在讨论开始后不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华南师范学院有两个人专程跑到陈志雄所在的沙浦公社作调查，用“左”的观点写了篇调查报告，报告依据的具体事实与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报告基本相同，但这篇报告的论点是：“陈式承包以雇佣劳动为基础，脱离集体统一经营，已不属集体经济内部责任制的性质，而成为资本主义经营，弊多利少，应予限制。”两位作者对人们称陈志雄为“能人”也持否定态度，认为“陈志雄之所以获得惊人收入，并不是因为他有惊人的本领，主要是存在一些客观条件”，作者所指的客观条件是：集体经济长期吃“大锅饭”、搞“以粮为纲”等。作者说：“陈志雄等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一承包过来，就能轻而易举地提高总收入和纯收入。这两位作者实在“左”得可爱，难道“大锅饭”不该纠正？难道解放生产力就是“钻空子”？如果说是“钻空子”，这个空子不是钻得很好吗？总之，两位作者认为“陈志雄的经营方式同旧社会（资本家）实在没有什么差别。”（这篇调查报告后来刊登在广东经济学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的《经济问题笔谈》1982 年第一期）不待说，这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用过去习惯的语言来说，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不久，这份调查材料被新华社一位记者编成内参稿，很快传到了当时中央负责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胡乔木那里。胡乔木看了这份内参后，给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了封信，

信中说：“仲夷同志：附上材料一份，不知确实如何，如果属实，不知省委是怎样看法？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这封信下达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胡乔木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他的意见岂能轻视？于是由省到地，由地到县，一层层讨论。省委责成农委组成调查组，再赴陈志雄所在地进行调查，地委、县委也纷纷派出专人，前往查明真相，当地生产队干部与陈志雄本人，一时几乎应接不暇。省农委调查组很快写出了一份《高要县承包大户陈志雄的情况调查》，特别列举的事实与过去的调查基本相同，但与广东社科院那两位写的调查报告在观点上有明显不同：

一、报告肯定了陈志雄“在全（公）社首开专业承包的先例，加上他经营得法，效果显著，从而使人们看到承包制的作用和生产的潜力，在当时对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的作用。陈志雄在承包中摸索出的“芡实（鸡头米）——水稻——鱼苗”轮作法，对当地调整生产布局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二、报告说，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划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三、那两位同志的调查报告他强调，陈志雄承包鱼塘后，“社队内部社员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承包者支配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其它社员只能被挤在一个越来越小的空间劳动，甚至失去土地。”省农委的调查则列举事实，证明当地推广了陈志雄承包鱼塘的方式后，“既使社员人人有活干，又发挥了专业户的作用”，“社员收入明显增加，有的困难户生活大为改善。”两个调查，在上述重要问题上，从材料到观点，都截然不同。

广东省农委的调查报告最后归纳了公社党

委、县委和地委的意见，一方面，对陈志雄等两个承包大户存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要坚决纠正”，同时又提出“对推行专业承包生产责任制中出现的问题，大家认为应从总结经验教训上去解决，并从政策上加以引导或限制，不宜采取通报批评的办法。”这就是说，他们不同意胡乔木在信中提出的“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的做法。

围绕着陈志雄事件而掀起的这阵风浪里，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即许多干部吸取自 50 年代后期以来的沉痛历史教训，他们不再一味地盲目“唯上”，而是着重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陈志雄所在的公社、大队干部，他们最了解底细。陈志雄是全公社第一个冲出“左”的藩篱的“出头鸟”，他承包鱼塘的实践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即使承包中出现一些问题，也只能分别情况，逐个解决，决不能枪打“出头鸟”，把陈志雄整垮，否则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基于这种认识，一场风暴被顶过去了，人们没有按照胡乔木那封信的要求去“制止”和“纠正”承包鱼塘的这件新事，他们勇敢地保护了陈志雄。

《人民日报》上的这次讨论，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国家农委的《农委简报》增刊上，也摘要转发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华南师范学院两个人的调查报告，并在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许多同志认为对陈志雄承包鱼塘的实践应当基本给予肯定。这件事也传到了中央，一位党中央领导同志说：“扩大鱼塘承包可以嘛，多收点鱼税银子就是了。”

这次讨论持续了三个月，于 8 月 30 日结束。讨论结束时没有作讨论总结，只在最末一期专栏上，我写了个编者按语：“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使我们对农村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以后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在认识上又进了一步。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来信说，这次讨论对人们解放思想，有很大的启发。看来，这种围绕着一个问题各抒己见，相互磋商的讨论，是一个交流思想、提高认识的好办法，本报今后打算继续选择农村经济改革

中遇到的某些新问题，在报上展开讨论。”

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吴象以后又专程去广东高要县，访问了陈志雄，给我们带来喜人的新信息。他在一篇报道里说：“前年，《人民日报》曾开展过一场《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提高了人们对专业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坚定了陈志雄‘包’下去的决心，也使他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订有《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虽然他经营数百亩鱼塘，十分辛苦，但他每晚必读报。”报道还说，陈志雄承包鱼塘四年来，向集体上交了承包金 141000 元，向国家交纳税金 2900 多元。四年中，陈志雄还传授了他的捞鱼花、育鱼苗等技术，有五个社员被他培育成了养鱼能手，他光荣地被选为高要县的劳动模范。

如今，广东副食市场上鱼既多又新鲜，价格也公道。这鲜鱼市场上的好形势来之不易，它是在排除了许多方面“左”的影响、干扰和重重困难之后才取得的。

（作者原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方 实）

广 告

食道癌治疗有新药

郑州市邙山中医院肿瘤专科研制成一种中药丸，患者口中含化，对治疗食道癌、贲门癌、胃癌有显著疗效。此治疗方法尤其适合于不宜作手术、化疗、放疗或愈后又复发的患者。对已滴水难进的病人，含化药丸 1—3 天，大部分即可饮水进流食。疼、咳、肿、呕吐皆可治。对一般的患者，按照医生指示用药后，大部分饮食能恢复正常。可汇款购药，设专人负责咨询。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南阳路中段生产路 7 号付 1 号

来院路线：从郑州火车站乘 4 路或 39 路汽车到海棠寺站下车，向北 50 米（郑州市邙山公安分局西对面）即到。

联系人：宋国厂

电 话：(0371) 3832221 邮 编：450053

先有风骨後 始能翰墨香

——记父亲楚图南和几位书法家的交往

● 楚泽涵 楚泽湘 楚泽洋

父亲一生热爱书法，在他的晚年，书法甚至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在父亲的一生中和几位书法家有过友谊及交往，并收藏过一些名家的书法作品，这些都成为父亲一生中值得回忆的记录。

一

在我们保存的父亲收藏的书法作品中，时间最长的是胡小石先生的作品。胡小石，字光炜，浙江嘉兴人，比父亲年长十一岁，抗战期间与父亲都在昆明，并同在云南大学任教，当时胡小石任文法学院院长，父亲任文史系主任，因而时有接触。胡先生为人正直、笃实，在中国古文字、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很受学生欢迎。父亲当时虽任文史系主任，但主要精力是从事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反对投降的进步活动。为了更多地接触青年学生，也是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亲在几所中学兼课，并把家安在昆明郊区的碧鸡关。

胡小石先生很同情和看重深得学生敬重的父亲。40年代初的一个旧历除夕，胡先生从城里赶到郊区看望父亲。当时母亲在车家壁的惠滇医院照看生病的孩子，父亲则刚从医院回来，听见门响，开门一看，是身着一袭长袍的胡小石先生。胡先生看见室内冷锅冷灶，父亲孤身一人，无任何过年气氛，于是说道：“早听说楚先生生活清苦，但没想到竟是这样窘迫。”父亲

热情迎接这位长者，遍寻家中食物，只得一包米花。父亲烧开水冲米花待客，随即和客人谈起了早年在东北抗日救亡，身陷囹圄的经历，谈到出狱后在河南任教期间游历潼关，看黄河，临壶口观瀑布的感受，继而谈到中原国土沦陷在敌寇铁蹄下的沉痛心情，谈到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谈到治学，谈到外省和云南本地知识分子的团结……胡先生受到父亲虽生活清苦但心忧天下的感染，也边喝米花泡水，边推心置腹地畅谈起来，竟然忘记了归程。从此胡先生视父亲为知己。胡先生也在父亲的影响下为大后方抗日救亡和民主进步运动作了很多工作。中共南方局派驻昆明的代表华岗同志（当时化名为林少侯）就是由父亲介绍，经胡小石先生向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推荐，得以安排在社会系任教的，此外还通过胡先生安排了一些进步的青年帮助华岗、费孝通等先生工作。

胡小石先生在昆明时始终和父亲保持极好的友谊。父亲笔名高寒，胡先生为父亲的住所题名《高寒之居》，并时有书法作品见赠，其中最为父亲珍重的是一幅对联：

发展阳吊垒迹

探禹穴赞神工

苍劲的笔触，雄浑的气势，寄托了对祖国瑰丽山川及优秀文化传统的赞颂，对光明和未来的向往。

抗战胜利后，胡小石先生回到南京，任中央大学文学学院院长；父亲则因从事进步活动受迫害，而与胡先生失去联系。全国解放后，父

《文艺略论》，谈到不同意将学术成就高的人或作品评价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这是“割断历史前后关系，孤立作家存在地位”，应改为：“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父亲在这些段落加了圈点，或许是以此与老友讨论学问吧！

二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向往和平、民主、团结、进步，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李公朴、闻一多这两位父亲的朋友和同志被暗杀在昆明的街头……由于形势险恶，经组织安排和与有关方面协商，父亲同一批朋友离开昆明到了上海，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在上海法学院任教。在此期间父亲与沈尹默先生结识。沈尹默先生曾以书法作品相赠，是其所作的两首《鱼家傲》。深得“二王”精髓的沈尹默的作品端庄清丽，内容也充满了禅意，或可以认为是沈先生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恶。

1948年年底，父亲经香港转道天津，由陆路从沧州到河北平山县的解放区。1949年初，父亲进入解放后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和郭沫若先生一起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郭沫若先生为父亲书写过一幅自作诗：

鸭绿江头望，烟筒浑似林。
两般罹浩劫，一旦去沉荫。
东北人民血，春秋内外心。
我今真解放，旧识渺罗君。

这是郭沫若先生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后愉悦心情的写照。他看到生产恢复，社会进步，前方捷报又频频传来，欣喜之余，又为罗振玉等未能脱离从故纸、甲骨文中讨生活的境遇表示惋惜。应该说，这首诗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心情的写照。这件书法作品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录被父亲珍藏。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曾多次随郭老出国访问：1945年5月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先有風骨俊
始能翰墨香

一九八九年春

楚图南



楚图南

楚图南墨迹

亲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胡先生从报纸上得知父亲消息后，给父亲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长信，信中倾诉了失去联系后的别情，重新找到老朋友的喜悦，特别告诉父亲，他已在原南京的中央大学为父亲预留了教职，盼望父亲“南来主讲《史记》、高尔基研究等课”，并说：“良朋欢聚，青年进益。翘盼之殷，历日如岁”。

父亲因工作已有安排，婉谢了胡小石先生的邀请，但也对未能和胡先生一起任教不无婉息。胡小石先生1962年逝世。在南京大学纪念胡小石等三位先生诞辰百周年时，父亲在给南京大学的信中写道：“对三位教授为人风格及治学精神，印像很深，特别对胡小石教授的深厚友谊耿耿难忘”。

80年代初，泽涵去南京出差时曾去看望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问及胡先生的身后，蒙其赠送由匡亚明题签的《胡小石文录》，并将此书带回北京由父亲阅看及保存。书中有一篇

1955年4月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同年6月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1957年12月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文革”浩劫初期，郭老还和父亲一起会见日本外宾，两人互道珍重。后来“四人帮”肆虐，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当众刁难周总理，点名攻击郭老。父亲当时也被通知与会，对这一切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就在这次会议上，郭老夫人于立群同志看到数年未见面的父亲，特意离座到父亲的座位前，问候父亲，父亲则起立紧握其手，一再大声问候郭老。在“四人帮”猖獗时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会场上，坐“冷板凳”的郭老夫妇和“靠边站”的父亲，表示友情的问候，也成为一些人侧目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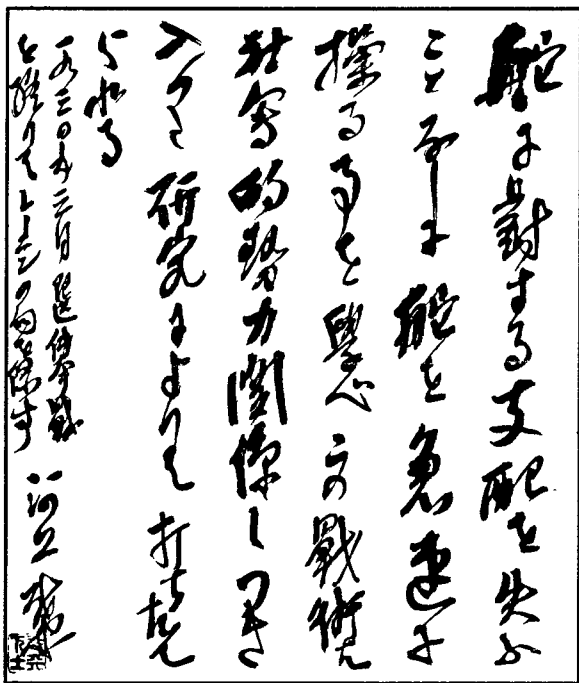
三

日本也是将汉字及书法作为学问和艺术加以研究和提倡的国家。父亲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期间，和日本文化界有很多交往。其中和日本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有很深的友谊。

丰道春海早在1947年就由于精湛的书法造诣及个人品德被推选为日本艺术界最高荣誉机构日本艺术院的会员。父亲敬重丰道春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为保存日本书法艺术作出过重要贡献：1945年日本被美军占领，美国文化滥殇，以致中小学的书法课及写毛笔字被废除，丰道春海则和日本文化界的朋友们为恢复中小学的书法习字课而奔走呼吁，终于在1951年达到目的。丰道春海的书法苍劲、秀逸，力图使自己的书法能体现所书写内容的精神。丰道春海对中国的书法及书法家始终怀有敬意，热衷于日中友好和日中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后，在中日未建交的情况下，他四次应父亲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名义发出的邀请，率日本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中国。1958年夏他首次访华时，曾在故宫太和殿，在铺在地板上的几十张一丈二尺的宣纸上，用一人多高的如椽大笔，双手挥洒写出“和平友好”四个大字，表达了他对中日友好和和平的信念。

丰道春海1964年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访华时，已是87岁高龄，但他在各地访问时仍兴致勃勃，和各界朋友切磋书法艺术。1970年丰道春海以93岁的高龄去世后，其亲属及弟子秉承他的遗愿，把他访华时所摄的照片及父亲访日时同他的合影，托人送给父亲，但由于“文革”的混乱，父亲直到1973年6月才收到，也才知道丰道春海已去世的消息，面对长髯及胸的老友的照片，回想往事，父亲的感慨、遗憾及悲愤是很深重的。

父亲1961年访日时，还认识了另一位日本朋友末川博先生。末川博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当时担任立命馆大学校长。父亲到他家中作客时，二人谈得很投机。末川博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认为日本的传统文化实际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应该继续学习中国的文化，并发展自己的文化。父亲说，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是相互的。父亲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就是30年代初在东北军阀的监狱中，从日本学者河上肇的著作中学到的，所以自己始终认为河上肇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启蒙老师。不料末川博听完父亲的话异常激动，他说，



日本友人河上肇书法（译文见63页）

想不到在日本已几乎被遗忘的河上肇先生在中国还有这样的影响。他又说，他本人是河上肇的姻亲，早年和河上肇交往很深，还保留有河上肇的几件遗墨，愿意转赠一件给父亲作为纪念。说完，末川博从书房中取出一张写在日本宣纸上的书法作品，送给了父亲。

父亲回国后，深知这件日本早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书法作品之珍贵，因此将其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则将原件的照片及复制件送父亲留念。书法作品是用日文书写，请教中日友好的王效贤同志，承她将书法作品的内容译为中文，其译文是：

要不失去对舵的支配，
就要学会迅速掌舵。
这一战术要在深入研究，
社会势力关系中去建立。

1930年3月选举战结束之后录列宁语
河上肇

我们相信这是中国和日本学者间交往的一段佳话。我们仅以此纪念为中日文化交流建立过功业的前辈们！

四

在“文革”浩劫中与父亲有书法作品交往的是茅盾（沈雁冰）先生。父亲和茅盾的文字交往要追溯到30年代初期。当时父亲在东北反动军阀政府的狱中，为了学习和教育同监的青年学生，一方面教英文，一面也翻译和创作一些作品送到外面，由陈翔鹤、董秋斯等朋友寄到上海，在郑振铎、茅盾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但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二人才有更多的机会交往。“文革”前夕，沈雁冰已被免去文化部部长的职务，担任政协副主席不负任何实际责任。“文革”期间被停止参加一切活动，而且也不向本人说明原因。只是由于胡愈之先生多次呼吁奔走，引起了最高当局的注意（周总理曾在听取当时统战部负责人汇报情况的会议上表示，沈雁冰的问题，他作不了主，要请示主席），才在1974年被补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同被补选的还有胡愈之、叶圣陶、楚图

南等老友。同年4月胡愈之邀茅盾、叶圣陶及父亲等近十位老朋友聚会；次年十月，茅盾与叶圣陶等同游香山，此后不久茅盾托儿媳陈小曼同志送来诗作及书法：“调寄《菩萨蛮》，次韵奉答圣陶，志同游之欢”：

游兴岂为高龄敛，
童颜鹤发添明艳。
倚杖访秋山，别来已十年。
解颐藏胜义，宇宙变袍系。
云散日当空，山川一脉红。

这实际上是茅公看到四届人大召开，希望乌云尽散的心情。

稍后，“四人帮”又乘总理病重嚣张起来。茅公又托陈小曼送来诗作，题为《读稼轩集》：
湖海浮沉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却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策谋空传世，京口壮猷只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父亲一看就懂了，茅公是说当时是“扰扰鱼虾豪杰尽”，用父亲的话说，则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父亲请陈小曼问候茅公起居，并以茅公的诗作共勉，来日一定要看看那些丑类的下场。

一年后，果然是“去散日当空，山川一脉红”茅公在1979年将这首词写成书法作品托陈小曼送来，作为“文革”浩劫期间与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共患难的心证。同时，父亲和茅公都为国家的新生而欢欣。

这些都是父亲和几位书法家交往的一些小故事，应该说父亲收藏的书法作品远不止这些，而上述几位前辈的成就和造诣也远非“书法家”的称谓能概括。我们在清点父亲的收藏时体会到，父亲收藏作品，并不看重作者的职位，而是看重作者的人品和作品的艺术价值。用父亲的诗句说，叫“先有风骨俊，始能翰墨香”。父亲珍藏的作品都反映了父亲生活经历的某个侧面，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某种记录，也反映了父亲的情趣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些作品交给国家博物馆保存，作为对父亲及父亲所敬重的前辈们的纪念。

（责任编辑 文 贤）

张东荪

几次原汁原味的演讲

● 黎 南



张东荪

张东荪(1886—1973年),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原名万田,字东荪,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2年曾参加南京临时政府,随后在《庸言》、《正谊》、《中华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评议民初政治,成为民初著名的政治家。五四时期致力于文化运动,主编《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此后,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先后任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光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1927年8月,他与瞿菊农等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并相继撰著了《哲学论丛》、《道德哲学》、《认识论》等哲学

著作。

30年代,张东荪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训政专制。他积极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赞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寇逮捕。在监狱中,他不屈于日寇的淫威,先后四次自杀而未遂,被判刑一年半,后被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1月在民盟二中全会上,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秘书长。此后,张东荪数次奔波于北平、南京和上海之间,为恢复“政协路线”、重建和平局面不懈努力。1949年1月,张东荪为傅作义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牵线搭桥,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张东荪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教授。

张东荪为人快言快语,40年代末多次发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演讲。张中行所著《负暄续话》有一章谈及张东荪,他从《后汉书》所载孔融事,联想到说话与安全的关系,说:“人说话多顾安全还是多顾快意,似乎多半取决于天性。孔融惯于快言快语,就是吃了得天不厚的亏。

我因孔融而想到张东荪先生,是因为根据我的印象,他也是惯于快言快语得天不厚的一位。”

40年代末期,我入学清华,曾听过张东荪的几次讲话,当时都作了详细的笔录。现在这些“原汁原味”的记录,仍在我的手头。这些资料,对研究张先生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思想,会有一些帮助。张中行说他“不忘朝市”、“快人快语”,唐振常说他“爱谈时局”、“以其雄辩之才,分析中国出路何在”,都可以从中得到印证。

南行见闻

1947年夏天,张东荪从北平南行到上海、南京一带,停留了约莫40天。回来后,9月1日,在他任教的燕京大学,应学生自治会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南行见闻”。当时,时局动荡,正是美国总统派特使魏德迈来华调查的前后。张先生在南京见过魏德迈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和上海、南京两地的文教、工商等界人士有接触,许多燕京人和清华人都想听听他对时局的评论。开讲一小时前,听讲人就已陆续涌入适楼会场占座位,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太多,挤不下,临时又改到贝公楼礼堂举行。我

作了记录，下面是其中几段摘录：

“魏德迈临走的声明对政府的指责是远在马歇尔之上的，马歇尔临走时只不过说，这个政府要增加几个新人；魏德迈却说，这个政府要去掉一批坏人。前者并没有说明政府里有坏人，只说增加新的；而后者明明指出了贪污集团的存在……说到去掉政府里的坏人，究竟要去掉多少呢？假如彻底去掉的话，最后所得恐怕只是零。”（笑声）

“有人告诉我，魏德迈临走之前有个茶话会，会中，他演说达一个半小时，这演说比声明厉害得多，以至在座的政府要员的脸色都变了。由此可见，即使是魏德迈，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贪污无能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真理只有一个，二加二只能等于四，决不能等于五，贪污仍然是贪污，无能毕竟还是无能！”

“有人拿一个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上面说国民党是一个大公司，他问，究竟是一个甚么公司？我回答他说，这是一个屠宰公司。”

“大家都知道，李公朴先生是民盟盟员，在他为民主而身殉之后，他的女儿在上海无理地被迫失学了，前沪江大学校长的两位公子也失学了，因为他们的母亲主张民主。”

“在目前高度的压力下，许多民主人士都到香港去了。刊物出版也有逐步南移的趋势。”

“在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停刊之后，大公变成最畅销的报纸。这并不是说大公本身好，而是在这个时候，比起其他报纸稍微强些。新民晚报复刊之后已经面目全非，另换了一副面孔见人。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政府也有让它复刊的意思，当然复刊之后，不会再是原来的文汇报及联合晚报了。而对政府来说，这是名利双收的作法。据说，两报社已经拒绝了这样的复刊。”

“民社党的分裂是值得注意的，正如梁秋水所说的，是真假王麻子

之分，革新派以正统的民社党自居，并公开登报开除张君勱及其党徒……他们请我以顾问资格出席革新派代表大会，我去参加了。因为当时另有事情，要求提早说了几句话。我说，今天的革新派应该要有正确的路线，对现在的政府不要再存在任何希望。即使你们在座的七十几位代表全部去参加政府，也绝对不会把这个政府弄好。要有鲜明的政治目标 and 政治立场，首先就要做到与政府绝缘。”

“在上海的时候，刚巧碰上文化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大批解聘教授，大批开除学生。一个大学解聘的教授有多至三十几位的。各学校被开除的学生合起来恐怕有四五百人，尤其最荒唐的是大同大学。成绩最好的，最富正义感的学生，在上海大批的失学了。奇怪得很，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去转学的时候，不管考得怎样好，无论如何不会取……后来大家研究这是否是教育部的命令，调查的结果，怎么也不能证实这是教育部的命令，但各学校又非如此办不可，可见这个力量比教育部还大……今天，我还在这里演讲，我不怕有人来解聘我。在上海，被解聘的教授，是因为曾经在各种宣言上签名，是因为曾经极力奔走营救被捕学生。谁首先签名的，黑名单上就名列前茅；谁爱护青年，谁就被解聘。工商界为了抗议这一无理举动，准备筹办一个文化机构，聘请被解聘的教授来办理研究或出版工作。我走得太快，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但这件事是在进行中的。我也不愿多说，只愿诸位知道，黑暗中还有公理的存在。人心究竟还是人心，暴风雨到来，居然有人挺身而出，表示出正义感，社会也并不是完全冷酷的。”

华盛顿与南京之间的距离

张东荪在燕大作了上述演讲一

星期之后，1947年9月8日，又应清华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在清华作了题为“南行见闻杂感”的演讲。听讲的人很多，吴晗教授也来了。我作了笔录，根据讲话的内容，加了一个标题：《张东荪论华盛顿与南京之间的距离》，整理后，刊登在1947年9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时与文》周刊第2卷第2期。

二十多年之后，“文革”期间，我到天津外调，在档案馆查阅档案，偶然间，意外地看到了一项与我的外调任务无关却与《时与文》及张东荪有关的档案，这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致天津市政府的公函，要天津市政府查禁、没收市面上的《时与文》，理由是该刊“为匪张目”，举出的证据呢，就是该刊所登载的这篇张东荪演讲纪录。下面择录几段，看看张先生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以致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要查禁这份刊物：

“魏德迈到南京之前，政府为了迎接贵宾，整饰房屋，据说用了好几万万。当魏德迈到了夏威夷，说只调查事实的时候，政府已感到相当失望了。他到南京之后，与司徒大使住在一起，且声明不受招待，政府用以招待贵宾的准备扑了个空，当天晚上，魏德迈就在美使馆里开会，并没有去拜访我们的元首，第二天上午也没有去，直到中午的时候才去，政府是更加的感到失望了。”

“后来，魏德迈在各地飞来飞去之后，回到了上海。我知道他确实是得到了许多材料，对中国政府许多方面都不满意。同时，中国对美国政府也不满意。华盛顿与南京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却没有料到临走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声明。”

“拿马歇尔和魏德迈的两个声明来比较，显然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马歇尔说，应该以主席为首领来扩大政府的基础，刷新政治。而魏德迈却说，中国缺乏良好的领导。所以有些外国报纸说，魏德迈的指责是包括 generalissimo（委员长）在内

的。第二，马歇尔说，政府里面应该增加些自由分子。这并不难，像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等等不是已经参加政府了吗？魏德迈却说，政府应该去掉一批贪污无能分子。这就太难了。到底怎样去掉法呢？去掉这些话，政府里就没有人了。所以说，这两个声明份量上是大大的不同的。”

“在天上飞的飞机，在地上走的汽车，我们中国也有这些二十世纪的东西。可惜我们官吏的脑子不是二十世纪的。我们的政治是古董，古得比北平的古物都还要古，作风和清朝皇帝没有什么两样，简直一式一样。目前是没有办法绝灭贪污的，政治就是贪污，没有贪污就没有政治……去掉贪污就是去掉这个政府，可能吗？”

“在座的吴晗先生研究历史是知道的，中国的政治思想几千年来就是被帝王思想所控制，所谓帝王就是土匪头，皇帝用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忠于我就行，不管这个人坏到一百分也好，二百四十分也好。因为不忠的话，就怕自己的位置保不住了。今天的政府是建筑在贪污之上的，政治不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不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以家天下来统治国家，心里想的就是做皇帝，做官的要的就是钱。虽然今天说是已经没有皇帝，其实不过是名称改换罢了，皇帝仍然一样存在。举例来说，阎锡山从前在山西是都督，后来改成将军，现在是主席，变来变去，结果仍然是不变的土皇帝。不久选举之后，不用主席改用总统了，这不过又是名称上多一变，其本质上一点也没有变。君主政治是以君为主，君主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要根本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就得首先拔去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

“有人以为今日政府已无路可走。其实路多得很，不过这些路都是

要老百姓的命的。”

“顺便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到南京的时候，中央大学想约我去演讲，结果临时不许借礼堂，故没有讲成。在南京、上海一带，几个学校在一起的大规模集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比较起来，北平的教育界在这一点上比南方要强得多。至少还有这一点自由和力量。我要向你们清华同学提醒一下，在恶劣的环境下，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已有的成果和作风，因为环境会越来越黑暗。”

真革命与假革命

1948年10月11日，张东荪应邀到清华作了题为“双十谈国事”的演讲，我作了记录，下面摘录几段：

“在现在来谈国事，大家都会感到无话可说，尤其对我更感困难。因此只想多谈谈关于双十，虽不能算谈国事，也只好少谈国事。”

“今年是卅七年，在这卅七年中，每年都纪念双十，在今天看来，可以值得纪念的成分已经没有什么了。我想大家的感觉都会与我的感觉差不多，纪念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我们总希望将来有一个更值得纪念的日子。”

“纪念双十就是纪念辛亥革命。本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革清朝的命就是这样。不幸这个革命仅成了一个形式，并没有取得革命应有的成果。”

“今天，以双十为例来与诸位谈谈，何谓成功的革命与失败的革命。双十可以说是失败的革命，否则卅七年不会还有今天的这个样子。历史上失败的革命很多，诸位读过历史，当然比我清楚。自从政协失败以后，才使我发生兴趣研究：何谓革命？成功的革命有甚么条件？失败的革命又有甚么条件？”

“我虽不敢居功，说我是参加辛

亥革命的一分子，但在革清朝的命的潮流里，也曾厕身其中。当时不知道成功与失败的革命的条件是甚么，就只知道要革清朝的命。那时看了一些民主主义的书，像卢骚的《民约论》等，对我的影响很大，不过那时候，我们不是说‘民主’，而是说‘共和’。”

“辛亥那年八、九月间，我还在北平，一些主张革命的地下工作者一听说武昌革命，于是纷纷南下，我也坐船到了上海。到南方后，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我还在内务部当了一名小官。当时我感到命是革了，这个国家从别人的手里拿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是不知怎样办好。就像突然将清华大学校长给我当而我当不了一样。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都不像在做事情的，于是没有几个月我就走了。我认为自己贡献的道路不在这里，还有其它的地方。”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临时政府的人每人拿一张证明书就到北京去了。到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推翻共和，反对的我也是一个。不能说有功，但可以说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到后来，虽然仍然有共和的帽子，实质上已经没有了。到国民党北伐，我们都曾寄以莫大希望，希望从此由本质上来一个全盘的改革。不久，这个希望就变成失望。首先，看见了第一步是清共，第二步就是一党训政。从民主的眼光来看，一党训政是反民主的。就这样，一直到了今天的局面。”

“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换朝代也不知有几十次。如果这样的换朝代也算是革命的话，在这三十多年中也革过几次了，袁世凯被革之后，张作霖、吴佩孚不也都被革了吗。国民党的革命与历史上的革命完全一样，吴稚晖先生就曾说过：革命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我看这是

不对的。既然是革命，就要拿得出自己的一套，土地改革也罢，其它也罢，总要拿出自己一套本领来。在这种‘打倒你，我来干’的政治中，民主是无从谈起的。”

“对于革命的认识，要打倒假革命才有真革命。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路，决不是历史上任何的旧路。我对今后不能不有所希望，尤其希望于今天在座的青年。记得国民党北伐时，我在租界里，遇见一些欧美留学生和大学生，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怎样找出路，后来他们的出路都有了，升官发财一样不缺。假定今天的青年不是根据刚才所说的认识，也只顾自己的出路，那么怎样使中国摆脱旧的环境，从根本上彻底改革，一点帮助也没有。要认识甚么是真革命，甚么是假革命。先有确实的认识，然后在新的环境里才有个人的出路。当初的那些青年，在外国学的是 democracy（民主）；回国后，参加的是一党专政，个人不但是有了出路，而且飞黄腾达

了，但对于真革命又有何益呢？”

“完全使中国走上新的道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以后要是真有革命，就必须是成功的革命，不是换朝代，一个皇帝打倒另一个皇帝，是人民自己的翻身，不是少数人集团控制大多数人民。”

“今天，所有的青年都有责任，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失败的，我们要使整个历史翻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得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用自己的能力，负起自己的责任。”

“刚才说过少谈国事，具体的也不必说了，我想诸位也一定能不言而喻。”

流光易逝，岁月匆匆，再回首，当年记录张东荪的上述讲话以及自己东涂西抹一些文字，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旧事了。那时候，我还是清华园里一个少不更事的低年级学生，弹指间，如今已年近古稀。看到书刊上又出现了张东荪的名字，往事萦回，于是想到把自己曾经记录

过的或引用过的张东荪的言论，辑录在一起，这对研究当代史的人，对研究张东荪先生的人，也许会有些用处。于是，击键为文。

本文初稿草就后，又看到了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中国近代思想家论道丛书》，其中有一本张东荪的《理性与良知》。张东荪的著作在这套丛书中与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梁启超、刘师培、章士钊、梁漱溟、冯友兰等人的著作并列。《理性与良知》的编选者张汝纶在其长长的编选者序中，用以下的话作结语：“如果哲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活动，而是一种人生实践的话，那么，张东荪无愧哲学家的称号，他的品格与思想，将活在未来的岁月里。”本文辑录的张东荪的一些演讲，正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哲学家的人生实践，反映出在黑暗的年代里，他敢于无畏地站出来，公开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勇气。

（责任编辑 小 陈）

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权威性月刊

伸张正义 鞭挞丑恶
警示治安 导劝守法

《法制与新闻》

《法制与新闻》是法制日报社主办的全国性新闻月刊，充分及时展示国内外重大法制新闻的背景和详情，是您熟悉法律、了解各地重大案件的窗口。欲知大要案，就须订本刊。

《法制与新闻》以伸张正义、鞭挞邪恶为宗旨，勇于对严重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批评，为读者、为企业反映真实的呼声，是您可信赖的朋友。

《法制与新闻》侧重提供使用法律指导，协助您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维护自身和家人的权益。

《法制与新闻》是一本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人人爱看的刊物，每期文章都被各种报刊转载。订户评价它：一册在手，精彩全有。

《法制与新闻》1998年订阅价仍然保持不变，这是本刊连续三年不提价！

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588；国际代号：1289M 邮政编码：100015 电话：(010) 64365187

地址：北京朝阳区花家地甲一号法制日报社

每册订阅价：3.80元（零售价：4.20元）全年订价：45.60元

秦基伟一页欲哭无泪的历史

● 楚春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刚刚卷起，地处边陲的昆明，大批老干部纷纷落马，继省委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被打倒之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被冠以“走资派”，批斗得躲到干海子炮四师的幼儿园里。直到1967年2月12日，才把他接到北京，住在总参招待所海运仓后小楼“保护”起来，这里有靠边大区职干部近一个排，在大食堂就餐，开了三桌。

招待所的服务员，扎着羊角辫，穿着军装的小姑娘，精神抖擞地念《毛主席语录》，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便是“只许老老实实在，不许乱说乱动。”

时间一长，“走资派”们倒觉得舒心了。你训你的，我吃我的。吃了玩，玩了睡。每天的功课是早请示晚汇报。要么打扑克，要么逛大街，他们这种“罢官”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尤其活跃的是陈再道，一有机会就去买酒，然后到处发动大家凑菜，自带筷子和酒杯，轮流在各自房间当庄作主。

1969年国庆节前，军委下达了“一号战备命令”，说苏联将突然袭击北京，要他们赶紧往外地疏散。

秦基伟被“疏散”到了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农垦农场。

这个名叫西湖的农场，原是湖

南省劳改总队开垦的。住房是土坯垒起的，上头架了几根木梁，搭上竹笆，再铺上稻草。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座坟莹。房基便是湖底，脚踩上去，噗噗直冒水。

秦基伟所在班，住在菜地篷里，种菜供应全连。班长江四分配给秦基伟的第一件活就是犁田。

对于犁田，秦基伟从小干过，看着被自己操纵犁铧翻出来的油光光的土块，心里差不多忘掉了耻辱和苦痛，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战士们见老秦如此轻巧熟练的犁法，不禁目瞪口呆。收工时，有几个战士七嘴八舌地盘问开了：“老秦，你原来在哪儿工作啊？”

秦基伟笑答：“跟你们一样，当兵啊。”

战士又问：“你是不是犯了错误啊？”

秦基伟反问：“你看呢？”

战士想了一下，说：“比咱们营长大点吧？”

秦基伟愣了一下，反问：“何以见得呢？”

“我看你比营长神气，他喊你老秦嘛，还挺客气的。”

另一个战士接着说：“我敢断定，老秦官不到团长。”

秦基伟认真了：“为什么？”

战士回答：“你的肚皮没有咱团长的肚皮大。咱团长待你就没有营长那样客气。”

秦基伟笑了，是苦笑。

秦基伟的班长江四是个年轻娃娃，满脑子是阶级斗争，做人的那点温情和同情心都被阶级斗争挤走了。

班长给了秦基伟三块弯弯曲曲的木片当铺板，钉在一起，中间有宽宽的缝隙。班长自己有三床草垫，连一床也不给秦基伟。就在这三块弯弯曲曲的板子上，秦基伟睡了两年多。

房子四壁透风，房顶有天窗。一到冬天，毛巾搭到铁丝上，转眼就冻

得硬梆梆的。

秦基伟冻得没法，就把被子卷成筒，用绳子捆住一头，睡觉时从另一头慢慢伸进去。

冬天熬过来了，到了夏天，又是另外一场灾难。

西湖的蚊子大到什么程度？用秦基伟的话说，撞到脑袋上都能感觉到疼。伸手活捉一个，沉甸甸的。喝起血来，滋滋有声。最初到西湖，一咬一个大包，咬到最后，连人都胖了一圈儿，痛都没感觉了。

生活很苦，吃得更差。

赶一次集买回二十斤肉，每顿只能吃五斤，五斤肉还得炼二斤油，剩下的给百十号人吃，一人摊不上三二钱。那些帮厨的副班长，都学会偷肉，觉悟高点的，偷回去给班里同志吃几口，觉悟差点，自己就独吞了。

一天晚上，秦基伟睡下了，班长端来一茶缸冒着热气的炖猪肉，推了推他说：“老秦，起来吃肉。”

秦基伟打了一个激凌。

他是中将司令员，跟一帮战士混在一起偷肉吃，成何体统。而且又是“走资派”啊，弄得不好，又得背个什么“幕后操纵唆使”的罪名，再说不吃吧，那可是香喷喷、热腾腾的炖猪肉哇！自从进了这个农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伸直肠子吃顿肉了，那葱花飘浮的肉汤，热乎乎的香气，直往鼻子眼里钻，直往嗓子眼里沁。最后，他咬紧牙关对江四说，他的肠胃不舒服，实在不想吃。经再三邀劝，他始终坚定不移，没动一筷子。

拒绝了江四，秦基伟平平静静地琢磨这件事儿。江四平时对他极差，唯独这次请他吃肉出于真意。秦基伟明白了：“他是怕老子说出去，所以才拉老子下水啊！”

秦基伟对这件事的态度是：不吃，不问，也不说。

种瓜季节来了，秦基伟决定种出军区司令员级的模范瓜。

他挖了一个又深又大的坑，在

坑里放足大粪，盖上土待生肥沤熟，他才下种育苗。

战士们浇水是漫天下雨，一遍拉倒；秦基伟浇水一是掌握好时间，二是掌握好份量，待秧苗长大，藤上架了，他就开始抓重点扶植，每株选准一朵旺盛的花蕾留下，然后把其它的枝枝杈杈打掉。

果然，瓜蛋子一长出来就显露非凡，忽忽长大，沉甸甸的，连架子都快坠垮了。此时，秦基伟又用稻草搓成绳子，编成网兜，把瓜兜住吊在树上，让其轻松自在地继续疯长。

待到瓜熟蒂落，最大的一个有37斤重。班长把它扛在肩膀上照了像，还拿到广州军区参加五·七展览。当然，解说词绝不会说是秦基伟如何如何忠于革命路线。

秦基伟回忆说：“西湖农场的劳动量是很大的，有一天我挑了三十二挑大粪。农忙搞双抢，割了稻子又插秧，早晨打着电筒上工，夜晚打着电筒收工。战士们都是年轻娃，不会照顾自己。一天活干下来，浑身又是泥又是汗，回来后脱下衣服往地上一仍，倒头便睡，那样子，很让人心疼。我的瞌睡少，就给他们洗衣服，洗好了又补。战士们的绒衣长，穿在身上拖拖沓沓，我就帮他们剪，再用布头把剪口包好，防止脱线。有的战士偷偷地问我，老秦，你那么大的官不当了，心里不难受？我说那有什么难受的？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想穷人翻身解放，并没有想到要当官……”

每个周末的下午，照例是组织生活会。值星排长吹哨集合，党员到一排，团员到二排，非党非团的群众战士到三排。

秦基伟寻思：我算哪一门子呢，他只好到三排，跟“群众”们在一起。

通常指导员在一排，副指导员在二排。组织“群众”活动的有时是值星排长，有时干脆是班长，天有多大他不知道，但国际国内形势他敢给你胡吹神侃。

1970年，四届人大公布了《宪法》，部队要组织干部战士学习。全营要集体传达。

走到半路，迎面来了两个场部的人，神秘地把江四拉到一边嘀咕一阵，江四回到班的队列里，跟秦基伟说：“老秦，你不用去了，你回去看家吧！”

秦基伟欲哭无泪。

1972年3月，秦基伟终于被允许去长沙治疗在农场落下的肩周炎。领导给他派了个“警卫”——就是那个自以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绝对忠诚的江四。

从西湖农场乘吉普车去长沙，早晨出发，下午才能到，中午那顿饭，是在路边一个餐馆里吃的。这一回，秦基伟放开肚皮，吃了四十个饺子，看得店老板都傻眼了。

在二六四医院治好肩膀后，再也没有人让秦基伟回西湖农场了。把在湖南境内劳动的昆明军区的几位老同志集中起来，转移到宁乡县境内一个叫灰汤的地方。

灰汤是个温泉疗养院。六个人住在一幢小楼上，一人一大间，比较阔气，有洗澡间有马桶。

1973年，四月的一天，广州军区派了一个政治部副主任来到灰汤，把秦基伟等人都叫到会议室里，传达了军委的指示，并明确通知秦基伟和李成芳、王蕴瑞三个人去北京。这位副主任还集合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监督的人，当即宣布。从现在开始，再不许喊老秦老李了，要喊首长，要服务处务必做好保卫工作。

秦基伟是4月28日到北京的，5月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游园，通知他参加。

名字见报后，前来看望的人络绎不绝。

不久，中央军委某负责人同秦基伟正式谈话，通知他就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慧明法师传奇

● 陈浩望

1928年，蒋介石下野，回到老家奉化溪口闲居。这一天，他忽然兴起想去杭州散散心。车队浩浩荡荡，不觉来到灵隐寺外停下。蒋介石带领随从，从后园步入寺内。这时，只见一矮个子、古铜色皮肤、头角峥嵘、两颧高耸、穿着短衫破袖的和尚，手持粪瓢、正在满园绿意的菜园泼菜。蒋介石上前询问，和尚抬起头打量来人，说：“蒋先生，你好啊！请稍等，待贫僧做完活计，再到方丈室用茶。”和尚声如洪钟，说完仍然低头泼菜。这副傲然超俗的气度，使蒋介石顿起敬佩之情，也就站在菜园里和他攀谈起来。蒋介石问什么，和尚答什么，仍手持粪瓢在泼菜。这和尚是谁？他就是灵隐寺首任方丈慧明法师。

慧明法师祖籍福建，在俗时姓刘，是个农民。少年出家，不曾读书。出家后的活计全是苦行生涯，闲时才打坐参禅。他这个目不识丁的和尚，何以会有法师的尊号？据老辈人讲，慧明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当“行堂”（斋堂中给大家装菜饭的）时，每天斋罢，就去喂狗。这是他日例功课。狗吃剩的饭菜，他舍不得丢掉，拿起来用水淘过自己又吃。一天，他在吃狗饭时，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佛友们问他笑什么？他说：“我常常听人说，狗有佛性，今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从那时起他已暗入佛之“知见”，当时，佛界人士评价他这一举止说，这是“下下人有上上智”的表现。

旧时寺院常常聘请高僧讲经，广布佛理。这年，天童寺请来法师讲《圆觉经》。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慧明法师当时还是该寺的“旁听生”，但他很主动，很用心，天天随大家听经。一日，他听法师讲说“圆觉自性，非性性有，循诸性起，无取无证”的道理，当即心旷意解，似乎见到了“本性”。每次听完经，他还要向他的同伴讲说几番，表示他对经义的领会。同伴中有人讥笑他：“你把镜子照照你的面孔，像你这样一副苦行相，又不识字，还想当法师吗？”他回答说：“你就估计我不能当法师吗？好，从今天起，我偏要做个法师给你看看。”他走出门，“我暂离开这里，三年之后，我要再到这里来，我也要讲

经。”同伴们听他说出这样的大话，拍掌讪笑。有人又说：“像你这副材料都可以当讲经法师，除非是铁树开花，河水倒流。”他不争辩，回房收拾一番，背上包袱，走出山门。

他开始云游四方，虚心向高僧大德学习，还朝拜了五岳，终获大进。第四年的春天，他听说天童寺又有讲经法会，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触动念头，于是他回到天童寺来。几年的变异，佛友们已不认得他了。当他走进客堂坐下以后，知客师（负责接待工作的）见他只有一个破包袱，人也矮小，又是长的一副苦相，把他当作没有什么学识的“云水僧”看待，板起面孔问他：“你这位师傅到这里来有什么好事？”答道：“我是来听经的，前来讨个听经单。”知客师感到好笑，心想，这个呆头呆脑，来听什么经。于是打趣说：“你可知道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经？”他昂起头答道：“这个又何必问？不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吗？”知客师再问：“你可知道‘大方广’三个字是怎么个讲法？你讲给我听，讲对了，我就准你经单。”他看到知客师故意作难，马上沉下脸说：“你好没有悟性和诚心！怎么能用轻慢的心来问佛法？你要向我求‘开示’吗？你必须恭恭敬敬，搭衣展具，先向我顶礼三拜后在我面前长跪合掌，我这才可以讲给你听。如此儿戏态度，岂是求法之道？！”知客师受了他一顿抢白，觉得此人虽相貌不扬，心底下名堂倒还不小。于是马上说：“请坐片刻，我马上就来。”

那个知客师转身跑到方丈室，对方丈和尚说：刚才来了个不寻常的师傅，他说要讨个听经单听经，我问他听什么经，他言道要听《大方广佛华严经》，我问“大方广”三个字怎么讲？他的口气不小，说要听“大方广”三个字，非得叫方丈和尚搭衣持具把他请到丈室来，才可以讲。方丈和尚听了知客师这一番说话，一时好奇心动，当真披上大红祖衣，拿着法器，来到客堂，把慧明和尚请到方丈室。慧明对方丈说：“和尚要听说法，还须把你的法座借我一坐。”方丈依了他，恭恭敬敬把他送上法座。他坐上法座，俨然像个法师派头，把“抚尺”一拍，

开口言道：“和尚，‘大方广’三个字，每个字都有广中广、广中量、量中广、量中量四种讲法，也要讲上一年半载；假设用量中量讲法，半天可以讲个眉目。不知和尚爱听那种讲法？”方丈和尚听他这么一说，觉得这个行脚僧不简单。不敢轻慢，回答说：“请先讲量中量，改日再听其他几种讲法吧。”

于是，他就大作狮子吼，如何名“大”，如何名“方”，如何名“广”，口若悬河地把这三个字的玄义宣讲起来。有时好像桶底脱落，哗然着地；有时好像高山流水，一泻千里，足足讲了三个钟头。方丈和尚越听越高兴，觉得所讲道理，全是从他心底流出，不落前人窠臼，别有见地，奥妙无穷，引人入胜，马上顶礼拜谢，连声赞叹：“法师高明！法师高明！”并且请代座讲经。这是慧明和尚受人尊称为法师的来由。

从向天童寺和高大讲“量中量”以后，慧明法师声名大震，许多寺院都请他讲经。每每当开讲，便座无虚席。每次讲经，都全凭着他的领悟去发挥，不像其他讲经法师那样，往往以书本为据。他认为，疏抄义理，乃是前人见解，背诵得烂熟，也不过是替别人数宝。他特别喜欢摆谈有启发性的公案典故，故为一般佛门弟子所乐闻。只要听得慧明法师在何处讲经的消息，佛门弟子便蜂拥而至。那种情景，是普通一般法师讲经不曾有的。慧明虽不识字，可是，说的“法”语，却很优美，例如带有诗意的“花开朵朵艳，梅瓣片片香”，就是他弘法时讲出来的。

1921年，杭州灵隐寺宣布改为十方丛林（灵隐寺原系子孙派系寺庙），杭州地方诸山长老，护法居士集会，商讨推行首任主持，大家认为慧明法师道行高深，德高望重，都推举慧明为灵隐主持，却被慧明拒绝，再三殷勤劝请，也不答应。过了半年，大家设了一个计——由当地几位著名居士出面，邀请慧明去灵隐寺吃斋，慧明不疑有他，应邀前往。当他跨进灵隐山门时，看见两旁站着成排的僧众，全都搭衣持具，像迎驾的样子。他知道上当了，马上掉转头飞跑，大家追了上去拦住请他回来。他就往地下一坐，把双腿盘起，死也不肯起来。大家无法，只好把他抬回天王殿，钟鼓齐鸣，燃放鞭炮。他却大哭大喊。人们把他抬到方丈室法座坐下时，他仍然嚎哭不已。大家爬在地上，齐声说：“向和尚道喜！”他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当主持的料子，诸位如此爱我，实在是害了我，我无道无德，也无行持（佛教的修习和践行），有何能力领众，还是另选贤才，请大家发慈悲，把我放走吧。”说罢，又是放声大哭，大家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表示如果不答允，都不起来。这样，慧明才勉强答允，权充灵隐主持。

慧明的风度一向谦逊，有一年，湖北省归元寺请他讲《圆觉经》，到期全寺职事僧众齐到山门排班接驾，一

连迎接三天，都不见他来，大家都觉得奇怪。到第四天，方丈和尚在斋堂吃饭时，看见角落里挂单（行脚僧投寺院暂住）客师座位上有一位师傅像慧明模样，仔细一看，正是请来讲经的慧明法师，心中大喜。吃完了饭，方丈和尚在座上宣布：“请大家不要回房，就在斋堂迎接慧老法师大驾！”大家都觉得奇怪，只见方丈和尚下座走到客座上把慧明法师请了出来，大家一看，这才知道这位讲经法师在五天前就来了，装作挂单模样，不显扬自己。方丈和尚马上爬在地上磕头陪罪，并叫知客师向慧明法师忏悔。慧明说：“这不能怪知客失礼，我怕惊动大家，不敢当。是我自己要求挂单的，我乐意挂单生活。”

慧明法师虽然荣任杭州首刹主持，名位是那么崇高，可是，他的日常生活，却依然是普通僧人样子，每天都是随堂与大众同餐。平常信徒送他的水果、糕饼，他马上派侍者送到禅堂、念佛堂、客堂，让大家共享。有人送“红包”，他就把钱送到库房打斋供众。他有一句口头禅：“房里有了这些葛藤，我不能睡觉。”他的卧室中，除了一张木榻板床之外，只有一张条桌，桌上只有一个茶壶和一只茶杯。床上也只有破棉被一条，两件破纳衣和一套破旧的洗换衣裤。即或有信徒供养他新衣裤，摆不上两天，也就过户转送给人家了。杭州地方有一班“耍罗汉”，没有衣穿，没有钱用，都跑到灵隐寺来向慧明“打秋风”。慧明对“耍罗汉”们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从不吝惜。

慧明法师于1930年冬月坐化，他的灵骨在灵隐寺起塔供奉。由于慧明法师不识字，没有留下著述，仅有《慧明法师开示录》（陈耀智记录）、《慧明法师语当》（谈玄法师记录）二书传世。（责任编辑 仲文）



慧明法师灵骨塔

“四人帮”有匹好“马”

● 朱通华

70年代初，张春桥在小范围内讲过：马天水是一匹好“马”。张春桥可是不轻易说人好话的，对马天水却作了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马天水在“四人帮”眼里是何等的得力了。

马天水这匹“马”从1968年初“亮相”算起，在上海为“四人帮”卖力地跑了八九年，几乎为“四人帮”取得了天下，其功可谓大矣！

我是1970年才认识马天水的，那几年，我作为江苏省计划委员会的一员，每年参加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是上海市的带队人。那几年全国计划会议是马拉松会议，一开就是两三个月，有一次从穿单衣开到穿棉衣。上海同江苏两个代表团的房间，总是紧挨着安排在一起，我有着足够的机会对马天水进行审视。那个时候的马天水，踌躇满志，胖得滚圆，浑身长刺，动辄训人，一训就是上纲上线。由于他的后台硬，许多人似乎都让他三分。

马天水是1931年入党的老干部，长期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1972年以后主持全面工作。张春桥曾经特地写信给徐景贤，嘱咐他要尊重马天水。因为马天水是经过徐景贤的手“解放”出来的，那时在上海，谁不尊称马天水一声“马老”？我记得1970年的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问马天水：“你几岁呀？人们都叫你马老？”马天水回答说：“我虚龄58岁。”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呀！怎么称‘马老’呢？”把马天水说了个满脸通红。

有人认为马天水搞经济还是有点办法的。他在上海掌握十年经济的所作所为，请看看他的“语录”你就可以知晓这位自诩“经济专家”的实际本事。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的口号。”

“谁不讲搞上去！赫鲁晓夫上台，讲要把农业搞上去，勃列日涅夫上台，说赫鲁晓夫没有搞上去他要搞上去；美国的每一个总统上任，都说要搞上去，有哪一个

说要搞下来的？！”

“铁路通了要看通到哪里去！通到莫斯科，还是通到哪里？”

“我们检查工作，主要检查路线是否对头。路线正确，生产没有完成，也要表扬；路线不正确。生产完成了，也要批评。”

“先进生产者搞多了，那容易引起大家争荣誉。”

“劳动竞赛会滋长个人英雄主义，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调动起来！”

“什么叫综合平衡？无非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上海的钢铁生产是靠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的。”

“……”

马天水翻来覆去念叨的，就是：经济工作不要抓，企业管理不要搞，劳动竞赛没有用，只要搞好大批判，生产自然而然上去了。

马天水在上海搞了十年，上海的生产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积累水平越来越低，把国民经济搞得个千疮百孔，欠帐无数。到1976年，生产增长率只有1.9%，财政收入连续三年完不成计划，产品质量普遍下降，恶性生产事故一年发生几千起。上钢五厂的一个转炉车间，1976年的生产事故达到四千四百多次，平均每天十四次。第二十七织布厂女工毛信贤，创造了连续27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报社发了个内部情况，使王秀珍大为恼火，骂为“毒草”，马天水责问纺织局，并要追查毛信贤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许多老工人感叹地说：“大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

马天水在1967年4月就“解放”了。“解放”以后，对张春桥感恩戴德，看作是再生父母。就是对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公开身份是市委办公室调查研究组干部），也是唯命是从，1968年4月，李文静布置马天水赶快写一份上海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马天水写好稿子，排出清样后，端端正正写上了“请文

静同志阅改”。李文静看了以后，拿了稿子走到马天水的办公室训斥说：“你写的这个报告，好像没有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顿时，马天水鼻子上汗珠直冒，连声说：再修改，再修改！之后，马天水又收集了若干典型事例，郑重其事地作了修改。这位“识途老马”使张春桥更需要他的“忠贞不二”，他向马天水进行路线交底说：一、“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的大事”；二、“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三、“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八个人”。四、“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主要在中央和省、市一级的主要领导人”；五、“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等等。这些“底”可真是“天机”，对于马天水来说，不就是明明白白地摸到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跟什么人、靠什么人、打什么人、现在做什么、将来做什么这样一些“大气候”么！

从此，马天水在公开指名攻击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人时，一点不觉得脸红心跳了；在昧着良心点名批判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同志为“叛徒”、“特务”、“假党员”时，一点也不含糊其词了；在同那些自己几天前还在骂“这些流氓”的王洪文、陈阿大之流打交道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反而从心里觉得有共同语言了。

1968年10月，马天水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他就为王洪文提出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了王洪文，这可为王洪文捞到了“资本”，抬高了身价。王洪文到上海后，一口一个“马老”，一再亲热地说：“要向马老学习”。

马天水为王洪文立功之最大者，要数党的“十大”时的那一次。1973年8月，党的“十大”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酝酿，别的省有人对王洪文提出异议。这时，马天水跳出来仗“义”执言，着实把王洪文捧了一下，他说：“我和洪文同志相处工作多年，他看问题、处理问题很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工作，我觉得他比我强得多。”

这一番话是够份量的。从马天水的嘴巴里说出来，又说得那么切中，确实比任何人出来讲话都强，起到了别人不能起的作用。

马天水这一席话，那比王秀珍喊一百声“我们伟大的王司令”，陈阿大背着王洪文豁十个虎跳，要强得多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天水讲过之后，江青马上走过来同他紧紧握手了。马天水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王洪文对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天水赞叹不已，他说：“全国各地多有几个像马老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了，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

自从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以后，马天水更是自甘部下，诚惶诚恐。

王洪文的丈人犯了罪，区委打了报告要求处理。报

告上明明写着此人是王洪文的丈人，马天水却要耍了个花招，假装糊涂，把报告批给王秀珍看，并假惺惺地问：“这个人是什么人，你知道吗？”王秀珍撇嘴一笑，揽过去了结了这一案。马天水通过王秀珍讨好了王洪文，王秀珍从马天水那里接过任务也讨好了王洪文。

叶昌明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王洪文几次点名要把他拉入党内，但本单位党员和群众反对叶昌明入党，说他有一条人命案没有查清。马天水发火了：“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案子长期查不清，叶昌明就一直不能入党吗！”马天水亲自打电话给叶昌明原来所属的局党委负责人，责令“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于是叶昌明被拉进了党内，做了市委列席常委。

张春桥的“改朝换代”的思想，支配着马天水对待干部的根本态度。上海全市原有部、局长以上的干部八百多名，1967年夺权以后被作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而列入专案审查的，共达六百七十多人，占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些干部，解放十七年来，是上海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领导着全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今，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坏人，这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在这些干部的解放和使用问题上，马天水等人又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使他们长期靠边站。

“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曹获秋就是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长期迫害下，含冤去世的。

1972年12月24日，由马天水亲笔签名的一份报告这样写着：

春桥、文元、洪文同志：

最近，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专案办公室起草的《关于叛徒、死不悔改走资派曹获秋罪行的审查报告》。

经讨论，拟将曹获秋定为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

现送上《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获秋罪行的审查报告》，请审阅，如你们同意的话，拟报送中央审批。

马天水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很快就批了同意。张春桥还特意叮嘱一番：“不要有疏忽。因为此人影响较大，总会有人替他说话”。虽然报了上去后，中央一直没有批下来，但他们把曹获秋长期隔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关就是七年。

曹获秋死于1976年3月，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垮台。

马天水为了贯彻“改朝换代”的思想，策划把大批干部下放当工人，作为劳动力推出了事。但是怕这样做太露骨，会激起民愤，他要了一个花招，在把干部下放当工人的报告上面批了这样的话：“先用战高温名义下去”。呜呼！从此以后，这一万多名干部，在工厂里战了“高温”又战“严寒”，战了“严寒”再战“高温”，如此暑去冬来，冬尽夏至，一战竟战了七、八个年头。

十年来，全市被打成反革命和受到政治陷害的，达一万多人。其中有成百上千的人被逼疯逼死，有一些人被无辜杀了头。

1973年“十大”召开前，王洪文、张春桥就处心积虑地物色、培养自己的帮派势力。王洪文对市委组织部提出：“上海要培养工人新干部”，“上海一定要打破按部就班迷信，准备一百到一百五十个干部”，“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贡献大，是左派堡垒，要多选工农中央委员”。

“十大”开幕前几天，王、张、姚一看上海报来的名单，认为他们的亲信太少，“帮”气不足，挑不出他们中意的中央委员人选，王洪文批评马、徐、王“犯了战略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并对黄涛、金祖敏（当时尚在上海掌握组织大权，还没有到全国总工会）说：“你们一定要连夜给我找出人来！”为了挑选中意的人，他们反反复复地挑，因此候选人名单迟迟定不下来，上海是全国最后提出名单的一个代表团，而且拖延了大会预定的时间。这样慌慌张张地连夜物色，终于在代表之外物色了五个人，塞进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十大”闭幕了，电台广播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有人跑到那新当选的人的家中去报喜时，当选人莫名其妙，瞠目结舌，说：“你弄错名字了吧？”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当作笑话来讲的“敲门委员”。

十大以后，张春桥还奚落这些代表：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路线斗争觉悟，只会激动得流泪，手拍肿了也说不清个啥。

1974年3月24日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敲定：上海要向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团中央、人民日报社、卫生部、一机部、六机部、教育部和国家计委等十几个部、委机关送“部长”。

马天水、王秀珍要求组织组立即排名单，选“部长”。忙了三、四个月，排出了一张八十多人的名单，共分三档：一档送北京的三十人，准备十八人去当“部长”，十二人去当司局长；还有两档准备到市级各组、办和区、县、局党委去当头头，向老家伙夺权。

马天水等人还插手浙江、福建、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等省，教唆那里的“四人帮”党羽：“矛头要对准省委的走资派”，“要查一查省委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被宋大哥抢去了”，“如果你们在那里呆不下去，必要时可以来上海找我们”。

1975年6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陪同菲律宾总统和夫人到上海访问。

王洪文抢在邓小平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给马天水打了一个电话，说：“邓小平要到上海来，可能找你谈话，你要准备一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经验，你要多同他讲，要介绍我们的经验。”

把菲律宾客人送走以后，邓小平果然把马天水找去。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批经验主义有批示，批评了张春桥、姚文元。并问马天水：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省、市的代表人物是谁？发展下去就要揪人喽！你想过没有？

邓小平告诉马天水：他们的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你听说了没有？我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

邓小平对马天水说：现在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听说上钢五厂生产搞得不错嘛。

邓小平又对马天水说：要维护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威信。现在搞得各省、市的领导讲话没有人听，还行吗？不靠各省、市，什么问题都到中央，中央能解决得了？

邓小平还告诉马天水：现在有人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吗？你有没有想一想？

7月上旬，姚文元到上海。马天水立即去告密说邓小平如何“攻击江青”，并且还吹他是怎样“顶”的。姚文元称赞“马老顶得对”。

7月下旬，王洪文到上海。马天水又立即去告密。王洪文大为表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

到1975年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按照王洪文的意图，马天水又写了专门报告给王洪文，作为“四人帮”向党中央发难的“重磅炮弹”。

1976年2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跑到马天水的住处，阴阳怪气地说：看你们的简报，你们似乎都没有气了，对邓小平恨不起来了。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不讲呢？大组会不开了，在小组会里讲嘛！

经张春桥这么一煽动，“上海帮”顿时士气大振，在晚上的上海小组会上，马天水放高了嗓门，大骂一通邓小平。马天水一下气得血压升高，心跳加快。

“天安门广场事件”广播后，马天水一面要朱永嘉立即起草一个“坚决拥护中央两项决定”的表态电报稿，一面要值班室立即通知晚上十点钟开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央两项决定”。到了十点钟，马天水一走进会议室，就宣布讨论中央的两项决定。（下转第78页）

走进神奇的滴水洞

● 陈淀国

这次去南方采访，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已经到过三次的韶山。因为那里，有个由来已久的“谜”一般神奇的地方，始终深深地吸引着我。

它，就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提及的“西方的一个山洞”，当地人称之为“滴水洞”。多年来，它一直被视为“绝密禁区”，普通游客是根本无法靠近的。

滴水洞三面环山，“藏”在南北约一公里的山冲内。其实，这里既非山洞，也非溶洞。据说，原来确有个终年泉水不断、响声悦耳的“洞”，只因修建韶山水库，被埋在了龙头山堤坝处。

走进滴水洞，首先是一座掩映在绿树、翠竹中的别致门楼。造型如水帘瀑布，左侧墙上镌刻着吟咏滴水洞的诗作：

一沟流水一拳山，
虎踞龙盘在此间。
灵秀聚钟人莫识，
石桥如几重点关。

门楼右侧，山岩峻峭，气势磅礴，一根根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垂悬在仿石楼墙上。就在上方，建有一个翘角游亭，红的柱，绿的顶，犹如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攀亭遥望，青山绿水，尤其是不远那座明镜似的水库，曾铭记下一页：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在这里迎风破浪，畅游许久……

走过门楼，不远处，崖壁上“滴

水洞”三个醒目大字，立刻映入眼帘。虽是遒劲、潇洒的“毛体”，却非毛泽东专门为洞所书。而是景区建设者们，巧妙拼凑而成。

山上，松竹茂密，繁花似锦，珍贵林木达三十多种。杜鹃花、月季花……百花争妍，芳香扑鼻。此外，还有鸚鵡、穿山甲、麝香猫、小毛猴等等珍贵动物，这里确实是个天造地设的仙境。加之四周景点星罗棋布，诸如“将军岩”、“映瞳岩”、“丞相石”、“塔石”、“八仙吹箫”、“观音送子”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原来，毛泽东祖辈的老屋就曾在这里。为了选定这个地方，还请风水先生认真地“卜”了十一天。直到1887年，毛泽东父亲看中韶山冲是种田的宝地，才搬到了上屋场。

这里还有个小小插曲：毛泽东祖父毛翼臣，有个哥哥毛德臣，都是朴朴实实的庄稼人。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雨水都难淋到，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都想去世后葬身于此。最后商定：谁死在先，让给谁。不料，老弟毛翼臣先亡，但灵柩并未下葬，只用块石、山土掩盖。八年后，发现棺木、油漆完好如初，确认此地实乃不可多得的“宝地”，这才安葬于此……

后来，在那风起云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连连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

“围剿”，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和当时的省主席何健，指使便衣、特务，到虎歇坪“挖祖坟”、“断龙脉”，扬言彻底毁掉毛泽东的“风水”。这一愚昧的举动，引起毛氏家族和当地百姓极大仇恨，他们将墓碑埋藏起来，直到1987年，才重见天日。墓碑上的字迹，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显考毛公翼臣老大人之墓

孝男貽昌，孙泽东、

泽民、泽琳立

貽昌，就是毛泽东的父亲顺生。

如今，在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水宝地”上，又建起有两层的“虎亭”，亭栏嵌有37只形态各异的猛虎图案，并从浙江温岭运来一对栩栩如生的特制石虎，日日夜夜镇守于墓前。

沿着公路，继续前行，没有多远便是尽头。展现在眼前的是几幢并不引人注意的青砖房舍，从外观看，与普通民屋无大差异。孰不知，这就是驰名中外、显赫于世的滴水洞一号别墅。在那风云变幻的“文革”岁月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十一个日日夜夜。

别墅后山倒是真的有个长达五十多米的石洞，只不过它并非天然，而由人工掘筑，可防弹、防毒、防原子冲击波……

置身滴水洞，驻足1号别墅，望着眼前这一件件不寻常的实物，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令人深思那不平常的往事：

1966年6月17日，毛泽东从风光秀丽的杭州，乘专列来到湖南，第二天便住进滴水洞这栋对外完全封闭的别墅。这是他第二次返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至理名句，就是1959年那次返乡时写下的。在短短的三天里，毛泽东还登门拜望了老农民、老党员、老赤卫队员、毛氏家族亲人，和烈士家属同桌进餐，视察了韶山学校，到水库尽兴畅游……对这“故园三十二年前”，感到无比欣慰。

七年后毛泽东再度返乡，却“无声无息”地又住到这“世外桃源”。

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整整十一个日日夜夜，毛泽东一直呆在“洞”中，唯一的一次出走，也不离开“洞口”300米，连韶山水库游泳也没有去。而且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批阅文件，就是读书。在这里他认真地第三遍读完了《资治通鉴》。

此时，洞外的神州大地，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正在孕育着、发展着……

于无声处听惊雷。“隐居”洞内的毛泽东，面对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无时无刻不在深思着、策划着……犹如大海在涨潮前那样，在他感情中生发着更强的咆哮……

6月28日，就这样结束了滴水洞生活。到了他称之为“白云黄鹤地方”的武汉。十天后，即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信：这正是毛泽东十一天“闭门谢客”的“成果”。

这封信成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大纛，旗手便是江青。

……

我想，滴水洞不同于任何的洞，它“神”也就神在这里，“奇”也就奇在这里。有人说：“不进滴水洞，不能理解毛泽东。”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田家青

醉心明清家具

● 肖 史

田家青不是专业的中国古家具研究专家，他对中国古家具感兴趣完全出于偶然。1977年、1978年处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大街上到处是车拉人抬的退赔家具。但退家具不退房，又笨又重的家具没地方放，还得处理。那时田家青在搞外贸收购。每次外出骑车在大街上就能看见壮观的家具流，特别是那些古色古香的大件，他就追着看。他发现，随着退赔家具潮，几十家修家具的作坊应运而生。王世襄的《明式家具》出版后，一些有经验的工匠组织了起来，专门在北京文物商店修理旧家具。田家青天天晚上跑去看，每天要看上几百件，听老师傅一件一件分析，回来写成笔记，田家青以自己有限的业余力量，搜集了120多件家具，好坏总算写出一本《清代家具》。这中间，使他受益最深的一个老师是王世襄。

王世襄是研究中国古典家具的鼻祖，抗战时他离京入川，到中国营造社工作，从此开始研究古代细木工和家具。1945年他回到北平，搜集了大量的家具实物和图书文献等资料。1949年王世襄游美归来，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中国

古代家具——商至清前期》、《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等书，田家青的《清代家具》是从王世襄书中得到启发才写成的。由三联书店出版了300本，卖100美元一本。原想卖上10年，没想到没一星期就卖完了。东南亚、港澳台还专门译成英文出版。

田家青成了家具专家了，1995年他应邀访问美国，整天泡在离旧金山200英里的文艺复兴镇，那里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兴建了全球第一个中国古家具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四个巨大的山洞，收藏既丰又精，从30年代就开始在全世界收购，近五六年又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从中国搜集来大量家具，更丰富了馆藏。他们还计划依山傍水修建几处古园林，用来陈列藏品。人家就是这样把这些中国家具当成神一样供着。

中国古典家具的价值就在于造型美，像七巧板一样，你如果用X光机一看，结构却完全不同。像明代的架子床，四角立柱，床顶安盖，顶盖四周装楣板和倒挂牙子，床面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这些装饰都是用小块木料榫接的，还雕出各种几

何图纹。有的还在床正面用小块木料加工成如意头,每四个一组,外加十字形木件,拼接成大面积的板,中间留出椭圆形的月洞门,四周床牙还浮雕螭虎纹等花纹。

明代的椅子,有宝椅、交椅、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尤以宝椅为最。宝椅是放在皇帝和后妃寝宫的正殿,后面摆一组较大的屏风,庄重威严。太和殿的宝座通高172.5厘米,作为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非常气派,四面开光透雕双龙戏珠图案,透孔处以蓝色彩地衬托,座面以下做法与床相同,多用弧腿蓬牙,内为翻马蹄形,座上为圈椅,13条金龙盘在6根金漆立柱上,上下刻莲瓣纹,中间饰以珠花,四面牙板和拱肩均雕有卷草及兽头,与宝座融为一体。明代家具注重实用,比例尺寸合乎人体各部的关系,朴素大方,在世界家具体系中独树一帜。

宫廷里养着一批包括会画西洋画的画家,每做一套家具,都是先由画家绘图,再由工匠放出大样,还要拿木头做模型,修改反复,不厌其烦,有时一套家具要做上五年。乾隆皇帝曾对一套家具就反复修改过三次,上了金漆后又修改了五遍。据说从选料开始,每天怎样进行都有他的最高具体指示。为什么满族皇帝如此重视家具呢?他要向人民证明满族人可以做皇帝,家具不仅是保护自己阶层的标记,更是隔绝对方的最好的符号。当年的紫禁城,几乎满世界都是椅子,椅子中宝座又特别多,连溜冰车也做成宝座形式,叫大马扎宝座,底座很短,很有威严。宝座在清代成了稳固政权的象征。乾隆50年以前的家具沉,很难挪动,显得庄重,与自己的身份相配合。除政务大殿外,皇帝的各处行宫,一定要有宝座,这些宝座目前流落海外不少。

以前的皇帝都青睐瓷器,从来没有哪一朝哪一代像清代一样对家具花这么大的精力。明代家具是无



明 架子床

法无天的艺术,不受任何限制,没有框架,满族皇帝入关以后,认为明代家具与自己的身份不合适,他们首先修改明代家具。工匠做家具从来没有图纸,全凭自己的想法,这就充分发挥了他们极丰富的想象力。那个时代的人很朴实,敬业精神实在,一条椅子腿能打磨半月,打开榫头还可以装上,坐上三五百年不坏。

西方认为中国家具好就好在造型上,细部变化多,有聪明的,有愚拙的,随心发挥,把对生活的感受,都物化在家具上,所有想像不到的用法和造型,都能在家具上体现,几乎找不到重样,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不像西方用图纸一做一大批。中国工匠还与众不同,不用尺,不用钉子,也不用胶,还能做出人情味,一般家具要留出抽降系数,你脾气大,就多给你留点缝,让你的脾气有地方发。你可以从中发现很多人文的思想。

清代家具选料最珍贵,有疤节的不用,连选紫檀也要最好的一节。由于明代海上交通在发展,南洋群岛是珍稀木材的重要产地,到了明末,不仅中国本土上的优质木材被掠夺一空,南洋的优质木材也基本伐尽,除存储在皇家仓库,私商手中也有一部分。清中后期,清政府有个

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哪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悉数买下,上交皇宫或各地的皇家工厂。到了清末,各地私商手中屯积的名贵木料几乎全部被收买干净。紫檀在欧美被认为无大木,仅做小巧器物,据传拿破仑墓前有一个五寸长的紫檀棺模型,令参观者无不惊讶羡慕,以为稀有。西方人在北京见到紫檀大器,才知紫檀精英尽聚北京。

出现中国明清家具热后,北京二三十位家具爱好者成立了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会,尽管他们节衣缩食,踏破铁鞋,绝大部分古典家具还是被财大气粗的国外巨富买走了。日进斗金的倒爷搜求家具已经深入到穷乡僻壤,以致按规定不能出口而近几年被倒出去的家具在数量上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民间家具开始了非常大的更新换代,沙发代替了太师椅,轻薄的西式立柜,取代了又老又笨又沉又硬的传统箱柜。两三年前,安徽的明式家具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一网打尽。山西历史上是富户,明代的一种搁书的柜子,上有一个个小格,原都是书香世家的,流落到百姓家,成了老太太的鸡窝,因透气好,老鼠进出方便,人们都叫它气死猫,小贩不遗余力地挨家挨户找。福建农村富了,纷纷废弃了



明 圈椅

祖传的没有上油漆的木头房子，新盖了砖瓦房。台湾、香港商人来了一看，便把那些废弃的木头房子上的窗格子割下来，整船地往国外运，装饰在五星级大饭店里，当高级艺术品。作家邓友梅1992年在法国马赛，偶然听当地人说，这个港进了三船中国古典家具。据保守的估计，中国已有几十万件家具流落海外。

国家文物局也很想抢出一批，

但无能为力。有架屏风，估价20万，新加坡一位华侨想以45万买下来捐给中国。大拍卖公司喊价很快，30万，40万，眨眼喊过85万。华人不敢买了。

随着时间流逝，老工匠也快要没有了。田家青越来越多地感到自己的使命，他把国内仅存的三个做过皇家家具的老师傅组织起来，他们最大的87岁，最小的也有81岁



晚清 金漆雕漆小盒

了。制作家具模型，大缩小，一件一件地做，每一个结构有10种变化，目前他已经做了30多件，件件有代表性。田家青说，我跟400年前的工匠没有来往，但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知道他们的情趣，用那个年代的材料、工具、结构，就可以完全仿真，做出同样的造型。给我们传统文化留下东西。

(责任编辑 刘文)

(上接第74页)

几名随员争先恐后地冲出会场去拿酒。酒拿来后，每个常委都斟了一盅。

马天水一面同别人碰杯，一面咬牙切齿地打着鼻音，说：“你闹，就撤你的职！再闹，就开除你的党籍！”

1976年5月13日，马天水住院，张春桥端端正正的批示：“天水同志：应安心治疗。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做。张春桥，五月十四日。”

张春桥这么及时地批了短短一行字，上海可是认乎其真地唱了一台戏。徐景贤等拿到批件，先是立即派专人送到医院给马天水看，马天水不胜感激涕零，然后又在其他市委书记和常委中传阅。接着就私下议论开了。一个琢磨着说：“春桥同志批示马老‘工作多安排别的同志’，是什么意思呀？”

于是，在上海市市委内外，经常传播这样的消息：马老可能要动了，要去北京担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了。连马天水自己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占这只位子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976年10月8日凌晨二时左右，马天水在北京听了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指示回到住处，神志恍惚，精神紧张，眼睛发红，又气又急，说：“这简直是突然袭击，宫廷政变。”

马天水在房间里转了两圈，坐下休息了一会，又说：“我要求调动工作，到西藏去，到新疆去。”还嘱托秘书：“如果你能回去，我的家属要照顾一下。”

终于，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马天水被点了名，罪有应得地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四“马”终于走完了他政治上可耻的最后旅程。(朱通华，原彭冲秘书。江苏城乡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进入上海，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责任编辑 刘文)

炎黄春秋



1958年，毛泽东接见军委扩大会议代表周荣（握手者）等



周敏弟、李莎及其女儿雅兰、英娜和王光美（左二）在一起

胡绩伟：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我和金门泅渡归来的周振德一段机缘
无名氏哺育了世界名人华罗庚

秦基伟：一页欲哭无泪的历史

“四人帮”有一匹好“马”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订阅价：4.00元

邮发代号：82—507

零售价：5.00元